



名
人

民
国

MINGGUO MINGREN
ZHANGBIPINGZHUAN

张璧 评传

刘正

著

YUHENG ZHANGBIJIANSHENG SHENGPIRG SHIJIJIAOZHENG YU YANJIU 玉衡张璧先生生平史事考证与研究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民国名人张璧(又名张玉衡),这个早期华兴会和同盟会的元老,这个在辛亥革命、光复军、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等大小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陆军中将,这个曾经亲身参与将末代皇帝请出紫禁城的京师警察总监,这个中华武林瑰宝“大成拳”的命名人,这个“四存学会”和电车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在七·七事变时保卫古都免受日军炮火摧毁的中国人,这个在旧北平有名望的青帮老大,这个传说中的“天津事件”的首要分子,这个拒绝出任伪满洲国陆军总长的旧军官,这个以“汉奸嫌疑”罪名批捕的前公用总局局长……纵横跌宕、褒贬不一的一生,一直被纠缠在民间传闻和报刊影视戏说的误读和辱骂之中……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本书在真实的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辨析诸多史料和传闻,力求完整、客观、公正地揭示张璧一生真实的史事,并对他的功过是非给出答案。



微信扫描 (ID: cctphcome)

ISBN 978-7-5117-2387-1



9 787511 723871

定价: 36.00元

民国名人张璧评传

——玉衡张璧先生生平史事考证与研究

刘 正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名人张璧评传:玉衡张璧先生生平史事考证与研究 / 刘正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117-2387-1

I. ①民… II. ①刘… III. ①张璧 (1885~1948) —评传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5027号

民国名人张璧评传:玉衡张璧先生生平史事考证与研究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巍

责任编辑: 曲建文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5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真: (010) 665158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 188千字

印张: 8.125

版次: 201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36.00元

网址: www.cctphome.com 邮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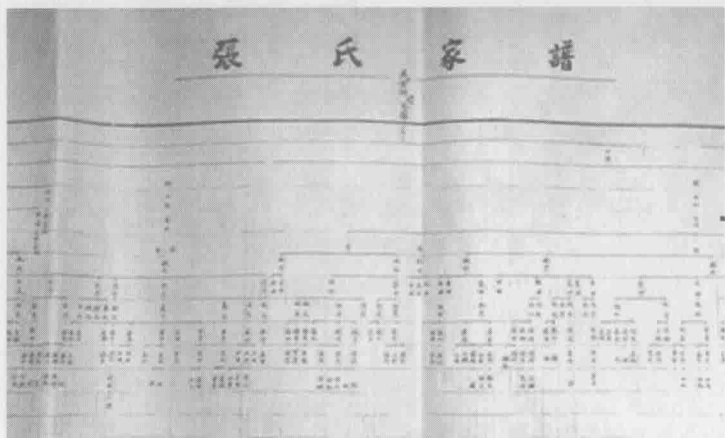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书前题记

民国名人张璧（又名张玉衡）先生，这个早期华兴会和同盟会的元老，这个在辛亥革命、光复军、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等大小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陆军中将，这个亲身参与将末代皇帝请出紫禁城的京师警察总监，这个中华武林瑰宝“大成拳”的命名者，这个“四存学会”和电车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在七·七事变时保卫古都免受日军炮火摧毁的中国人，这个在旧北平有名望的青帮老大，这个传说中的“天津事件”的首要分子，这个拒绝出任伪



《张氏家谱》老谱中记载的张璧



张 璧

满洲国陆军总长的旧军官，这个以“汉奸嫌疑”罪名被批捕的前公用总局局长……他的纵横跌宕、褒贬不一的一生，一直被纠缠在民间传闻和报刊影视戏说的误读和辱骂之中，晚年猝死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本书在充分地利用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辨析诸多史料和传闻的异同，力求完整、客观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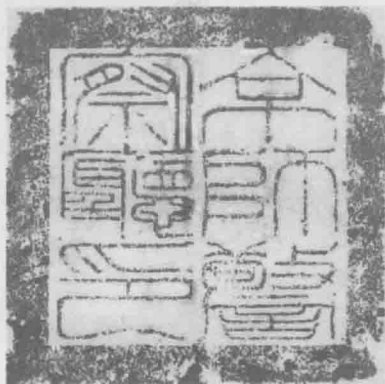
公正地向学术界揭示民国名人张璧一生真实经历及其不为人知的生平史事，在此基础上对他的功过是非给出我们的答案。



山东独立时代的张璧（前右一）与商震等和宋教仁（前右二）合影



身穿京师警察厅总监礼服的张璧



京师警察厅所在地和警察厅长印



中 在予主席兄弟幼差近者多事忙得
 第一被瑣事
 做 弟忙厚則訪而未能早先函商最
 店 外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
 旅 利委員令把持於軍閥及商人手中
 容 巨款後麻水魚魚與今當華勢伸將水利
 用 各省千民命存因底底底底底底底
 慶 文而空地巨款之由該以首首首首首首首

北京前門外西路口

中 極盡共同調查：不待個中原委頗清折以元
 房山森林間能照了周：為此忽因倖：總與近
 日裁兵之信已遍全國河北省民宜當首先
 店 召：衝得成協會結合各界接：宣傳實行
 旅 促進均此者相當經濟確實基礎不為力以
 容 山森林保民眾裁兵運動：實化其用而省同
 用 弟當不日擇元言如有暇出外請一以此此印
 慶 勉 元 張璧 謹啟 一九二六年
 北京前門外西路口

张璧致老同学商震亲笔信（第1页和第4页）

原名君玉號玉衡

保定武備學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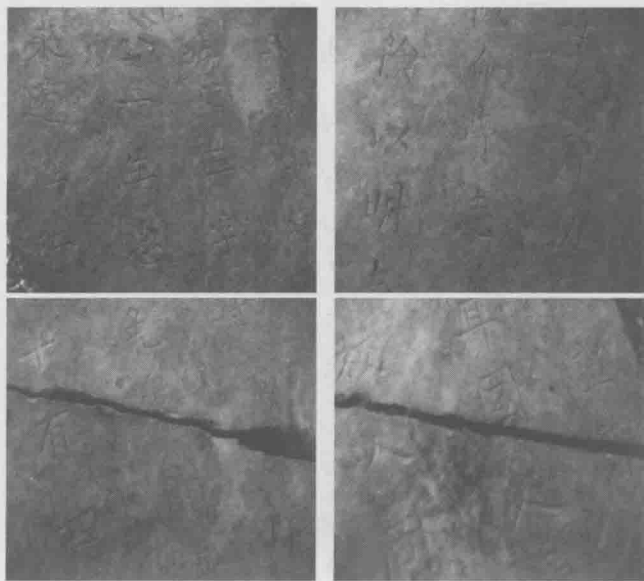
出 身

性溫厚而寡言物懷大志時多智然每不遇時與君玉密交誓切曾任張水口
 營務處長及北京警務總廳警備處之蔡鈞劉雲若等切切前曾計復不久
 因軍執致逐瓦解羅浮間有年然終不荷平生野乘亞說談最清可謂日之
 光進份子與二十二年仲冬間陳覺生潘繼榘李鴻軒等冬月在天津起義
 張學良之計極當時因土匪原等之原見相左遂避離大連日本等處山西
 立當時因板垣中將之教讀有任命國統之說仍以意見之背又逃北京又與
 潘宋言元等周旋亦未得志不迫散而面子及民二十六年華北事變為宋言
 元之容留問題偕同鄭文軒奔走宋與日本軍部之圖日不少聯絡云云時張
 如非張氏則北京早成瓦礫矣及張時以附成立遂任為北京公用總
 局長職能任北京電車公司副董事長以張之親目親友可謂無聊矣
 張為人極純厚對昆仲又與兄友弟恭朋友間又能以誠相待處處舉動
 不苟一視同賓似猶疑果爾乃其志也
 子丹對張之為人頗故重張不得已時時有供給之義務乃張平生唯一之密
 友其餘如

旧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保存的张璧档案



“文革”中被打坏保留下来的张璧墓碑



部分碑铭照片



访张璧墓地有感·刘正

静静地
你躺在那里
默默无闻地
一直是那么的
不声
不响

你带走了昨日的辉煌
任世人对着你的坟墓
痛贬
骂娘

今天我来了
带着史海的沧桑
拂走罩在你头上的
尘土和寒霜
复原历史上你那真实的功过是非模样

静静地
你躺在那里
那残缺的墓碑仿佛正述说着
你曾遭受的冰冷和凄凉
是真实的历史
怎会惧怕
正午的阳光

原谅我惊扰了你那
已经沉睡了六十六年的
梦乡

作者作于 2014 年新春

前言：本书撰写时遵守的若干规则

一、严格尊重原始档案和文献的准确记录，本着以下五不原则：不拔高，不曲解，不猜测，不武断，不戏说。本书主要是利用原始档案文献和史料如实地勾画出一幅真实的张璧历史。

二、以事实为依据，参考相关研究论著和报刊文章的观点。如果出现“原始文献和档案”与已经出版的“研究论著和报刊文章的观点”发生抵牾，而笔者又无法判断时，一般将两种观点并列推出，留待以后的研究中增补、甄别、解释、取舍。

三、由于学术界长期缺乏对张璧的客观而真实的研究，作为国内外学术界第一部张璧研究专著，本书中出现的一些记载张璧活动的准确日期和史实，如张璧在光复军、拜访日本大使、首都革命、建议冯玉祥下野、天津事件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中的准确日期和表现，完全由笔者查自中、日两国保存的原始文献和档案，而非个人杜撰和戏说。因此，本书对张璧生平的介绍和研究，有真实可信的史料基础，敬请读者和研究者在使用本书观点时说明这些观点和史料来自本书首先公布。

四、由于历史原因，张璧档案和相关文献记录保存下来的屈指可数，并且在笔者的长期关注和资料收集过程中，几乎囊括了保存至今的有关张璧的中、日文全部档案和文献。但是依然感到

有些问题和史实无法给予详细的记述和说明，本着宁缺毋滥、不戏说的原则，只好付诸阙如了，留待他人再有资料发现时进行增补。

五、本书作者和张璧本人及其家族后代非亲非故，基于以上原则撰写的这部《民国名人张璧评传》，主要是利用原始档案和文献，力求客观而真实地揭示出一名辛亥革命的元老和著名军事将领在军阀混战、日寇压境的动荡不安的社会的一幅独特的悲情人生。抛弃传统观点和成见，在面对原始档案和文献的基础上，重新认识民国史上的真实的张璧及其历史功过，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目录 Contents

- 前言：本书撰写时遵守的若干规则 / 1
- 一 张璧家世源流考 / 1
- 二 张璧早年的军旅生涯 / 13
- 三 青年时代投身革命 / 30
- 四 北京政变中的逼宫先锋官 / 48
- 五 随冯玉祥反蒋失败后的青帮老大 / 67
- 六 张璧和“天津事件”关系考 / 91
- 七 联日反蒋反张又反伪满洲国 / 111
- 八 七·七事变后保护古都北平 / 120
- 九 协助宋哲元策划通州起义 / 133
- 十 四存学会和北平公用总局时代的张璧 / 139
- 十一 张璧和他的乡亲父老们 / 155
- 十二 张璧和大成拳的诞生 / 161
- 十三 抗战时张璧保护过的共产党人 / 176
- 十四 张璧和他的红色家庭 / 184
- 十五 罩在张璧头上查无实证的“汉奸嫌疑” / 204
- 十六 张璧之死及盛大的治丧活动 / 213
- 十七 张璧研究启示录 / 227
- 跋 / 242

一 张璧家世源流考

张璧，名璧，族名张炳衡，字玉衡。曾用名张君玉。生于1885年6月3日，卒于1948年2月29日。河北霸县（今属霸州市煎茶铺镇）煎茶铺镇大高各庄村人。

这个煎茶铺镇，位于霸县城东十八里。根据嘉靖版《霸州志》的记载，在明代，这里还是个只有“东、西两条大街”的小村庄。到了清代中期，根据民国版《霸县新志》的记载，这里则已经发展成了有十几个大小村庄构成的大集镇了。

1940年4月2日星期二，张璧在《实报》发表的题为《大成拳的命名：四存学会演述》一文中，首次公开宣称自己“自十七开始从军，参加革命”。又根据《玉衡张璧先生之墓》碑文记载，他生于“光绪乙酉四月廿三”，这个“乙酉四月廿三”肯定是使用传统的农历，阳历应当是1885年6月3日。可知张璧生年当为1885年。

关于他的卒年，目前有三说并存：网络上多有人主张死于1946年1月22日。而在大成拳界，一直还流传着1949年1月他在国民党监狱中因闻听蒋介石败北而大笑引起心肌梗塞卒死的传闻。如，杨鸿晨在《并非装聋作哑——再次〈问疑大成拳〉之试答》一文中曾主张：“张璧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1949

年1月因大笑引起心梗猝死于北平（现健在的浙江杭州窦以鸾为证）。”^①

根据《玉衡张璧先生之墓》碑文记载，他卒于“民国戊子二月廿九日”，这个时间应该是阳历，即1948年2月29日。

按照《霸县新志》的记载：张璧的家族先祖于明朝初年从山西洪洞县移民而来此地，开宗立派，从此脱离了和山西原籍的血脉联系和族谱传承。也就是所谓的“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案：《洪洞县志》卷七记载：

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载：“明洪武、

^① 杨鸿尘文章首先在网络上发表，至今不知发表于何刊。

永乐间，屡徙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北等处，树下为荟萃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

曾广钦《增广山西洪洞大槐树志》序文中说：“盖必迁徙之时，驱各属之民，聚洪洞大槐树下，由此点齐，由此分迁，临别纪念，永久弗止。”

但是，使张家发迹的是自迁霸后第十五代祖先张震。张震可谓文武双全。见《霸县新志·张震传》中如下记载：

张震，字省旃，号雷门。先世由山西洪洞徙霸州。震自幼颖悟，角艺辄冠其侪。十七岁入州庠。丁酉举于乡。大挑二等。以教取用。历属阜城、隆平等县教谕。选授天津教谕。从徙之士，多所造就。如，华金寿、王恩漉、卢荫棠，皆门下士也。同治七年，捻匪犯津境，官绅守城。震独任要扼，城赖以安。

这里出现的“丁酉举于乡”，该志《进士录》中又记载：“张震，道光丁酉，天津县教谕。”道光丁酉，即1837年道光时代举行的一次科举考试。在这次科考中，张震中举。这里所谓的“大挑二等”，是清代从乾隆十七年（1752）开始施行的一项选拔基层官吏的制度。凡是四科不中的举人，由吏部据其形貌应对挑选，一等可任知县，二等可任教谕或训导。这一选拔制度每六年举行一次，名曰大挑。

这里出现的张震的弟子王恩漉，字晋仙，号景贤，又号静闲，晚号耐园。生于1842年，卒于1902年。他就是著名甲骨学家、民国时代天津地区的大学者、解放后就任天津市文史研究馆

首任馆长王襄的伯父。



张震弟子王恩滄、华金寿书法

王恩滄自幼聪慧过人，深得官学老师张震的喜爱，张震经常对别人讲：“王氏将以读书显矣！”王襄在《先伯御史公事状》一文中作了如下记载：“吾家本微薄，世经商业，先伯御史公以读书名列甲科显，后吾父及先叔中式乙科，仰慰先王父母所期，至襄兄弟犹承余训，知读书焉。”王恩滄的两个弟弟王恩瀚、王恩澎也师从张震，并相继考中举人。而晚清著名书法家华金寿，则是民国时代天津著名画家、书法大师、晚清进士华世奎的祖先。可见张震门下无浪得虚名之士！

因此，张璧日后从军习武，是有祖上遗风的。张震既是张家第一个举人，也是张家第一个武将。而对于他的文治，该传记载：

同治十三年，署府教授。三月，因劳致疾辞职。邑人送“经师人师”匾额。并撰楹联以表品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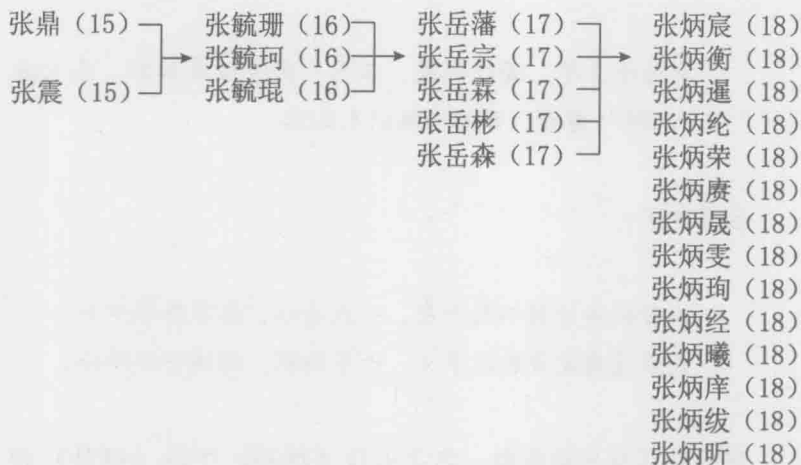
该联如下：

不营私不计利不屑干求，一点清心、品卓教孚师长；
能重道能爱贤能奖节义，十年勤职、德纯誉洽绅衿。

张震和其堂兄弟张鼎，名字出自《周易》中的《震卦》和《鼎卦》。“震”则取义于《周易》中的“帝出乎震，震者，东方之卦也”，是家族振兴开始的象征。“鼎”则取义于《周易》中的“君子以正位凝命”，是家族发展进入正常轨道的象征。而利用儒家经典《周易》来给自己的子女取名，这说明了当时的张家，已经具有了良好的书香门第传统和素养。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张璧祖先是书香门第和地方著名乡绅。

根据《张氏家谱》，张震是张璧的曾祖叔、他的曾祖父张鼎的堂弟。从第15代张鼎到第18代张璧之间的传承表，我们整理如下：



上述族谱中的“张炳衡 (18)”，即张璧。

他的祖伯父、祖父张毓珂的兄长张毓珊，也是一位著名的乡绅。

《霸县新志·张毓珊传》中如下记载：

张毓珊，字樾樵。清增生。世居霸县东高各庄村。性宽和。治家勤俭，事亲以孝闻。好读书。早岁入庠。丙辰岁试，补增广生。因家事繁琐，遂不习举子业。专心理家政。暇则为诸子侄讲经史。

这样一位“性宽和。治家勤俭，事亲以孝闻”的人物，却有着治理水患的才能。见该传如下记载：

光绪二十年，境内大水，纠合邻村修堤堵口。尝拔夫数千，不分昼夜，亲自督催。竟得秋有收获。公举管理三十五村堤。……光绪二十九年，在村南中亭河堤修筑永丰闸，环

村开沟，旱则引水灌田，涝则泄水注海。

不仅如此，张毓珊也通晓治军之术。见如下记载：

光绪庚子义和拳事起，联军过境。招集村人力为开导，晓以逃避之害。遂迎接洋人，设筵款待，村赖以安。联军既退，办理团练保甲，善后事宜。蒙大宪奖给五品衔。

张家还有一位世代行医的后人张凤龄。《霸县新志·张凤龄传》中如下记载：

先世自高、曾皆擅岐黄，尤长于眼科。得异人传，至今已五世相继。凤龄仰承家学，益求精进。立方每多奇效。求诊者日盈其门。遇贫贱者恒假以药饵。

因此之故，1918年，张凤龄曾被村民赠送“五世良医”的牌匾。我虽然看到了民国时代三种不同年份和不同抄本的张家族谱和家谱，但是还没有发现明、清时期的早期张氏线装本刊印的老谱，所以目前还无法断定张凤龄和张璧之间的亲族称谓关系。但是，由于张凤龄后来也加入了青帮组织，成为“通”字辈，则他至少在青帮里要比张璧小一辈。

1940年4月2日星期二，《实报》发表了张璧的题为《大成拳的命名：四存学会演述》一文，在该文中，他主张：“及与王芑斋相识，感到他的拳术，……合乎卫生条件，合乎技击原理，四存学会体育班，曾由医学家何绍文先生发表专论，留意体育消息的，想都已看过了。我就我的体认及何君的证明，王芑斋的拳

术武工可谓得武工的精神，合于卫生，合于技击，更合于科学及现代，以精神统一，训练神经系统，使身体各部官能作平衡的发展，神经健全，各器官的官能增加，不但可使身体健康，人格亦可随之而完善，作事能力，亦必增强，西谚有云：‘有健全的身体方有健全的事业’。”如此强调卫生和医学的科学训练，可见正是因为张家有中医学传统，我们就理解了当时张璧为何反复强调卫生和养生，并寄希望开展全民的体育和武术锻炼。

到了张璧的生父张岳宗时代，虽空有祖上老宅和部分田地财产，但是已经开始家道中落，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辉煌。据樊文程在《民国名人张璧》一文中介绍他：

常年在外当师爷，教家馆，爱好书法篆刻，不善管家理财，渐渐的家道中落，一年不如一年。地亩越来越少，人口越来越多，困难越来越大……^①

上述之说比较属实。

张璧的原配是王汝珍。王氏为张璧母亲给他操办的包办婚姻。张璧的父亲早逝，母亲辛苦持家，张璧是孝子，为听从母命娶妻，而一生未与王氏同居，但王氏一直是以正室的身份，长期住在张家。张璧待她彬彬有礼，负责她的一切开销和生活。直到“文革”时，王氏被从北京居住地樱桃斜街39号遣送回霸州大高各庄村的原籍。

1918年，张璧到北京后，将母亲和王汝珍等人一同接到北京

^① 见《霸州历史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名人卷》，河北霸州市政府出版物，2013年，237页。



张璧原配王汝珍（左一）和大嫂及其孩子们于中南海流水音

居住。随即他大哥张律生偕夫人等也搬到北京。大哥张律生毕业于保定师范学校，在当时的农村是少有的洋秀才，曾任霸县小学校长，大嫂也是教员。张律生无论是在经济上或是谋求生活上都给张璧以资助和启发，所以张璧特别敬重大哥。张律生来北京安家落户，生儿育女，育有子女 12 人。张律生来京后先携带妻小全家同住在樱桃斜街 39 号一个小四合院。后张律生于 1937 年 4 月 1 日开始就任旧北平市农事试验场场长，有了薪酬，他曾租住在中南海流水音。



张律生夫妇和部分子女于北京动物园

这里所谓的“北平市农事试验场”，即今天的“北京动物园”最早的名称。上述照片中的小老虎，就是当时北京动物园内的动物，并非张律生家私人所养宠物。张璧老家一直流传的“张律生是北京动物园园长”之说，其真实的职位当为如此。当时的张律生除了管理动物之外，还负责那里的农业试验田和农业科研机构的管理，并非只是狭义上的所谓“动物园园长”。

由于两个兄弟都婚后不育，因此张律生夫妇就加倍地承担起生育子女的责任来。这就是为何张律生夫妇子女特别多的原因吧。

三弟张旭昇在家务农。1930年代末他携家人也来到北京，一直住在樱桃斜街39号，直至“文革”时被遣送回霸州大高各庄村原籍。

张璧的妹妹张秀岩是早期中共党员，在兄妹中年龄最小。张秀岩从小就对封建社会重男轻女非常不满，坚决反对并身体力行拒绝女子缠足这种残害女性的陋习。十几岁时随大哥到县城里读书。1919年初，二哥张璧将其接到北京并考入了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即后来的女子师范大学）。李大钊同志和鲁迅先生等进步教授都在女高师任教。张秀岩积极参与了“五四”运动，并担任京、津两地学生联合会的联络员。1926年，她经郭隆真同志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张秀岩的影响下，张家十几位子侄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张璧自由恋爱娶的夫人是刘鸿英。刘氏自幼学京戏，曾以唱戏为生，遇到已是著名的青年军官张璧后，二人相互为对方所吸引。于是，张璧出钱给刘鸿英的父母，为其赎身，停止了她的卖唱生涯，然后二人正式结婚。婚后的刘鸿英，再也没有登台唱过戏，他们一生相伴。

刘鸿英身高约166厘米，属



张秀岩（早期共产党员）

于高挑身材的美女。自从张璧在 1948 年逝世后，未再嫁。长期无工作的她，解放后一直得到张家后代子侄们无私地照顾和接济，每月定期给她人民币 30 元作为生活费，一直持续到“文革”前夕。

“文革”开始，张家先后有八位亲属被捕入狱，余者亦被关入牛棚或下放劳动，自然也就无法继续接济刘氏的生活了。于是，张璧的夫人刘鸿英，断绝了经济来援，加之受到张璧问题的牵连被抄家，这位一直被邻居们称为“张姨”、为张璧守节近二十年的孤单而性情和善的老人，在租住的北京德胜门内大街羊房胡同 54 号的家中服“滴滴喂”自杀身亡。^①



^① 这一具体细节为我大学时代的同学向我提供的，他正巧也住在那个四合院中，并且向我提供了刘氏晚年的不少生活情况。在此向我的同学表示感谢。

二 张璧早年的军旅生涯

张璧少年时先是在家接受私塾教育，后正式就读并毕业于霸县高等小学。在他大哥张律生的帮助下，张璧到天津就读中学。

1902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在保定东关外创办北洋陆军将弁学堂，并设督练公所，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鄢玉春为总办，王振畿为提调，李士锐为总教习。修学期限，中级以上为半年，初级为一年。

同时，袁世凯又在北京设立练兵处以训练新军，并派人分赴正定、大名、广平、赵州、冀州各地，会同地方官精选壮丁6000名，分别训练。当时，袁世凯对新军的要求是“兵必合格，人必土著”的总原则。按名注册，由地方官员协助操练新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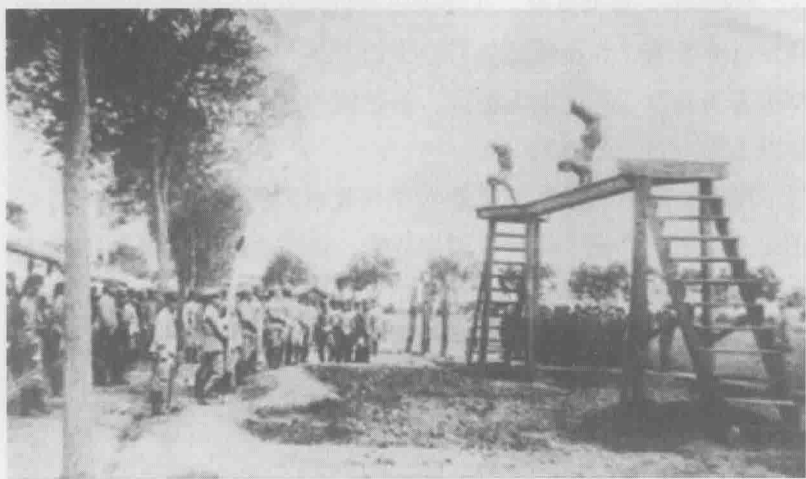
《清史稿》记载：

二十五年……二月甲申，申谕各省办积穀、清讼、团练、保甲。丁亥，命武胜新队名曰虎神营。举行京师保甲。戊戌，胶州湾德兵藉词护教，入沂州境。命吕海寰告德国外部，止其进兵。以新建陆军训练有效，予袁世凯优叙。

《清光绪朝实录》卷五百三十四：

光绪三十年八月初三，练兵处奏筹拟陆军学堂办法。上谕：“依议行。”

那一年，张璧17岁。1902年，张璧中学毕业后，为了减轻大哥的生活负担，就报名参加了北洋新军。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当时，张璧的军饷是每月二两五钱银子。这些钱足够可以保证当时一家几口人购买一个月的基本口粮。幼年丧父的张璧，几乎是在大哥的照料下完成了学业的。因此，当了兵有了军饷的他，极大地帮助大哥改善了家里的生活压力。



正在进行训练的张璧等北洋新军士兵

在新军中，张璧和同为军人的刘梦庚等人成为好友。

张璧在新军中，和其他军人一样，训练十分艰苦。由于当时的新军中已经有了德国和日本的军事教练，当时称之为“洋教习”。因此，毕业于中学的他，开始了日语学习。正是这些军事

训练基础和日语学习基础，两年后，使他进入了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学习。

当时的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录取工作很简单，基本上是面试决定，没有文化课和军事课的考试。而面试合格与否的原则依然是袁世凯的那句“兵必合格，人必土著”的要求。比如，当和尚的孙岳，穿着袈裟来参加报名考试，只因会武术，就被当场录取。

1903年，北洋陆军将弁学堂改名为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先后由刘永庆（1902-1903）、冯国璋（1904-1905）、段祺瑞（1906-）任总办（即校长）。

这时学堂的建筑格局完全模仿日本士官学校，也是一片气象森严的砖瓦结构建筑群。四面有高大的围墙，墙外有护城河环绕。这里原是一座拥有殿宇百间的关帝庙，1900年时曾遭八国联军焚毁。新建军校时，就利用原来的庙产并征用了邻近土地，改扩建而成。整个学校建成后占地达一百八十多亩。全校分校本部、分校、大操场和靶场四个部分。

本部居学校的中心，由南、北两院组成。北院是生活区，南院是教学区。南院的东、西两侧是教室和学生宿舍。当时的学制是两年。

1905年，20岁的张璧由于具有初步的日文基础，所以被分配在武备学堂的“洋文班”学习。

关于张璧哪年进入北洋陆军武备学堂的问题，目前为止，各类文字记录和相关文章均语焉不详。根据他和商震是同期同学，而商震是1905年17岁时考入的北洋陆军武备学堂的，故笔者曾主张张璧考入北洋陆军武备学堂也是在1905年，即他参加新军两年之后。我曾根据张璧1924年4月13日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而商震却是在晚他一年以后的1925年9月24日才获得这一军衔，



刘永庆、段祺瑞等晚清官员和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学生们合影

考虑到当时授予军衔时特别注重的入学或毕业于陆军学堂的时间先后这一论资排辈习惯，显然张璧的入学时间或许应早于商震的1905年。但是，由于在1906年9月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开除加入“同盟会”师生事件，正是在这一事件中，张璧和商震等人同时被除名——如果他是1904年入学的話，那么到了1906年的9月，他该已经毕业了而不存在被开除的问题。既然是被学校除名，可见他也应该是1905年入学。至于为何他早于商震一年被晋升为陆军中将，只有一个原因：当时他的察哈尔省全区警务处处长兼警察厅厅长这一职位是较重要的。

在北洋陆军武备学堂，“洋文班”是当时特别设立的以德、日模式培养军事人才的专业。当时的任课教师中就有日本人和德国人。据说他和商震上课时曾是同桌。

商震，生于1888年，卒于1978年。字启予，又作起予。河

北保定人。1905年，商震考入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到校后，他很快就加入了同盟会。但是，很不幸的是，1906年8月，张璧和商震等人因为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加入同盟会而被学校开除。

在不到两年的学堂生活中，张璧有了几个很好的朋友——孙岳、商震、张席珍等人。而和尚出身的孙岳当时则比他高一届，并且在1906年顺利毕业。

从下面这张照片来看，当时黑板上使用的语言可能是德文，但肯定不是日文。



洋教习和洋文班学生上课留影

1901年，刚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吴禄贞回国后，出任武昌将弁学堂军事教习。

吴禄贞，生于1880年，卒于1911年。湖北云梦人。1898年，他被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正是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孙中山，加入了兴中会。1901年，他回国后，意外地认识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并且被张视为奇才，加以保护和推荐，于是，吴禄

贞成了武昌武备学堂的教习。张之洞死后，吴禄贞特地向朝廷呈奏了《为已故大学士张之洞官鄂最久，功德在民，请建专祠事折》。师生之情，尽情表露出来。1903年11月4日，他和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周震鳞、翁巩、秦毓璠、柳聘农、柳继忠、胡瑛、徐佛苏等12人，在长沙保甲巷彭渊洵家举行秘密会议，开始创建秘密的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

关于具体创始人人数，刘揆一在《创立华兴会》一文中记载：

公乃邀合吴禄贞、陈天华、杨守仁、龙璋、张继、宋教仁、秦毓璠、周震鳞、叶澜、徐佛苏、翁巩、章士钊、胡瑛、柳大任、张通典、谭人凤、王延祉、彭渊恂、萧翼鲲、柳继贞、彭邦栋、陈方度、何陶、萧堃、朱子陶、任震、陈其殷、吴超澄及予弟道一等，创立华兴会于省垣连升街机关部。^①

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明德学堂正式成立，黄兴任会长。

5月，吴禄贞北上，调任北洋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即骑兵专业训练负责人）。正是他引领张璧、商震等青年军人走上了革命道路。

1905年，刚刚考入北洋陆军武备学堂的张璧，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导师、当时的教官、训练科马队监督吴禄贞。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张璧和商震等青年军人先后加入了秘密革命组织华兴会、同盟会。

^① 《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台湾国史馆，1996年。



“华兴会”骨干在日本合影

7月，在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的牵线下，孙中山返回日本东京，住在头山满的家中，倡导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

8月20日，在黑龙会的斡旋下，各派旨在推翻满清王朝的中国革命组织在东京黑龙会总部聚会，协商组建中国同盟会。同盟会由兴中会、华兴会、复兴会合并而成，正式宣告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

吴禄贞、张璧、商震等华兴会全体成员自动成为同盟会创始会员。至今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同盟会《乙巳、丙午两年会员名册》中，并没有记载张璧、商震的名字，但是有张继的名字。因为当时，加入同盟会必须有个人签署誓言的《盟书》，并将此《盟书》交到总会才算正式入会。而吴禄贞、张璧、商震等华兴会属于集体入会，所以没有保存下来他们各自签署的《盟书》。

1906年11月18日，朝鲜参政大臣朴斋纯致函朝鲜统监伊藤博文，意图侵占我国东北延边地区，要求日本政府派员前往中国延边地区保护实际上已经非法越境来华的所谓“朝鲜垦民”。针对于此，清政府在1907年7月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吴禄贞为随行任军事参议，处理东北事务。到达东北后，徐世昌调集了4000多名士兵，在重要地点设立“派办所”。深刻了解日本军事野心的吴禄贞首先提出“筹边之道，贵在知边”的建议。这一建议为徐世昌所接纳。于是，徐世昌派遣他到延吉调查边务，任命他担任延吉边务帮办。

从1894年日本出版的地图的左下方，可以明显地发现当时的日本已经确认间岛为中国领土。

由于缺乏人手协助开展调查工作，吴禄贞很自然地想到了他在北洋陆军武备学堂的几个懂日语的学生、同盟会会员张璧、商震等革命青年军人。1907年7月中旬，已被学堂除名的张璧、商震等人，被吴禄贞招揽到东北，参加北洋陆军，任初级军官，张璧从此开始了当军官的历史。吴禄贞既的军事导师，更是他的人生导师，是他引导张璧走上了革命道路。

间岛原名垦岛，因有大批朝鲜移民长期非法越界垦荒而得名。该地区位于图们江北岸，最初是指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光雾峪前的一处滩地，自古属中国领土。韩国一些团体却认为“间岛”是指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的中国延边朝鲜族聚居地区，包括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市。至今，朝、韩两国部分政客仍意图对中国提出所谓领土主权的要求。

1907年7月11日，日本驻华使节阿部照会清政府外务部，居然声称：“间岛究为清国领土，抑为韩国领土，此事悬案已久，迄



1894年日本出版的地图已确认间岛为中国领土

未解决。”与此同时，日本派遣大批间谍人员到那里进行勘察和刺探军事情况等活动，并不断地挑起事端。日本外务省甚至派遣斋藤季治郎任间岛派出所的所长，意图形成对那里的实际管辖局面。

这个斋藤季治郎，是当时日军中的所谓中国通。他生于1867年，卒于1921年。在1899年至1904年曾任杭州武备学堂洋文班的教师。后来晋升为日军第十一师团中将师团长。

1907年8月，吴禄贞得到日本军队在间岛附近集结的消息，立即让张璧、商震等人带领军队与当地民团，做好防御准备。然

后，吴禄贞向日本军官斋藤季治郎致信，表达守卫领土的决心，要求对方立刻无条件地退出边界。吴禄贞在信中严正声明说：“延吉厅所辖之地是中国领土，我国早已设置官衙，军队在此管辖，已为万国所公认。”并且要求日本宪警“立即撤走”。^①这是军人的张璧第一次亲身参与的保卫祖国领土的行动，这对他今后的军事生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斋藤见清军已经有了防备，不得不下令日军撤出中国边境。然后，斋藤季治郎向日本外务省撰写了详细的报告和建议。见电报原始文献：



斋藤致日本外务省电报原文及其附件

而吴禄贞也亲自主持撰写了《延吉边务报告书》，并绘有《延吉边务图》。后来，清政府以此为中日谈判的重要依据，终于让日军彻底退出了间岛地区。

1909年5月，吴禄贞升任延吉边务督办，并任北洋陆军协都统（即该军最高负责人的助理）。9月4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北京签

① 引见《外務省警察史》。东京不二出版社，2001年。

订《图们江清韩界务条款》，又称“间岛协约”。该条约完全确立了间岛为我国领土、以图们江为国境、在江源地方以界碑为基点、以石乙水为分界线的总原则。

1910年，处理完间岛问题后，吴禄贞在庆亲王的推荐下，调任北洋陆军第六镇统制（即该军最高负责人）。于是，张璧、商震等人也追随吴禄贞回到关内，随后张璧担任了北洋陆军第六镇的三等参谋官。

第六镇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总部驻地在北京南苑。原统制为段祺瑞。现在改由吴禄贞统领，自然是由于段、吴二人曾在北洋陆军武备学堂时代的上下级关系。当时北洋陆军主力一共编制六个“镇”，一镇有12000余名官兵，“统制”是镇的最高长官。经过这次间岛纠纷，追随吴禄贞的张璧彻底明白了日本军事力量的强大，也使得他意识到外交周旋和军事准备两者缺一不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但是北方却依然在清政府和北洋陆军的控制下。这时，驻守山西的清军发动起义，八十六标标统（即该军最高负责人）阎锡山被推举为山西革命军都督。清政府立刻命袁世凯派兵镇压。于是，袁世凯派遣自己的精锐部队第六镇前往镇压。但吴禄贞带领张璧和全体军兵却前往了石家庄。

在石家庄营地，吴禄贞认为革命的时机已到。于是，他在娘子关带领张璧等贴身参谋，和阎锡山单独会面商谈，决定组建“燕晋联军”，定于11月7日一起回师北京，讨伐清政府，发动“中央革命”。

据樊文稷《民国名人张璧》一文的说法，当时的吴禄贞曾激动地对张璧、商震等全体军官演讲说：“荫昌倾北京精锐之师南

征武昌，诸位如果要和我一起倒戈，进攻兵备空虚的北京，可以兵不血刃而定天下，然后绥靖士民，易置帝政，而传檄东南，释甲寝兵，天下事可大定。”^①



张璧的革命导师吴禄贞



张璧的同窗好友商震

张璧、商震等人积极地响应吴禄贞的主张。他们先是谎称已经招安阎锡山的军队，而后张璧、商震带兵又在石家庄扣压了运往湖北进行镇压的饷银二十万两和大炮十门及粮食等重要军事物资。此时，吴禄贞的言行被军中的密探密报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得到了密报后，才明白自己的爱将吴禄贞这时也已经成了逆党。于是，袁世凯下令段祺瑞刺杀吴禄贞。段祺瑞以重金买通了吴禄贞手下的骑兵营长马步周，将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参谋官张世膺、副官周维桢等第六镇上层军官刺杀于石家庄军营中，北洋陆

^① 《霸州历史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名人卷》，河北霸州市政府出版物，2013年，297页。

军第六镇的起义遂宣告失败。如果吴禄贞不死，他很可能在民国初期成为一名大军阀，张璧和商震都将成为他手下的重要将领，也许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和民国的格局将彻底改写了，可惜一切还只是“假设”和“如果”而已。个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大小和价值，往往很难准确地说清楚。

吴禄贞被杀后，袁世凯立刻在第六镇展开肃清逆党的行动。张璧、商震等青年军官自然在被肃清之列。于是，张璧在军中同盟会分子的安排下，逃往东北的奉天省。

为了躲避追捕，他开始使用“张君玉”这一名字。这一名字后来被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的张璧档案记录下来，足以证明其真实性。

1911年10月底前后，张璧在奉天加入了影响他一生的一个传统组织——青帮，引导他进入青帮的师傅是当时青帮“理”字辈的王约瑟。当时按照青帮的辈分，张璧在青帮属于“大”字辈。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张璧在奉天充分利用了青帮组织和他毕业于军事学校的特长，和商震发起组织了陆军小学，招集学生学习，计划建立东北地区的“光复军”，积极地策应武昌革命。他和同属于“大”字辈的青帮成员、同盟会成员顾人宜、杨子厚、杨大实、蓝天蔚、朱霁青、蒋大同、徐于、刘乾一、陈干、祁星宸、石磊等青年，包括辛亥革命成功后的陆军中将厉大森等人，成为了革命战友。他们一起参与组织了著名的高力门起义、凤城起义和开原起义三次起义，为辛亥革命在东北地区的发展和推广取得了辉煌的战绩。频繁的起义证明了当时奉天的革命活动的积极和张璧等军事学校毕业生的领导能力和军事指挥能力。

1911年11月13日，山东省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宣布独立。

11月中下旬，张璧等人带领数十名革命青年学生，到达辽阳西南刘二堡村，在那里建立了“光复军”革命基地。

11月24日，在袁世凯第五镇军队的打击下，山东又被迫取消独立。当时，主张继续独立的革命党人建议加入中华民国政权。

11月25日，张璧和商震等人在辽阳西南刘二堡村再次打出了发动起义、召集“光复军”人马的白旗标志。此举迅速引来了当时的辽阳地方官员和巡警、军队的镇压。11月29日，张璧等人组织敢死队，准备起义。当天夜晚，商震因为临时有事外出，离开这里得以幸免于难。前来镇压的赵尔巽的军队将张璧等“光复军”起义者团团围住。经过激烈的交火，枪少弹绝的起义者牺牲了数十人，而张璧等部分有军事经验的起义者成功突围逃生。

张璧、顾人宜、蓝天蔚等人带领突围成功的“光复军”部分成员渡海到达山东烟台，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海外回到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政府大总统。

1月20日，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政府应山东地区同盟会和革命党人的要求，委派胡瑛出任山东都督府都督。

胡瑛生于1884年3月28日，卒于1933年。原名胡祖懋，字敬吾。后改名瑛，字经武，号宗琬。湖南桃源县人。1903年，他在就读长沙经正学堂期间，协助黄兴，参与创建了华兴会。1905年6月，他留学日本。8月，他在日本参与创建了同盟会。1906年2月，短期回国领导革命活动。1907年，他在汉口被捕并被判死刑。后经直接找到张之洞说情营救，他被改判无期徒刑。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政府大总统合影

1911年1月，与蒋翊武、詹大悲等人在武昌组织革命团体文学社，胡瑛为该组织领导人之一。武昌起义后，胡瑛任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于是，胡瑛亲自到汉口各个租界，宣传中国革命宗旨和军政府的对外政策，赢得在汉口各个驻外使馆的理解与支持。

胡瑛带领着黄兴手下的3000名革命军人到了山东后，2月21日，立刻联系上了正在烟台组织革命活动的华兴会的老友、“光复军”起义领导者之一的张璧，让他带领东北“光复军”，全体整编加入他带来的军队中。于是，在胡瑛领导下，张璧带领的东北“光复军”成员在烟台芝罘岛建立了革命基地，建立了一支新的军队——“关外民军”。时为军人的张璧，成了山东都督府都督胡瑛最信任的革命武装领导人。

按照当时日本外务省的情报记载：

在谁来当这一军队的最高领导人的问题上，张璧和商震、杨大实三人之间展开了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军事学校毕业的张璧、商震任“关外民军”正、副总司令。而杨大实则落选退出，并离

开了“关外民军”。

自此，张璧第一次成了一支军队的领导人，为他进入民国时代积累了革命资本。特别是张璧亲自出马，并利用他在青帮的地位和关系，策动烟台、青岛、威海等地北洋海军中的青帮分子先后易帜转向革命，更使他威名远扬。史称这次革命行动为“芝罘独立”。



山东独立时代的张璧（前右一）与商震等和宋教仁（前右二）合影

如果说吴禄贞引导张璧走向了革命，那么胡瑛则将张璧领导的东北光复军推向北方革命的前台。正是在1911年11月至12月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革命活动，山东省的同盟会“武”先锋张璧和河北省的同盟会“文”先锋张继，一时间赢得了“北二张”的名声。和“北二张”并立的“南胡汪”，就是时任广

东军政府大都督的“武”先锋胡汉民和时任南方议和参赞“文”先锋汪精卫。故时人称之为“南胡汪，北二张”。

1912年1月22日，胡瑛在山东烟台宣布独立。

2月初，清政府派遣军队进攻山东。胡瑛向南京政府告急，要求增兵。于是，一直在南方领导“光复军”的李燮和带兵前来支援。李燮和立刻派遣手下“光复军”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炯和团长周朝霖，带领三个营，日夜兼程赶赴烟台。张璧立刻和李、周率领的部队会合，他们带领各自的军队，联手协助胡瑛，最终导致了山东再次脱离清朝统治。

2月12日，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清朝彻底结束。

3月19日，袁世凯下令解除胡瑛山东都督府都督之职，改任新疆屯垦使。他辞而不就。可惜革命成功以后的胡瑛，在袁世凯的阴谋打击下，丧失了所有军事指挥权之后回到日本，一度与李燮和等人一起又转而支持袁世凯称帝，从革命蜕化成了反革命。这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人性中最为软弱的妥协性一面。《蒋介石日记》1915年8月14日中就明确记录：“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

应该说，辛亥革命成功之前的张璧在吴禄贞、胡瑛等几位民主革命导师的正确引导下，他的人生价值观和理想是非常积极和进取的。

三 青年时代投身革命

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宣统皇帝溥仪下诏退位。清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下诏袁世凯组建中华民国。

3月，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组建第一届内阁政府。同盟会会员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赵秉钧任内务总长，陆征祥任外交总长。内阁部长中半数以上是同盟会会员。与此同时，袁世凯正式邀请孙中山、黄兴赴京，共商国计。

这时候的张璧，依然领兵驻扎在山东军中。

8月24日，孙中山到达北京，袁世凯以国家元首的规格隆重接待。在欢迎孙中山举行的盛大宴会上，袁世凯盛赞孙中山说：

……今见孙先生来京，与我谈者极其诚恳，可见前此谣传尽属误会，民国由此益加巩固，此最可欢迎之事。^①

当时，袁世凯任命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授予黄兴陆军上将军衔。

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但是袁世凯对

① 《民立报》1912年8月30日。

选举结果不予承认，并另行任命他人。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彻悟袁世凯之独裁行为后，于6月15日愤而辞职。而继任的陆征祥，很快又遭到议院弹劾而辞职。

于是，赵秉钧在当年8月当上了袁世凯政府的第3任国务总理。8月5日至11日，同盟会改组成为国民党。8月25日，孙中山当选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



袁世凯



孙中山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被刺，两天后身亡。

在事件尚未明朗化之前，孙中山率先发布宋教仁暗杀事件的幕后黑手是袁世凯，意在让民众对袁世凯政权产生不满，阻止袁世凯在4月8日召开的第一届国会上当选。袁世凯当然予以否认。当时的证据显示国务总理赵秉钧涉嫌教唆杀人。

但是，这时京师警察厅总监王士馨在报纸上却公开发表言论说：“杀宋决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此责自有人负。”袁世凯因

为不满属下京师警察厅总监王士馨在报纸的如此言论，立刻下令调查王士馨的贪污受贿问题，并以此罪名处决了王士馨。

宋教仁被杀案至今依然是历史之谜。但是有一点却很明确，那就是此事件将袁世凯和孙中山二人的敌对予以公开化。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孙中山的指示下，在江西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在江苏，孙中山推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随后安徽柏文蔚、上海陈其美、湖南谭延闿、福建许崇智和孙道仁、四川熊克武，也先后宣布独立。7月18日，陈炯明在广州响应孙中山号召，宣布“广东独立”，此为史称的“二次革命”。7月22日，黄兴派兵攻打徐州时，张璧接到黄兴的命令，带领部下从山东亲自赶到徐州，前来接应。袁世凯派大将冯国璋、张勋率北洋陆军前去镇压。很快，他们打败了黄兴、张璧等人的讨袁军。7月28日，黄兴临阵出走，讨袁军全军动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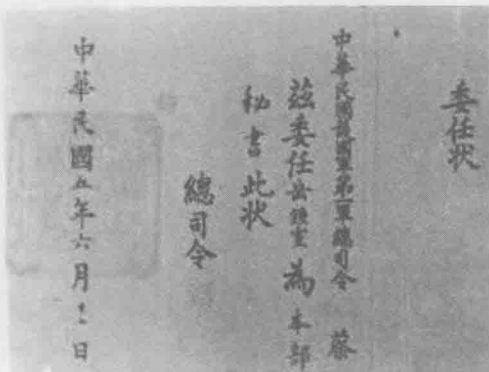
8月13日，北洋陆军攻占广州。

9月1日，北洋陆军攻克南京，致使各地宣布取消独立。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被通缉，他们相继逃入停在上海和广州等地的日军军舰上，然后在日军保护下亡命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败。张璧等人在黄兴建议下，率部南下，逃往远离政治中心、相对比较安全的云南，投靠于云南督军唐继尧麾下，任第一梯团参谋长。10月6日，国会选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

11月4日，袁世凯宣布解散国民党。11月26日袁世凯发布《严惩倡言二次革命党徒》的通令，对国民党员进行追杀。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推戴书”，自称皇帝。12月25日，原云南督军蔡锷从北京潜回云南后，推唐继尧为都督，

通电讨袁。蔡锷自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率部向四川进攻。



蔡锷及其签署的委任状

讨袁通电的全文如下：

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都统、镇守使、师长、团长、各道尹公鉴，并转各报馆鉴：

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輿情，自为帝制，卒召外侮，警告迭来，干涉之形既成，保护之局将定。尧等忝列司存，与国休戚，不忍艰难缔造之邦，从此沦胥；更惧绳继神明之胄，夷为皂围。连日致电袁氏，劝戢野心；更要求惩治罪魁，以谢天下。所有原电，迭经通告，想承鉴察。何图彼昏，曾不悔祸，狡拒忠告，益煽逆谋。

夫总统者，民国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总统之资格。尧等深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即日宣布

独立，为国婴守，并檄四方，声罪致讨。露布之文，别电尘鉴。更有数言，涕泣以陈诸麾下者。

闯墙之祸，在家庭为大变；革命之举，在国家为不祥。尧等夙爱和平，岂有乐于兹役？徒以袁氏内罔吾民，外欺列国，召兹干涉，既濒危亡。苟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

尧等今与军民守此信仰，舍命不渝，所望凡食民国之禄，事民国之事者，咸激发天良，申兹大义。若犹观望，或持异同，则事势所趋，亦略可预测。

尧等志同填海，力等戴山，力征经营，固非始愿所在；以一敌八，抑亦智者不为。麾下若忍于旁观，尧等亦何能相强？然量麾下之力，亦未必能摧此士之坚；即原麾下之心，又岂必欲夺匹夫之志苟长此相持，稍亘岁月，则鹬蚌之利，真归于渔人；而其豆之煎，空悲于铄釜。

言念及此，痛哭何云！而尧等则与民国共死生，麾下则犹为独夫作鹰犬，坐此执持，至于亡国，科其罪责，必有所归矣。今若同申义愤，相应鼓棹，所拥护者，为固有之民国；所驱除者，为叛国之一夫。匕鬯不惊，天人共庆。造福作孽，在此一念之危微；保国覆宗，待举足之轻重。

敢布腹心，惟麾下实图利之！

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及军民全体同叩。^①

^① 《时事新报》1915年12月28日。

当时任左路第一梯团参谋长的张璧，立刻积极响应，带领士兵参加了护国战争。护国军第一军下设左、中、右三个梯团六个支队（即师），每个梯团下设两个支队。其中左路第一梯团为精锐部队。武器多为德国制造，有当时著名的“退山炮”（与后来的“过山炮”不同），也有重机枪。而另外两个梯团的装备则较差。



护国军将领合影

第一梯团团长为刘云峰，参谋长是张璧。第一梯团下设两个支队。第二梯团的支队长就是日后著名的开国元勋朱德元帅。

第一梯团从云南昭通出师，一举打到了四川叙州府（即宜宾），准备拿下叙州府。1916年1月19日，刘云峰、张璧带领第一梯团的2000多名精锐官兵来到金沙江边。

当时，袁世凯派来迎战的部队是中华帝国名下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是冯玉祥。面对敌我军事对比，张璧建议兵分两路，一支以迂回战术攻击临近的柏溪，另一支则渡过横江到金沙江上

游，攻打安边。然后再直取叙州府。

1月20日，护国军第一梯团先是占领了安边，当天夜里就拿下了叙州府。1916年1月21日的《民国日报》报道：“滇军在叙州大捷。”

当时派来镇压的冯玉祥，内心也对袁世凯的复辟行为非常不满。

冯玉祥生于1882年，卒于1948年。原籍安徽。北洋陆军著名将领，后成为民国时代著名西北军领袖人物。因在保定出生长大，所以自认为是直隶河北人。



冯玉祥



刘云峰

当他得知护国军第一梯团团长刘云峰、参谋长张璧，都是他的直隶老乡时，就希望双方和解。结果却遭到了张璧的一口回绝。

张璧告诉冯玉祥：他认为眼下不是和谈，而是立刻无条件地缴械投降。

关于这一历史经过，韩宗哲在《韩复榘与西北军》一书中如下陈述：

冯回师至南溪，因参谋蒋鸿遇与护国军梯团长刘云峰即是直隶同乡，又是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同学，遂命蒋与刘部电话联系，希望双方罢兵言和，刘部接电话的是刘的参谋长张璧，张新胜气壮，态度强硬，竟以冯旅缴械为谈判先决条件。^①

面对如此态度的张璧，冯玉祥也只好坚持进攻了。于是，一个叙州府，双方几次易手。一直到3月2日，冯玉祥才彻底拿下并守住了叙州城。

过了很多年以后，张璧虽然已经是冯部的将领之一了，可是冯玉祥却一直没有忘记这段经历，他总是对自己的手下爱将们谈起和张璧相识的这段往事。冯玉祥的心里是赞叹欣赏还是有些耿耿于怀，我们还真难以分辨。

这时，为了打击冯国璋的中华帝国的陆军，蔡锷派张璧去武汉，劝说冯国璋加入反袁阵营。时任中华帝国参谋总长的冯国璋，也是张璧的直隶老乡和北洋陆军武备学堂时代的老师，他非常欣赏这个学生老乡的口才，当时他也劝袁下野，于是，冯国璋强留张璧在自己军中任参谋长。

在《民国军人志》中简略描述了此时期的张璧：

武昌起义爆发时，参加胡瑛芝盟独立，响应辛亥革命。

^① 《韩复榘与西北军》，团结出版社，2011年，第58页。

1913年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云南。护国军反袁起义时，协助唐继尧组织起义，任第三军第一梯团参谋长。作唐之代表赴南京与冯国璋联系。^①

张璧有很好的口才，根据《张玉衡先生治丧处》中的记载，张璧曾经“又为友人排解纷事，委屈陈说，泪随声下，双方感动，意见冰释”。

这一不知道是福是祸的决定，却使张璧从此脱离了护国军和蔡锷的直接领导，使他成了那个军阀时代的独行侠。他不是任何一个大军阀的下属，只是一名具有民国意识的民国军人。

冯国璋生于1859年，卒于1919年。字华甫，汉族，河北直隶河间县西诗经村人。他1885年考入北洋陆军武备学堂，成了该学堂第一期步兵学员。



冯国璋

因获得袁世凯对他军事才能的特别赏识而快速晋升。先被任命为督操营务处总办，新军兵法操典多出自他一人之手。他与段祺瑞、王士珍被称为“北洋陆军三杰”。1901年，袁世凯创建军政司，下设兵备、参谋和教练三处，冯国璋任教练处总办，负责创办将弁学堂。1903年，冯国璋任清朝练兵处军学司司长。1912

^① 王俯民：《民国军人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59页。

年9月，冯国璋出任中华民国直隶都督兼民政厅长。1913年12月16日，冯国璋任江苏都督并晋升为陆军上将。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登极”成为“中华帝国大皇帝”，改元“洪宪”。面对袁世凯背叛民国的罪行，孙中山发出了“绝不使危害民国如袁氏者生息于国内”的号召，要求各地反袁力量“扑杀此獠，以绝乱种”。

2月，冯国璋联络江西李纯、浙江朱瑞、湖南汤芑铭、山东靳云鹏等四位将军联名发出密电，要求取消帝制。时称“五将军密电”。

3月1日和16日，冯国璋公开致电北京政府，劝袁及早退位。各省军阀纷纷效仿。很快，江西、浙江、山东、四川等袁系督军联名致电袁世凯，逼其取消帝制，并先后宣布脱离袁世凯的中华帝国而独立。3月22日，袁世凯迫于无奈，只得宣布取消帝制。

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冯国璋被国会选为副总统。

1917年7月，张勋复辟期间，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

8月，冯国璋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从此开始，张璧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冯国璋的部下，正式定居北京。

1919年，冯国璋没有忘记他的这个直隶老乡，封张璧为“北方招讨使”，这是个掌握军政大权的地方长官。办公地点在察哈尔省的张家口特别行政区。在这期间，张璧往来于北京和张家口两地之间，与直系军阀中的河北老乡多有交往，特别是和冯玉祥、韩复榘、宋哲元、冯志安、孙岳等人意气相投，成为好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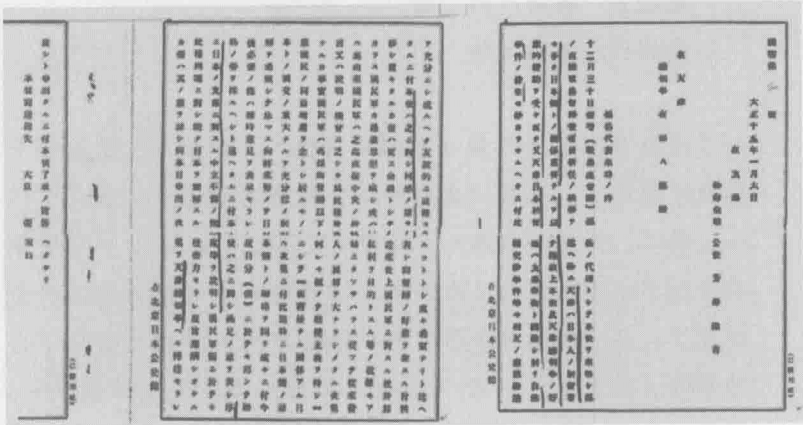
樊文稷在《民国名人张璧》一文中说：“其后张璧又出任‘河东盐运使’、‘山西盐运使’，主管山东、苏北、山西盐场及其专卖权。”^①

此说可能欠妥，因“河东盐运使”的管辖地在陕西，不在山东，更和苏北无关。也没有“山西盐运使”一官。或有人主张“河东盐运使”是“山东盐运使”之误，此说也不当。晚清和民国初期共设盐运使7人，即直隶、山东、两淮、两浙、广东、四川（宣统二年由盐茶道改设）、奉天（宣统二年增设）各1人。笔者尚未发现张璧任职山东盐运使的记录。这段时间他应该一直在张家口任职。张璧是否担任过“盐运使”一职，目前还缺乏力证。此职始置于元代，设于产盐各省区。明清相沿，全称为“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简称“运司”。其下设有运同、运副、运判、提举等官。

1921年12月30日，当时已经任“税务处会办”的张璧，代表他的老朋友孙岳将军前去拜访日本大使馆。税务处成立于1906年，“会办”即相当于税务处的副大臣。当时是部下直属的厅局级机构，副大臣即相当于副厅长。

张璧代表孙岳将军前去拜访日本大使馆，日本外务省外交公文史料馆保存的原始电报记载了这次张璧的来往，该电文见如下原始照片：

^① 见《霸州历史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名人卷》，河北霸州市政府出版物，2013年，231页。



该电报全文如下：

機密第 13 號

大正十三年一月六日

在支那

特命全權公使 芳澤謙吉

外務大臣男爵 幣原喜重郎 殿

大正十五年一月六日 附 有田總領事宛

機密第三號 信寫送附

孫岳、張璧ノ件

機密第三號

大正十五年一月六日

在支那

特命全權公使 芳澤謙吉

在天津

總領事 有田八朗 殿

孫岳代表來訪ノ件

十二月三十日張璧（稅務處會辦），孫岳ノ代表トシテ本使ヲ來訪シ、孫岳ノ直隸軍務督辦兼省長就任ノ挨拶ヲ述ヘ、特ニ、天津ハ日本人ノ居留者モ多ク日本側トノ關係重要ナルヲ以テ、施政上本使及天津總領事ノ好意的援助ヲ受ケ度ク、又、天津日本居留地ハ支那市街ト鄰接シ居リ、自然事件ノ發生モ、勘カラサルヘキ付、此種交渉事件等モ、相互ノ意思疏通ヲ充分ニシ成ルヘク友誼的ニ處理スルコトトシ度キ、希望ナリト述ヘタルニ付、本使ハ之ニ對シ、同感ノ意ヲ表シ、尚、督辦ノ好意ヲ謝スル批評鮮カラス國民軍力、過激思想ヲ藏シ、或ハ、私利ヲ目的トスル等ノ批難モアル處、由來國民軍ハ、之迄直接中央ノ政局ニタツサハラス從ツテ從來、發言、又ハ、説明ノ機會ニ乏シキ為、此種世人ノ誤解ヲ大ナラシメタル次第ナルカ、事實國民軍ハ、馮、孫兩督辦以下何レモ極メテ、穩健主義ヲ持、一意國民ノ利益増進ヲ念トシ居ルモノニシテ、一面密接ナル關係アル、日本トノ國交ノ重大ナルヲ二人充分認メ居ル、次第ニ付次點、特ニ、日本側ノ諒解ヲ希望シテ、息マス、尚將來努メテ、日本側トノ聯絡ヲ圖リ度キ付、今後必要ノ飾ハ、隨時意見ヲ表示セラレ度、自分（張）ニ於テモ喜ンテ、聯絡ノ勞ヲ采ナルヘシト、述ヘ付タルニ、本使ハ、之ヲ對シ、満足ノ意ヲ表シ、序ニ、日本ノ支那ニ對スル中立不偏ノ態度ヲ説明シ、國民軍側ニ於テモ、此種問題ニ對シ、能ク日本ヲ理解スル様盡カセラレリ度旨、應酬シオケ

ルカ、張ハ、其ノ意ヲ諒シ、尚、本日中申出ノ次第ヲ天津總領事ヘモ傳達セラレリ度シト、申出タルニ付、本使了承旨答ヘオケリ。

本信寫送附先 大臣 張家口

该电文是当时的天津总领事有田八郎向日本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芳泽谦吉汇报此事的电报。保密程度属于“绝密”。根据该电文记载，张璧代表孙岳要转达的内容大致如下：

1. 代表刚升官的孙岳向日本大使馆问候。
2. 注意到天津日本人很多，孙岳将努力发展和日本的关系。
3. 如果中日两国军民之间在京、津地区发生任何意外事件，希望事先保持相互沟通。

孙岳生于1878年，卒于1928年。本名孙耀，字禹行，直隶高阳人。1904年，孙岳考入北洋陆军武备学堂。1906年毕业后，先后任北洋陆军第三镇炮兵排长、三等参谋等。1911年，孙岳与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策划滦州起义。由于事泄，在起义前夕，孙岳被开除军籍。于是，孙岳南下投奔孙中山和黄兴，被委任为苏、淞、宁、杨、镇五路军总司令。民国成立后，他被曹锟任命为北洋第三师军官教导团团长。后晋升为京畿警备副司令。他是冯玉祥的结拜兄弟，因为年长于冯，故冯玉祥一直称他为“二哥”。1923年11月13日，孙岳秘密地拜访了冯玉祥，也许那时他们二人就已经开始商量里应外合发动北京政变的问题。而孙岳又是张璧多年好友，也许是他提议使冯玉祥下达了张璧归队的命令。当天，冯玉祥日记中留下的记载是“与孙镇守使密谈”，具体内容则没作任何交代。1924年10月23日，孙岳参与冯玉祥的北京政变，打开城门，和鹿钟麟内外配合，放冯军入城，囚禁

曹锟。1925年，孙岳任河南省长。11月，转任直隶督办兼省长。因为和张璧是同学又是老乡的关系，他十分信任张璧，所以才委托张璧亲自去日本大使馆进行沟通。

日本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芳泽谦吉曾在1923年8月29日下午拜访过西北军领袖冯玉祥。二人交谈的是“日俄库伦交涉事及各国风俗人情”等话题。冯还带他到西北军的学兵团去参观。



孙岳



芳泽谦吉（日本大使）

从晚清变法到蒋冯中原大战，全有日本势力介入其中。利用日本势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当时的一个趋势和习惯。

1922年9月13日，冯国璋推荐张璧出任察哈尔特别行政区第四任全区警务处处长兼警察厅厅长。这为他两年后出任京师警察厅总监打下了警务工作基础。张璧的这一职位也是笔者首次发现并予以公布出来的。

此时张璧的月薪是大洋300元。
察哈尔特别行政区以直隶省口北道和绥远都统、察哈尔部、

锡林郭勒盟设置。治张北县（今河北张家口市）。辖境相当于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1928年撤销，改置察哈尔省。因此，曾经有人在文章中说张璧曾“任张家口警备司令”。其实，他真正的职务是全区警务处处长兼警察厅厅长，负责全区的警备工作。

根据郭卿友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我们列表如下：

	刘效庸	1927年9月21日	
全区警务处处长兼警察厅厅长	张钰元	1916年12月31日	
	王源馨	1920年4月1日	代理
	傅鼎忠	1922年2月9日	1920年12月8日代理
	张璧	1922年9月13日	
	胡德华	1924年4月24日	署理
	夏瑞卿	1924年9月29日	署理
	宋式熊	1925年1月4日	
	王冠军	1925年6月8日	署理
	黄中钦	1926年3月14日	
	张鲁昆	1927年9月8日	
	周树标	1916年1月29日	

1923年4月22日，中华民国政府鉴于张璧在推翻晚清政权和辛亥革命先后的一贯表现，决定授予张璧“陆军少将”军衔。

1924年4月13日，时任察哈尔特别行政区全区警务处处长兼警察厅厅长的张璧，在冯国璋推荐下晋升为“陆军中将”。陆军中将张璧——这一称号是对他推翻满清政权、投身辛亥革命的前半生的一个最好的总结！

1924年4月，一心准备找机会和奉系军阀决一雌雄的冯玉祥，在连续两年的时间内买飞机和大炮，严肃整治军队，并操练新兵。觉得准备差不多时，冯玉祥想到了他的得力干将张璧，他给张璧发电报，让他立刻回到西北军司令部待命，对他“另有要事承担”。这里的所谓“要事”，应该就是1923年11月13日孙

岳秘密拜访冯玉祥时二人密谈的发动北京政变。显然，这时的冯玉祥已经把张璧列入直系心腹将领了。

4月23日，张璧结束了在察哈尔特别行政区的工作，来到冯玉祥身边。张璧的这一辞职行为，使他彻底脱离了冯国璋系统，而走进了冯玉祥系统。这是他第二次脱离了自己的上司，上一次是脱离了蔡锷系统而加入了冯国璋系统。

一周以后的5月1日上午9点，张璧出现在北京旃檀寺冯玉祥的家中，正式报到。

这一天，张璧向老上级汇报了他在察哈尔任职期间所见所闻的种种公府紊乱现状，当时的察哈尔省腐败问题十分严重。宋哲元曾出任那里的省主席，并在上任之初，就主张：

首以澄清吏治，建设廉洁政府为己任，迭次通令所属尊行。^①

这个时候，张璧是宋哲元的下属。因此，宋哲元也曾发表过关于警察工作的指示：

公安局与军队性质相近。故以军队为比，务须十分留意警察之行为，不使有违法扰民情事。^②

张璧的汇报自然是表达了他想要改变社会的雄心。可以看

① 见《抗日名将宋哲元家族史料研究》，1992年，359页，国内印刷本，印刷批准号：津东文图字（92）第00074号。

② 见《抗日名将宋哲元家族史料研究》，1992年，360页，国内印刷本，印刷批准号：津东文图字（92）第00074号。

出，此时的张璧依然是具有辛亥革命精神的军人。

这时，冯玉祥并没有给他立刻安排具体的职务，但是让他以高参的身份，参加司令部所有高层军事会议。8月26日，张璧参加了冯玉祥主持召开的高层军事会议，参与拟定了下一步的军事作战计划。

四 北京政变中的逼宫先锋官

1922年5月，张璧的直隶老乡、和他同在北洋陆军当过兵的陆军上将刘梦庚任京兆尹（即当时的北京市市长）。

1923年10月5日，曹锟通过贿赂选举人，在吴佩孚的武力支持下，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此举立刻引起了全国各地的反对和声讨。

1924年9月15日，张作霖以15万大军，分两路向驻守山海关、赤峰、承德的直系军队发起进攻。整个战争期间，日军向张作霖提供了大量的弹药和武器。9月17日，大总统曹锟发布了讨伐张作霖的命令，并任命吴佩孚为总司令，带领25万人马迎战。18日，直、奉双方在山海关、热河一带发生激战。第二次直、奉军阀大战正式爆发。就在9月15日的当天，张璧出席了冯玉祥主持召开的西北军全体将士大会。冯玉祥在会上作了第二次直奉大战的动员讲话。

10月11日，吴佩孚亲赴山海关督战。时任直系军队第三军总司令、陆军上将的冯玉祥，领兵出古北口作战。由于他和吴佩孚长期不和，吴佩孚断绝了给他军队的给养。在古北口徘徊不前的冯玉祥，暗中与张作霖、段祺瑞缔结密约，然后决定回师北京。

10月21日上午10点，冯玉祥召集张璧、王乃模等六人，商讨进攻北京后的工作安排。当时，因为张璧的察哈尔警察厅厅长职务经历，就已经预定了北京政变成功后由张璧全权负责京师警务工作。这应该也是1923年11月13日冯玉祥和孙岳密谈的具体计划之一。

10月24日上午8点，张璧向冯玉祥报告李虎臣部已到丰台。负责拱卫京师以南防线的李虎臣率部到达，在丰台、通州一线展开布防，阻击直系军阀吴佩孚派来的军队。

10月25日下午两点半，冯玉祥主持召开西北军高层将领参加的“军事政治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冯玉祥初步说明了准备发动北京政变的军事计划。

10月28日，冯玉祥带领军队进入北京，包围了总统府，将中华民国总统曹锟监禁在中南海，勒令其解除了吴佩孚的全部职务，然后宣布成立“国民军”，自任总司令。

11月2日，冯玉祥任命陆军中将黄郛为代理内阁总理，任命具有陆军中将军衔的张璧为京师警察厅第六任总监，接替了陆军中将薛之珩担任的京师警察厅第五任总监的职位。

此时张璧的月薪高达大洋1000元。

笔者曾委托一友人在北京公安局旧档案中查找民国时代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档案材料。照片中“身穿京师警察厅总监礼服的张璧”和旧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保存的张璧原始档案，就是出自这位友人的帮助。^①

近代警察制度是从晚清开始的。1901年9月，袁世凯在天津废除了传统的“绿营”，开始创办“巡警”。这是近代中国警察的

① 对我的这位不愿透露姓名而无私支持我的友人，表示衷心地感谢！

起源。1901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之后，清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该条约特别规定：八国联军在交还天津后，清政府不得在距离天津租界20公里内驻扎军队。于是，袁世凯在接收天津后，立刻从自己的军队中选拔3000名士兵，换上警察制服，组成天津巡警总局，任命赵秉钧为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日本人伊藤次郎为帮办，原田俊三为顾问，直接进入天津各租



身穿京师警察厅总监礼服的张璧

界。此举引来慈禧太后的特别赞赏。于是，同年在北京设立了京师警务学堂，聘请日本人川岛浪速担任总监督（即校长）。

1905年10月8日，慈禧太后批准袁世凯的建议，在朝廷中正式设立了巡警部，由徐世昌担任巡警部尚书。巡警部下设警政、警法、警保、警务及警学等五个部门，统领全国警察事务。1906年，清政府将巡警部改属民政部，并于其下设立警政司，主管全国警察事宜。1907年，清政府在全国各省增设巡警道，负责各省的警政。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在内务部下设“警政司”。

1913年1月，内务部改革警制，将晚清的“巡警总厅”改为“京师警察厅”，直属内务部管辖。“京师警察厅”负责人为总监。相应地在各省也设立了“省警务处”。当时规定：京师警察厅由

总监、督察长、处长、队长、警正、署长、警佐、分队长、巡官、巡长、巡警十一级构成。1913年2月至6月，王士馨担任新成立的京师警察厅第一任总监。

从此以后，京师警察厅快速发展，到张璧任职的1924年10月为止，首都警察人员已经达到13192人，设立派出所468处。

11月2日下午5点20分，冯玉祥单独会见新任京师警察厅第六任总监张璧，听他谈前方具体的战情。显然，这时的张璧在冯玉祥的心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此时的张璧和冯玉祥已经是交情很深的好友了，所以继续担任京师警察厅总监的职务。他自然知道他担当的犹如清朝九门提督的这一角色眼下有多么沉重和艰难！可以看出，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前后，张璧的作用和价值是不可忽视的！



张璧的办公厅所在地和警察厅长印

在张璧任职京师警察厅总监期间，他干的两件大事就足以使他青史留名了。

第一件大事是将晚清由步军统领管辖的四郊地区，改由京师警察厅直接管辖。这在京师警察厅的管理方面实现了全面收紧权限的策略。这件事情已经被游伯麓写入1944年出版的警察史研

究著作《北京警察沿革纪要》一书中。^①

第二件就是惊天动地的执行冯玉祥的将溥仪驱逐出紫金城的命令。

11月4日下午一点半，张璧来见冯玉祥。

冯玉祥神情严肃地告诉他：“即日请宣统出宫，以免段芝荃来后重生枝节。”这是冯玉祥第一次公开表示要驱逐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出宫，目的是为了对付段祺瑞。^②

当晚，冯玉祥同黄郛摄政内阁开会，首先修订了《清室优待条件》，决定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首都革命”。冯玉祥的理由是：

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甚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所在地，竟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皇帝的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稍明事理的人，此时无不以留着辫子为可耻。如今留着溥仪，即不啻为中华民国留了一条辫子，可耻孰甚？）且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祸根。^③

接着，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

- 一、取消清室优待条件，四百万两优待金立即停付；
- 二、取消宣统名义，贬溥仪为平民；

^① 在现今出版各类记载民国时代的职官工具书中，对于张璧的记载不是缺失（没有说明他就任过北平公用局局长不久就辞职），就是错误（搞不清楚他担任警察总监的任期）。这是学术界长期缺乏对他研究的一个证明。

^② 关于这晚冯玉祥和张璧的谈话内容，网络上和报刊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戏说版本，笔者依据冯玉祥本人的真实记录，如实写来，不添加任何演义和戏说。

^③ 冯玉祥：《我的生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332页。

三、所有宫殿朝房及京内外清室公地园府，尽皆收归国有，以为公共之用；

四、严惩此次叛逆诸凶，以遏奸邪之复萌。^①

1924年11月4日上午10时，第43团团团长韩复榘领兵把守整个北京城和紫禁城。接着，“国民军以统一军权为名，将驻在清宫及景山内之禁卫军1200人缴械，调驻北苑，听候改编。父亲的第四十三团进驻景山”^②。

关于这一经过，又见吴瀛《驱逐溥仪出神武门前后》一文中的记载：

在这个时候，驻在故宫同景山的守卫兵士，一共有1200多人，隶属京师卫戍司令部。自民国元年（1912）起，就在那里驻扎，可以见得袁世凯也怕溥仪万一逃亡，将要生出无穷的麻烦。但是久而久之，政府当局时时更换，这班兵士却还是袁政府北洋军阀统率时代遗留下来的，他们逐渐忘记了自己的任务，转与清室相亲了。冯系的国民军总司令部为了要执行这样一个任务，反倒要防范这一支政府派遣军，怕他们帮助清室反动。于是总司令部以统一军权名义，在4日上午10点钟，先派员将那一部兵士缴械，调驻北苑改编。清室不知所以，当然着了慌，他们急急地写信给国民军询问，总司令鹿钟麟只得派员说明，完全为了维持治安，别无他意。^③

① 冯玉祥《我的生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208页。

② 引见《我的父亲韩复榘》，中华书局，2013年，第252页。

③ 《出版参考》2005年第9期。

事后，当事人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如下陈述：

政变消息刚传到宫里来，我立刻觉出了情形不对。紫禁城的内城守卫队被国民军缴械，调出了北京城，国民军接替了他们的营地，神武门换上了国民军的岗哨。

执行冯玉祥“首都革命”的核心人物——内阁总理、陆军中将黄郛、国民军京师警备总司令、陆军中将鹿钟麟、京师警察厅总监、陆军中将张璧、中法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石曾出场了。



逼宫三剑客

11月5日上午9时，上述逼宫四人只来了“三剑客”：鹿钟麟、张璧和李石曾携带黄郛的《大总统指令》《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率领40名警察、20名士兵，来到故宫北门，进入神武门后来到内务府值房，找到内务大臣绍英、耆龄、宝熙、荣源，向他们四人宣布黄郛内阁《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及逊帝溥仪即日迁出

故宫的命令。

黄郛的《大总统指令》如下：

大总统指令派鹿钟麟、张璧交涉清室优待条件修正事宜，此令。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具体内容则是：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

第一条、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官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绍英等四人表示马上迁出有困难，要求宽限三个月再搬出。

鹿钟麟、张璧则表示坚决不答应。鹿钟麟、张璧说，现在外面局势动荡，如果今天不搬，明天将马上撤走保卫故宫的军队和警察，甚至威胁说要立即开炮。

绍英等四人又要求七天后搬出或三天后搬出，均遭鹿钟麟、张璧的拒绝。

拖延到了中午，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得到消息后匆匆赶来。当他看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后，便力劝溥仪立即出宫，移居后海醇王府。

关于这一经过，当事人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如下陈述：

过了中午，经过交涉，父亲进了宫，朱、陈两师傅被放了进来，只有庄士敦被挡在外面。

听说王爷进来了，我马上走出屋子去迎他，看见他走进了宫门口，我立即叫道：

“王爷，这怎么办哪？”

他听见我的叫声，像挨了定身法似的，粘在那里了，既不走近前来，也不回答我的问题，嘴唇哆嗦了好半天，才送出一句没用的话：

“听，听旨意，听旨意……”

我又急又气，一扭身自己进了屋子。后来据太监告诉我，他听说我在修正条件上签了字，立刻把自己头上的花翎一把揪下来，连帽子一起摔在地上，嘴里嘟囔着说：“完了！完了！这个也甭要了！”

我回到屋里，过了不大功夫，绍英回来了，脸色比刚才更加难看，哆哆嗦嗦地说：“鹿钟麟催啦，说，说再限二十分钟，不然的话，不然的话……景山上就要开炮啦……”

其实鹿钟麟只带了二十名手枪队，可是他这句吓唬人的话非常生效。首先是我岳父荣源吓得跑到御花园，东钻西

藏，找了个躲炮弹的地方，再也不肯出来。我看见王公大臣都吓成这副模样，只好赶快答应鹿的要求，决定先到我父亲的家里去。

于是，众位晚清大臣开始收拾随身携带的必要行李。



正在收拾行李的太监们

下午4时10分，溥仪等一行人出宫，登上停在顺贞门外的五辆汽车。鹿钟麟、李煜瀛乘第一辆车为前导，溥仪、载沣等人乘第二辆，皇后、妾及宫女等乘第三辆，张璧等人乘第四辆，绍英等人乘第五辆，依次驶出神武门，直赴醇王府。

车到醇王府门前，鹿钟麟、张璧二人先下车安排保卫工作。鹿钟麟、张璧二人围在车门前，等待溥仪等人下车。这时，鹿钟麟、张璧二人分别上前和溥仪行握手礼，并开始交谈。

关于这段谈话内容，当事人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如下陈述：

车到北府门口，我下车的时候，鹿钟麟走了过来，这时我才和他见了面。鹿和我握了手，问我：

“溥仪先生，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

“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

“好！”

鹿钟麟笑了，说：“那么我就保护你。”

又说：

“现在既是中华民国，同时又有个皇帝称号是不合理的，今后应该以公民的身分好好为国效力。”

张璧还说：

“既是个公民，就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来也可能被选做大总统呢！”

同日，以国务院通电的形式公布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驱逐末代皇帝出宫在中外舆论界和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直到今天学术界对此也是褒贬不一，无法达成共识。但是在当时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社会影响，使张璧等人的名望达到了顶峰。11月11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高度评价了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的行动：

前清皇室全体退出旧皇城，自由择居，并将溥仪帝号革除。此举实大快人心，无任欣慰。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



在京师警察厅警察的监视下走出皇宫的大臣们

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贺。^①

而本书作者觉得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既是个公民，就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来也可能被选做大总统呢！”张璧的这句话十分到位！这是他长期投身革命的结果。在刚刚打倒了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之时，张璧居然意识到辛亥革命成功后，作为普通公民的末代皇帝也具有竞选总统的资格！他的公民意识如此超前，这还真让我对他刮目相看！

在张璧等四人逼宫之后，整理和保护故宫文物成了头等

^① 见徐锡祺《北京政变文电辑录》，《近代史资料》总6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16页。

大事。

1924年11月8日，临时政府内阁在通电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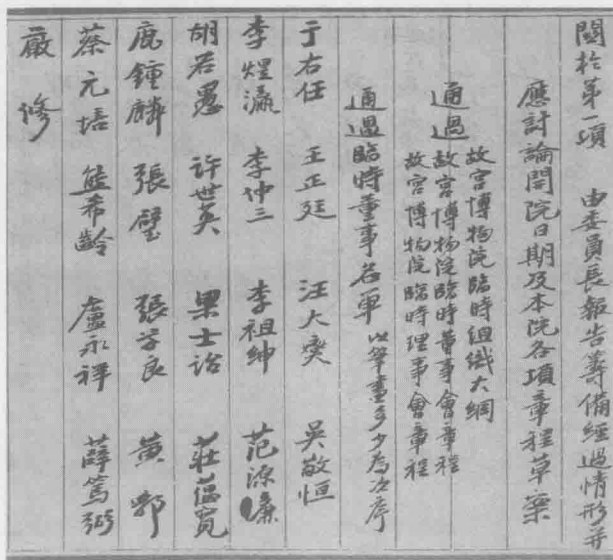
慨自晚清逊位，共和告成，五族人民，咸归平等。曩年优待条件之订，原所以酬谢逊清，然今时势所趋，隐患潜伏，对此情形之政象，竟有不得不量予修正，以卒其德者。诚以北京为政治策源之地，而宫禁又适居都会中心，今名为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区，不能树立国旗，依然仍用帝号，中外观国之流，靡不引为笑柄。且闻溥仪秉性聪明，平居恒言愿为民国一公民，不愿为禁宫一废帝；盖其感于新世潮流，时戚戚焉以己身之地位为虞。近自财库空虚，支应不继，竭蹶之痛，益伤其心。故当百政刷新之会，得两方同意，以从事于优待条件之修正。自移居后海后，并愿由军警妥密保护。从兹五族一体，阶级尽除，共和基础，固如磐石。而在溥仪方面，既得自由向学之机，复苏作茧自缚之困，异日造就既深，亦得以公民资格，宣勤民国；用意之深，人所共喻，緬维苾虑，定荷赞同。至于清室财物，业经奉令由国务院聘请公正耆绅，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共组一委员会，将所有物件，分别公私，妥善处置。其应归公有者，拟一一编号，分存于国立图书馆、博物馆中，俾垂久远，而昭大信，并以表彰逊清之遗惠于无穷。恐远道传闻，有违事实，特电布闻，敬祈照察！

为了保护故宫文物，从11月7日开始，张璧以京师警察厅总监的身份，多次到醇王府，和绍英等皇室成员协商验证物品种类、数量和保存状态。那段时间，张璧在保护和清点故宫文物上

作了大量工作。

11月10日，临时政府内阁讨论通过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8条，决定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

故宫博物院保存了当时成立“故宫博物院”的一些原始记载，见下：



通过临时董事名单：

于右任、王正廷、汪大燮、吴敬恒、李煜瀛、李祖绅、李仲三、范源濂、胡若愚、许世英、梁士诒、庄蕴宽、鹿钟麟、张璧、张学良、黄郛、蔡元培、熊希龄、卢永祥、薛笃弼、严修

1924年11月20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清室善后

委员会”。

该委员会的职责包括：

- 一、清室所管各项财产，先由委员会接收。
- 二、已接收的各项财产或契据，由委员会暂为保管。
- 三、在保管的各项财产中，由委员会审查其公私性质，决定收回国有或交还清室。
- 四、至审查终了，将各项财产分别公私，交付各主管机关及清室之后，委员会即行取消。
- 五、监察员负纠察职责，如发现委员会团体或个人有不法情事，随时向有关机关举报。
- 六、委员会办理事项及整理表册清单，随时报告政府并对外公布。

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绝大部分都是那时保存下来的。

樊文稷在《民国名人张璧》一文中说：溥仪出宫后，张璧等立即下令封存后宫殿库，并派军警严加保护，防止宫内太监人等偷窃国家文物，把无数珍宝妥善交予人民，是立有功勋的。^①

但是，在逼宫行动中出尽了风头的京师警察厅总监张璧，也引来了巨大的社会反弹。首先，当时就任“中华民国执政”的段祺瑞就强烈反对驱逐溥仪出宫的行动。11月24日，段祺瑞上台后，在段祺瑞和张作霖的武力威胁下，冯玉祥宣布下野。11月

^① 《霸州历史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名人卷》，河北霸州市政府出版物，2013年，第243页。

25日，段祺瑞逼迫内阁总理黄郛辞职。然后，段祺瑞开始考虑更换京师警察厅总监。段祺瑞甚至直接质问他当年的学生张璧，强烈表达他的不满。而无法掌控北京政治全盘运作的冯玉祥，11月28日，一方面同意段祺瑞的建议，免去了张璧的京师警察厅总监的职务“调离另任”；另一方面开始约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于是，陆军中将李寿金取代了张璧的位置，就任京师警察厅第七任总监

当年的12月14日下午2点多，张璧来见冯玉祥。这时候已经被解除了总司令职务的冯玉祥，就目前的局势问题，请张璧谈谈看法。张璧对冯玉祥说：“若论私，不应请检阅使下野。若论公，非检阅使下野不能平和大局。”这里所说的“检阅使”，即指1922年出任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这是张璧劝说冯玉祥主动下野，交出权力，功成则身退，不然则天下继续大乱。

冯玉祥对老部下和好友的这一建议，除了震惊之外，显然也是失望的。他将张璧的原话罕见地写在日记里，并且在张璧的话后面写下了很长的一段日记，申述自己的多年军旅和政治生涯。不用多说，这时的冯玉祥已深深纠缠在和段祺瑞的矛盾中，他本来希望的是张璧可以给他出谋划策，告诉他如何扳倒段祺瑞。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特别信任的老部下，却直言不讳地告诉他：需要下野的是自己。不知道此时冯玉祥是否又想起了当年在他攻打叙州府时张璧在电话中劝他无条件缴械投降的话。总之，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老资格的陆军中将张璧，后来没有成为冯玉祥在军中的“十三太保”和“五虎上将”的原因吧。冯玉祥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在政坛上呼风唤雨，怎么可能主动下野呢？！

失去了成为冯系将领的机会，对于张璧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个时期，他的同学商震却意外地转身投靠了阎锡山，成

了著名的晋军将领！而他的好友孙岳、鹿钟麟、石友三等人，在这一时期也都成了冯系将领。可见，张璧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是超前的，也是书生气的。就在半年前的5月1日，他还和冯玉祥大谈他在察哈尔任职期间所见所闻的种种公府紊乱现象，现在看来，他的那番话也是很书生气的。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消灭了晚清王朝以后，出现的却是一个军阀政权，而非他理想中符合孙中山建国理念的民国政府。他将首都政变后的冯玉祥看成了一个有着民主理念和国家利益的军事领导人。而冯玉祥认为：“军人有矛盾性方能为军人，即服从命令与独断专行，二者缺一不可。”^①面对和段祺瑞的内斗，冯玉祥希望自己的部下在军事上服从他的命令，在政治上支持他独断专行。而当时的张璧恰恰是思想很超前的青年军官。

面对军阀混乱的局面，张璧建议他的老上司：

革命已经成功，应该交出北京政权，这句特别超前的真心话再次表现出了他的超前意识。这是笔者尤其要大书特书、加以赞美的！从他第一个明确表示给末代皇帝溥仪以竞选总统的资格，到现在他劝说正在权力风头浪尖上的冯玉祥主动下野，我真的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铸造了早年张璧如此超前的公民意识和平等人格思想？

此时此刻，张璧根本没有想到他在京师警察厅总监的位子上仅仅坐了不到一个月！他的雄心勃勃的政治和军事目标，甚至他居然也为刚刚被他赶出宫的末代皇帝都设想好了：“既然已经是一个中华民国的一名公民了，你以后自然还有竞选总统的资格。”

^① 《冯玉祥日记4》，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784页。

可是，不到一个月，血腥而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军阀混战、北洋军阀之间的内斗和相互倾轧，彻底击垮了张璧对这场革命正义性的幻想。

从此以后，继续在西北军司令部任职的张璧，已经没有了任何实际权力，他的政治生涯明显地从顶峰开始走向下坡。

1924年底，因为老母病重去世，张璧向冯玉祥请假，离开西北军司令部，回到老家为丧母丁忧，以尽孝道。而此时的冯玉祥则被段祺瑞安排到张家口特别市，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去了。

1925年12月18日，张璧来到张家口的西北边防督办府，看望近一年不见的冯玉祥。这次，冯玉祥说非常想听听张璧谈谈对付吴佩孚的具体办法。这次召见意义重大，证明冯玉祥和吴佩孚之间斗争的激烈化，以至于冯玉祥再次想起了能干的老部下张璧。不过，张璧这次肯定没有再劝说他下野，但是也没有提出什么可以立竿见影的方法。

当时免去张璧的京师警察厅总监职务时，免职训令上注明是“调离另任”，冯玉祥给他保留了“司令部高级参谋”一个没有工资、只有军饷的职务。1925年底为了沟通冯玉祥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之间的联系，冯玉祥特别设立“国民革命军东北特别委员会”。这时候，他想到了“调离另任”的张璧。于是，处理完母丧后事的张璧接受冯玉祥的派遣，出任新设立的“国民革命军东北特别委员会委员”。《民国军人志》中记载张璧“后作冯之代表参加反蒋活动。曾作冯之驻东北特使”^①。而笔者在1928年5月18日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加纳总领事致日本田中外相的第80号电报中发现了张璧这一时期的工作是被派往东北军任“国民革命

^① 见王俯民：《民国军人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359页。

军东北特别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记载，而非“东北军特使”。有些学者主张他此时出任“东北军特使”，其实，“国民革命军东北特别委员会委员”的职位远远高于“东北军特使”。因为，当时张璧手下配备了三名直接听命于他的青年军官出任“东北军特使”。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8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辖下各地方军队统一名为“国民革命军”。张璧在1925年12月底到天津，受冯玉祥之托开始进行联合张学良的工作，正式身份应该就是上面第80号电报中所记载的“国民革命军东北特别委员会委员”。

在军阀混战时代，得不到大军阀的支持，“失意军人”这一称号成了军事当权者和实力派赠送给张璧等人的最佳头衔。这些“失意军人”不乏有人从此洗心革面，走上革命，成为著名的开国元勋。也有些人从此意志消沉抽烟狎妓，或沦落成日伪政权的帮凶走狗。张璧属于哪一类，我们且不忙着下结论，在没有出示决定性证据之前，任何结论都是匆忙的、草率的，也是经不起科学验证的。

五 随冯玉祥反蒋失败后的青帮老大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张璧为了躲避袁世凯在北洋军第六镇中肃清革命党的行动，他逃亡奉天，并在1911年10月底前后在奉天加入了青帮组织。当时，张璧曾充分利用青帮组织和商震共同发起组织了陆军小学，招集学生学习，建立东北地区的“光复军”，积极策应了武昌革命。本章将集中考察张璧在革命成功后的青帮的来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再也无法忍受段祺瑞的统治的冯玉祥，再次发动政变，将制造了“三·一八血案”的段祺瑞拉下台，段逃往天津。此时，张作霖带领军队入京，又将冯玉祥及其军队赶出北京。

1926年5月10日，冯玉祥在日记中表示要加入国民党。

8月，冯玉祥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

9月17日，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正式宣布全体将士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

1927年6月1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

1928年6月3日，冯玉祥率领军队打跑了奉系军阀张作霖，

重新占领了北京。

10月，冯玉祥任武汉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

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通电东北易帜，宣誓效忠于蒋介石和中央政府。

1929年1月，北伐胜利后的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军编遣会议”。会议决定为减少军费开支，将对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等人的军队大量裁军。

3月中，又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何应钦出马，进一步利用这一机会为蒋介石排斥异己，扩充嫡系。由此引起了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的强烈不满。这时，日本与蒋介石签订撤出济南的协议，按协议济南应由冯玉祥的西北军接收，而蒋介石却严令西北军不许接收，改由他的中央军接收。由此引起了蒋、冯二人的矛盾激化。

5月中，冯玉祥在陕西华阴部署反蒋军事行动，蒋、冯第一次军事冲突开始。5月22日，冯玉祥军中将韩复榘、石友三通电拥蒋，背叛冯玉祥。5月23日，国民党中央下令解除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面对强大压力，冯玉祥通电下野，使蒋介石失去继续进攻的口实，蒋、冯军事冲突结束。蒋介石命阎锡山将冯玉祥软禁在山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在国民党展开的清党活动中，因为受冯玉祥的牵连，张璧等将领均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并解除了军中一切职务。

从1929年12月开始，不甘失败的冯玉祥暗中派遣老部下鹿钟麟回到陕西，代理西北军总司令职务，开始策划反蒋活动。鹿钟麟在路过北京时，再次联系老朋友张璧，鼓动他加入反蒋行动。

樊文稷在《民国名人张璧》一文中说，此时的张璧“积极支

持，作为冯玉祥的代表往返于晋军阎锡山、桂军李宗仁、东北军张学良之间，秘密联络、反复谈判，传递信息、促其联合，后曾作为冯玉祥特使，长驻东北军张学良部”^①。

1930年3月15日，冯系将领鹿钟麟等人，联合晋军将领商震等共57名青年将领联名通电反蒋，要求蒋介石下野，拥护阎锡山、冯玉祥为中华民国陆海军总司令、副总司令。

4月，不愿继续接受打击和压制的冯玉祥，联合阎锡山、李宗仁等人的部队，再次倒戈，共同发动反蒋战争，阎锡山宣布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就任副总司令，张学良则保持沉默，暂时持中立态度。中原大战由此开始。

蒋介石先后调集约70万人组成4个军团和4个路军，分别集结于禹城、徐州、砀山、宿县、漯河、武汉、萍乡、衡阳、广州等地，集中主力于陇海、平汉铁路沿线，夺取联系各战场的交通战略要地，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的主力决战。

5月5日，冯玉祥同时接见了张璧、周煜坤、吴瑞芝、熊斌四人的来访。这四人因何来访、冯和四人究竟谈了些什么具体内容，冯玉祥没有任何记录。当天的工作日程记录了冯玉祥接见的地点多达六七十人。张璧、周煜坤、吴瑞芝、熊斌四人的身份颇为有趣。张璧和周煜坤是早期的陆军中将和少将，吴瑞芝是巩县兵工厂的技术监督，熊斌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总务厅长。张璧上次来拜访冯玉祥是1925年12月8日，距离这次隔了近五年，这可能是由于张璧出任“国民革命军东北特别委员会委员”的缘故。不过这几年中，鹿钟麟、冯治安、商震、张自忠、石友

^① 《霸州历史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名人卷》，河北霸州市政府出版物，2013年，第243页。

三等张璧的好友，经常与他见面，或叙友情，或通报西北军的情况。

1930年9月18日，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在蒋介石、李石曾和徐源泉等人的多次劝诱下，终于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通电出兵，率部入关参战。张学良的突然出兵，使大战的南北僵持不下的局面被打破，蒋介石大获全胜。冯玉祥于10月23日通电下野。阎锡山也于11月4日宣布辞职。他们交出军队，听候蒋介石编遣。实际上蒋收编阎、冯二人的军队，由张学良完成。

樊文稷在《民国名人张璧》中说：“由于张学良于大战中途倒戈拥蒋，使阎、冯大败。张璧原受冯玉祥重托任冯驻东北军特使。张学良也曾信誓旦旦宣言反蒋，不想突然倒戈攻冯，使冯部惨败。张璧觉得有负老友冯玉祥之重托，更恨东北军趁机抢占地盘。”^①从此以后，反蒋和反张成了张璧这一段时间内的人生目标。于是，他想到了利用日本人的势力和青帮组织，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实现反蒋反张。他首先开始加紧在北平、天津活动，谋划发动一场以赶走东北军张学良为目的的“天津起义”。

1930年10月，在张学良和国民党元老吴铁城的特别推荐下，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出任天津特别市市长兼公署警察局局长。

因为张璧参与了冯玉祥的反蒋活动，而张学良的入关直接导致了冯玉祥的大败，因此客观上造成了张璧和张学良之间的不和。进而他和张学铭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和紧张。双

^① 《霸州历史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名人卷》，河北霸州市政府出版物，2013年，第244页。

方都是十分戒备。同样因为反蒋反张而下野的冯系将领石友三，此时也住在天津，伺机而动。当时，石友三甚至还遭到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的通缉，直到1936年1月1日石友三成为冀察政务委员会成员时才被解除通缉。

共同的遭遇和命运使张璧和石友三交往密切，石友三出资给张璧在天津的日租界秋山街岗辰住宅提供了临时住处，当时的日租界有许多中国人租住在那里。此时，秋山街岗辰住宅成了张璧在北京和天津等地联系各种反蒋反张的势力、建立两地的青帮组织和势力范围的据点。

关于“天津事件”与张璧的关系问题，请见本书《张璧和“天津事件”关系考》一章。

这个时期张璧的活动被国民党中统特务密报国防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保存的卷宗787-5209号档案就是证据。这份密报称张璧“专侦察我方军情而图捣乱天津”。该密报的制作人出自国防部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一处。密报时间是1931年前后。

在青帮中属于“大”字辈的张璧，在天津也成了老大。不要说他的陆军中将和京师警察厅总监的资历，也不要说他的同盟会和国民党早期党员的资历，就是他在天津乃至当时整个华北地区青帮中的辈分，其资历和地位也已经成了最高。当时，只有奉天的祖宪廷、山东的高士奎、北平的魏大可、河南的袁克文、上海的刘登阶等少数几人，才和他属于同一个辈分。当年，张璧在奉天，充分利用了青帮组织，建立他的“光复军”，积极策应武昌革命。

在天津，和张璧属于同一辈分的只有厉大森、吴鹏举、张英华几个人。

关于青帮的辈分，来源于一个叫金纯的出家僧人。他使用据说是达摩老祖定下的四十八字作为辈分用字。他的法名“清源”，使他成为“清”字辈第一人。接下来是罗清、陈瀛二人。他们的法号是“静清”、“静海”。他们二人同属于“静”字辈。第三代陆飞、赵大官二人。他们的法号是“道行”、“道元”。他们二人同属“道”字辈。为纪念前三代祖师，第四代翁岩、钱坚、潘清三人规定：前三字“清”、“静”、“道”，后代不得使用。

从第四代开始，具体辈分排列为：

前廿四代依序为：

德、文、成、佛、法、仁、伦、

智、慧、本、来、自、信、元、

明、兴、理、大、通、悟、觉。

后廿四代为：

万、象、皈、依、戒、律、传、宝、

化、渡、心、回、临、持、广、泰、

普、门、开、放、光、照、乾、坤。

续廿四代为：

绪、结、昆、计、山、芮、克、勤、

宣、华、转、枕、庆、兆、报、魁、

宜、执、应、存、挽、香、同、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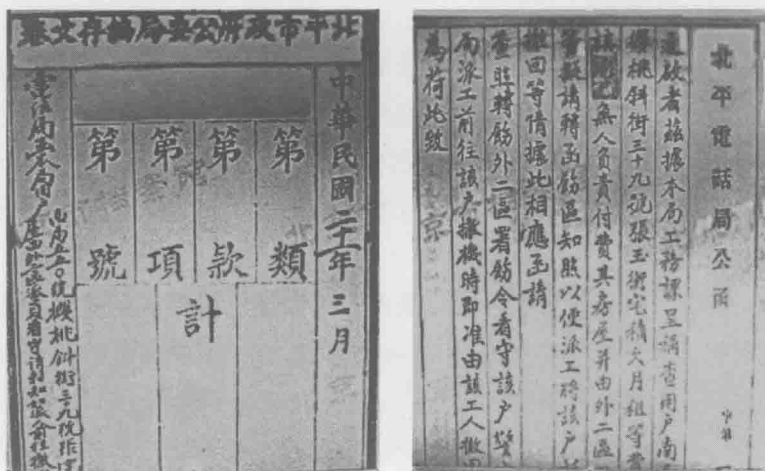
张璧属于前廿四代“大”字辈。

本来，天津地区的青帮远不如上海和东北等地活跃。1926年，奉系军阀褚玉璞进入天津。他手下的军警督察处处长、陆军中将厉大森，曾是山东青帮“大”字辈老大。厉大森开始在天津

广收门徒，从此青帮在天津便日益活跃起来。而厉大森曾经是张璧的好友。无论过去在山东和在奉天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时代，他们相似的经历、相同的身份和辈分，使他们二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此时，张璧的母亲、哥哥、妹妹、侄儿、侄女一大家人全都到了北京定居，沉重的生活负担可想而知。当时住在北京南城的樱桃斜街39号。那时居住在那里的人多为贫穷之户，以至于当时的北京有“穷南城，富北城”的说法。

由于张璧家人口较多，其经济状况非常拮据，因无法支付樱桃斜街39号家中的电话费，以至于被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发文调查处理。见如下：



张璧在京住房因欠电话费被停机处理信

这就是当时张璧的经济状况。没有欺压百姓、收取保护费的辛亥革命元老、民国陆军中将和青帮老大的张璧，最后不得不向

他的好友魏子丹借钱维持生活。而在保存至今的旧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档案中，对于魏子丹记载如下：

与张璧关系最密。五年前张不得已时，魏君曾努力对朋友，确有侠肝义胆。

又说：

魏子丹对张之为人，颇依重。张不得已时，有供给之义务，乃张平生唯一之至友。

这期间，张璧的老同学商震也无私地给予了在苏州胡同为其租用房屋的帮助。

而后，时任天津特别市市长的好友张自忠，听闻张璧家人口众多而无钱租房时，更是慷慨地伸出援助之手，用他当市长的薪水，花了三万大洋，于东四附近的东堂子胡同25号买了一套五进院落的四合院，送给张璧，这才最终解决了张璧一大家人在北平的居住问题。

当时，由于张家在京人口众多，由张璧的堂弟张炳雯负责管理家务。1934年初，张炳雯之女张婉儒，在14岁时也随母亲来到北京，先在樱桃斜街39号住，后有了东堂子胡同25号，就和父母一起搬来与张璧夫妇同住。从这时起，张婉儒开始陪伴张璧夫人刘氏，直到出嫁为止。

1937年8月日军侵占北平城后，张自忠就躲避在他送张璧的东堂子25号四合院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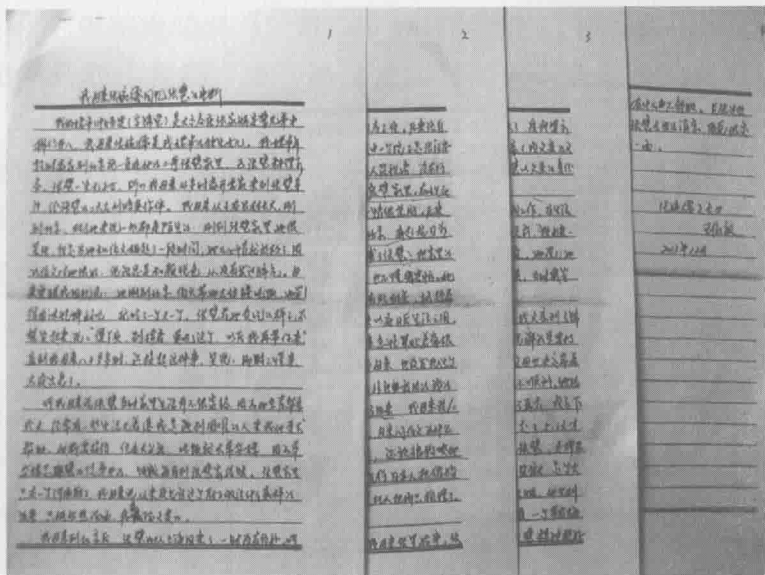
如今，关于张自忠如何逃离北平至少有三种观点：美国牧

师富开森掩护说、深夜骑自行车脱离说、化装出殡说。由于当时他住在张璧那里，所以无论哪一说，都离不开张璧的支持。

张自忠逃出北平后，日本特务松井太久郎获悉此消息恼羞成怒，派手下将张璧抓起来，亲自审问并施以酷刑。此事发生在张婉儒约18岁时。关于这一事件的经过，笔者采访了张婉儒的女儿王淑敏，她将她母亲所述整理成材料如下：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张自忠被日本特务监视着，没有行动自由。当时，张自忠就住在张璧家里。有时见他把整箱的啤酒放在院子里喝，边喝边哭，心情很苦闷。后来，张璧终于找到机会，掩护张自忠离开了北京，奔赴了抗日前线。张自忠逃走后，日本宪兵队抓捕了张璧，把家里的门窗都贴了封条……大约一星期后，张璧被放了回来，见他的十根手指的指甲全都是黑紫色的。张璧说日本特务对他施用了电刑，还放狼狗咬他，谁知那狼狗却不听日本人指挥，就是不咬。气得日本人开枪把狼狗打死了，张璧因此躲过了一劫。张璧还托人把那只狗埋了，出狱后又去埋狗的地方祭奠……

该采访证明材料原件如下：



另外，从抄自“文革”时期河北霸州大高各庄公安员记事中也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张璧）因隐藏和协助张自忠逃出北京而被日本人抓去……”的记载。^①

让我们再看看张自忠自己是如何对待这一艰难的时期的，他说：

目前华北的危机，关系国家民族的存亡至大，我国究竟准备到什么程度？本军仍散驻在各地，尚未集中。在和平尚有一线希望，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之时，只有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牺牲小我，顾全大局，忍受目前的耻辱，凡不能忍受的，绝难任重致远。周公尚有流言日，好

① “文革”时期，张贵在霸州大高各庄公安员处抄下的张璧案宗记事摘录。

在是盖棺论定，成功成仁，将来一定有好机会的。和平绝望之日，就是我们牺牲的最后关头，把我张自忠的骨头轧成碎骨碾成粉用化学分析分析，看有一点汉奸的气味没有？^①

张自忠生于1891年，山东省临清县人。为中国国民党上将衔陆军中将，追授二级上将。著名抗日英雄，1940年在与日军战斗中，不幸殉国，是二战中同盟国阵亡的最高级将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

孙维玉在《十万缀队送殡人》写道：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首脑人物中，张自忠被认为是“主和派”的代表，其实委员长宋哲元以及其他重要官员如秦德纯等的共识，都是与日本不可轻启战端，能拖则拖，而来自蒋介石的承诺也是“务须忍辱负重，委屈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落入日军的掌握之中，他（张自忠）便在那时走马上任，当了第一任北平市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冀察绥靖公署主任……被骂为“汉奸”的人，微弱的自辩往往激起人们更大的愤怒，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黑锅却无可奈何……几十年后的今天，恐怕不会有人再认为张自忠是汉奸了。而在一个“汉奸”的骂名消失、一个“民族精神”的丰碑被树立起来的同时，我更关注的，却是有一个“人”死了。我虽然不能同意张自忠“求死”的行为，可是，看完了他的传后，我又想：这样备受煎熬的灵魂，被搅动得那样痛苦的良心，活着也是

^① 《抗日名将张自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5页。

苦难，确实还是“求死”比较容易。鸦片是一种麻醉，死也是。^①



任天津特别市市长时的张自忠

当时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是由蒋介石南京政府设置的机构。

1936年，张璧由宋哲元委任为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为了方便在北平的活动，张璧注册了类似俱乐部形式的“大义社”。大义社成立时的原始档案《北平市政府训令甲字第1012号》如下：

北平市政府训令甲字第1012号
令北平市社会局

^① 见孙维玉《十万缀队送殡人》，劝学网整理。

案奉

冀察政务委员会训令内开：

据民人张璧、李达三等为提倡本国固有道德，拟组织大义社，缮具缘起及简章呈请核准立案等情到会，除批示呈及附件均悉该具呈人等所拟组织之。大义社目的正当，简章亦尚妥协，应准立案，仍仰分呈各该省市政府所属主管厅局登记。除分行外，合行批示知照，此批等因发并分行外，合行令仰该市政府查照，俟该发起人等分呈到府，即便令飭主管局登记并通行保护。

1936年5月1日

“大义社”租用地点在旧北平西城区丰盛胡同一个有着多间平房的前后两大院，这是张璧进行社交的场所，一些社会名流和高层国民党人士常在这里聚会，青帮弟子也在这里聚会。

陈志钧、张冀霞在《杜文敏革命生涯》一文中介绍：1936年夏天，张璧的侄子杜文敏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曾利用“大义社”的房子，组织同学们联欢。

樊文稷在《民国名人张璧》一文中也写到：张璧的妹妹张秀岩、侄儿张文松、杜文敏，侄女张洁清、张洁珣等在北京、天津做党的地下工作期间，也多次利用“大义社”召开秘密会议，还利用“大义社”掩护过“魏先生”彭真。^①

《彭真年谱》中记载：（彭真）受刘少奇委派到北平指导工作。到北平后找到中国学院学生张文松接头，利用“大义社”作

^① 见《霸州历史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名人卷》，河北霸州市政府出版物，2013年，第134页和247页。

为联系、接头、住宿的据点……^①

白静明年轻时曾被张璧安排在大义社负责接待等日常工作，后又在金鱼胡同一号“四存学会”做接待工作。旧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档案中曾记载：“张总局局长为时代之需要，曾租金鱼胡同一号为俱乐部。但凡应酬军政朝野要人等，多出白（静明）氏为之。”^②

白氏即白静明。白静明过去是东北直鲁联军褚玉璞的部下。1929年9月，褚玉璞部在山东被当地军阀刘珍年打散后，他来到了北平，投奔张璧，先在丰盛胡同的“大义社”，后在金鱼胡同的“四存学会”谋得这份工作。

笔者对白静明之子白洪瑛进行采访时，他说：

“大义社”在政协礼堂前面的胡同里。当时还是学生的中共秘密地下工作者张文松、张洁珣都在外面院子里住。其实，这里主要是聚会场所，院子很大，房间也很多。张自忠等高层国民党人士及一些知名人士常在这里聚会。另外，大义社与安清道义总会无关，因我父亲白静明在大义社工作，同时也一直住在大义社。后来改租到金鱼胡同的一幢小楼，为“四存学会”……^③

上面所说的“大义社”和“安清道义总会”完全不是同一性质的机构。有的文章将“安清道义总会”简称为“大义社”，显

① 见《彭真年谱》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61页。

② 白静明的名字，在旧北平公安局档案中写成“白镜民”。

③ 白洪瑛生于1928年。曾就读于四存中学，毕业于北大工学院。后在七机部某设计院从事设计研究工作。

然是有误的。

“文革”期间，白静明老人因为在张璧的大义社工作过而受牵连，竟被非法关押在秦城监狱达八年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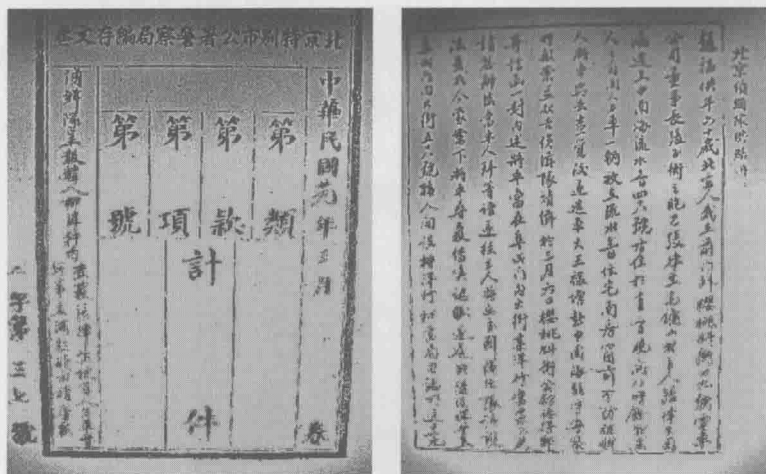


白静明

张璧曾任“四存学会”名誉董事长。关于“四存学会”时的张璧，请见本书《四存学会和旧北平公用总局时代的张璧》一章。

1937年，张家还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大哥张律生在当年4月1日被农业部任命为农事试验场场长，这改善了一些张家的经济拮据局面。有了薪酬后，张律生租住在中南海流水音。1940年3月，在流水音居住期间，张律生私人购买的供上下班使用的人力三轮车被盗，他雇佣的车夫赵福为此曾向旧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报案，此案后来被侦破。被盗的车也被送回。

早期日本特务抓到青帮分子，一律处死。因为他们统治东北



以上为保存在旧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中的此案部分卷宗

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些人往往是民间反日的中坚力量和组织者。但是，随着日军入侵华北地区以后，逐渐改变了策略，变消灭青帮为利用青帮。

在天津，张璧在辛亥革命时代的老友厉大森在日本间谍小日向白朗的策动下，出面组织了“普安协会”，并积极响应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华北五省自治”方案。

至1935年12月底，“普安协会”登记会员已达25000名，其中知名人士有陆军中将厉大森、李得路、戈梓良、高使轩、杨振东、毛雅卿、雷位庭、李泽生、王兆中、张爱亚、张亚馨等人，陆军少将胡国英、王小彭、刘怀西等人。其他人如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币制局总裁张英华、国务院秘书邢淋、国军大元帅府秘书胡紫绶、南京警察厅警察署长陈维卿、山东水上警察厅厅长孟汉臣等人。

该会下设立三会、四地方部。具体如下：

元老会：

人员有厉大森、李绍白、林树和、王约瑟、王克明、吴鹏举、吴弗田、杨嘉炳、张月笙。

参议会：

人员有白云生、陈友魁、陈鹤龄、郭有珍、范丽水、冯鹤亭、房王麟、董邵轩、戴连芳、恭瀛洲、刘沛亭、刘宝珍、李泽生、李得路、李万有、贾梦祥、任渭渔、穆东屏、陶景文、武汉卿、薛永泰、殷桐坡、阎静远、姚好成、张景山、张凤楼、张品三、郑燕侯。

总务会：

人员有张文钰、李明德、孙洁民、孙昆山、袁文会、张逊之。

名单中没有张璧的名字。

1936年5月6日，当他的老朋友、第39集团军司令石友三在天津出席欢送“普安协会”董事长、日本特务小日向白朗返回日本时，张璧还是没有出席。

身居天津和北京，而且是厉大森好友和同辈的张璧为什么没有参加“普安协会”？只有一个解释：张璧利用青帮的唯一目的就是反蒋反张，而非投靠日伪。其实，当时的青帮老大们把各种政治势力全看作是江湖势力，而他们则如走平衡木一般，以掌握青帮江湖组织的手法，继续周旋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一旦有某一方胜出而打破了这一平衡，他们的圆通灵活的江湖本领就立刻土崩瓦解了。

当1942年3月天津成立“天津安清道义总会”时，厉大森再次出马，成了“天津安清道义总会”的副会长。这时的张璧已

在北平主持他寄希望于教育为本的“四存学会”和“四存学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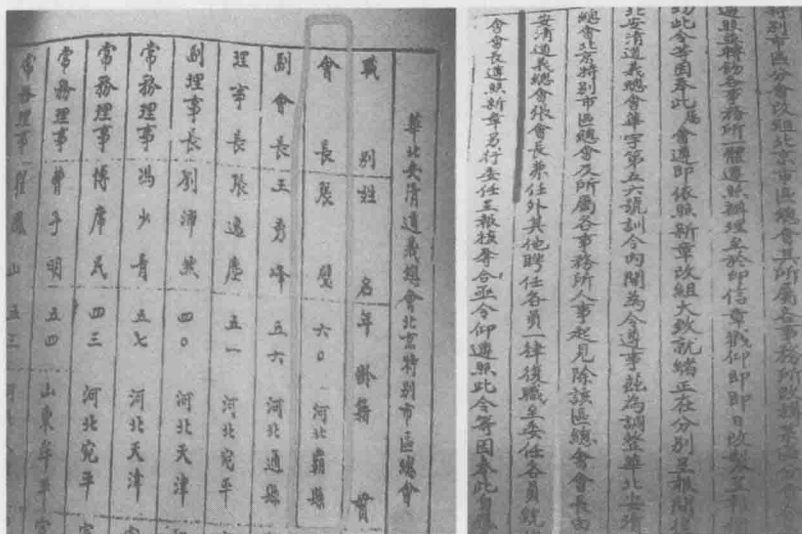
北平沦陷后，1942年1月1日，由日本特务机关酝酿策划，成立了“华北安清道义总会”。1943年10月1日，筹备了快两年的“华北安清道义总会”正式成立，由青帮“大”字辈的魏大可担任首任会长。从此，青帮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青”和“清”了，显然到了厉大森、魏大可等“失意军人”那里，青帮被他们改造成了不穿军装的第二种皇协军。

此时国民党部却下达两个委任状给张璧。

1943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电令张璧为华北军事特派员。两天后，即11月11日，冀察战区总司令蒋鼎文又下达“字第6444号令”，委任张璧为平汉路北段军事特派员。这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张璧获得的两个国民政府认可的秘密职务，他的一切工作将以策反日伪汉奸、支持国民政府和军队为核心。两次委任指令传达人应是军统北平站站站长张世五。^①

为此，1944年1月1日，年近60岁的张璧决定接手北京“华北安清道义总会”的管理权，为实现抗日而开始进行对伪军的策反工作。于是，在青帮中具有威望的“大”字辈张璧，理所当然地被推举为“华北安清道义总会北京分会会长”。《华北安清道义总会北京分会关于代理会长张璧就业启用钤记的呈文》原始档案中会长登记册和该会内部原始文件如下：

^① 当初我采访张璧后人时就听说了这两个任命，那时我并未相信其亲属的“口述历史”的真实性，直到我在档案馆中查找到这个原始档案才知道这一“口述历史”的真实性。



华北安清道义总会北京分会登记册

自从好友张自忠抗日战死后，张璧和日军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一天比一天疏远了。而他又主动辞去了伪公用总局局长的职位，更表现出了他和日军不合作的态度。他领导的四存学会和华北安清道义北京分会的成员们开始做伪军的策反工作，这使他和“华北安清道义总会北京分会”、“四存学会”成为日本特务日益加以警惕的一支新生力量了。

1944年中旬，张璧和他的秘书梁以俵及一些朋友因从事地下反日工作嫌疑被北平的日本宪兵队抓捕。张璧在狱中关押近三个月，受到了“灌辣椒水”等严酷的刑罚拷问，后由于证据不足保释出狱。这是当时日本宪兵队的一次大规模逮捕行动，目标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嫌疑人。

张璧在被日本宪兵队关押期间，没有暴露任何他身边的共产

党地下工作者，这包括他的秘书、侄子和侄女们。当然，他知道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也没有暴露。

郝平在《全国妇联原书记处书记张洁珣》一文中对此事也有叙述：

1944年4月，张洁珣的二叔张璧和她的男朋友地下党员郝貽谋都被日寇逮捕了，她和张文松、黄甘英因情况不明，连夜坐火车离开北京，躲到济南市的本家九叔家里。一个多月后，张洁珣独自一人回北京了解情况，她化装成富家大小姐的模样，不慌不忙地应对进出火车的检查。张璧和郝貽谋二人虽受日本宪兵队重刑，但都没有吐露任何中共党的信息，所以张洁珣3人又回到北京做党的地下工作。^①

此时，张家还发生了一件特别不幸的事情，张占一在《张璧经历概要》中说：

当时，张璧的大哥张律生闻讯张璧被日本宪兵队拘捕，突发心脏病住进了德国医院。^②张璧被释放的那天，回到家中，听说大哥病重住院，立即赶往医院看望。当张璧快步走到病床前叫了一声“大哥”时，张律生忽见张璧，由于情绪激动却猝然去世。^③

① 见《霸州历史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名人卷》，河北霸州市政府出版物，2013年，第15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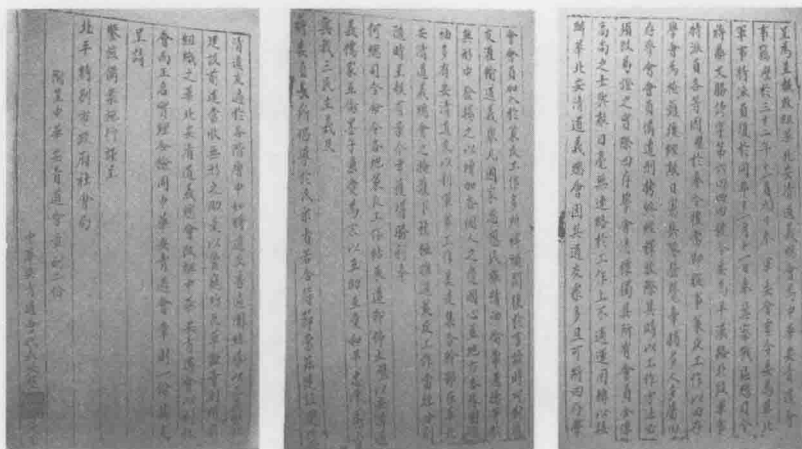
② 德国医院即现今北京医院。

③ 见张占一的《张璧经历概要》，中亭河博客。

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1日张璧决定改变华北安清道义北京分会的宗旨和性质。他在《“华北安清道义总会”申请改组为“中华安青道会”缘由、经过的呈文》一文中提出：

璧于三十二年十一月九日奉军委会电令委为华北军事特派员。复于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奉冀察战区总司令蒋鼎文胜诗“字第6444号令”委为平汉路北段军事特派员各等因，璧于奉令后当即从事策反工作，以四存学会为掩护。后经敌伪宪兵队发觉，牵捕多人，多属四存学会会员，偶遭刑拷，终经释放际，其时以工作方法必须改易，证之四存学会，清标独具，所有会员全系高尚之士，与敌日毫无联络。于工作上不适运用，转以接办华北安清道义总会，因其道友众多，且可将四存学会加入于策反工作，多所裨补，间复于言语时可对道友灌输道义。举凡国家、思想、民族、精神、伦常、道德等，于无形中发扬之，以增加各个人之爱国心，并地方各队团领袖，多有安清道友，以利军事工作，爰是集合干部，在华北安清道义总会之掩护下，积极推进改革策反工作，当经分别随时随地呈报有案，今幸获得胜利。奉何总司令命令，各地策反工作结束遵即停止。

该呈文照片如下：



这一原始文件，十分清楚地表明张璧的“华北安清道义总会北京分会会长”是受国民政府军委会和冀察战区总司令蒋鼎文的“字第 6444 号令”特别指令而来，并非他个人的“投敌叛国活动”，这使日后国民政府无法以“汉奸嫌疑”的罪名给他定罪。因为以他的资历和声望，远在魏大可之上，会长的职位他想当的话早就可以当了，为何拖延到 1944 年才接任？原因就是 he 接到了上述两个秘密工作的任命，为便于开展地下抗日活动才接手该会的。

张占一在《回忆张洁珣的证词》中也写道：

2012 年 3 月间，我为张璧书写《经历概要》期间，张洁珣从北京打电话给我提供材料，其中谈到她曾亲眼看到过国民党将领蒋鼎文给张璧的地下工作者的委任状。到 2012 年 7 月底，我去北京时，杜璇约了张洁珣、宣祥蓁、张润辉和我到她家（通州寓所）一聚。张洁珣又一次当着大家的面提起

她亲眼看到过蒋鼎文给张璧的地下工作者委任状。当年，张洁珣被党组织派回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注意到她二叔张璧的有关情况，是情理之中的事。有材料说明，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晋察冀边区曾派人争取张璧合作，并邀张璧参加有关参政会议。作为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的蒋鼎文同样可以与张璧合作。^①

张璧在新的提案提出后，又说：

璧以安清道义儒家五伦、墨子兼爱为宗，以互助互爱、和平忠厚为旨，与我三民主义及蒋委员长所倡导于民众者，若合符节。当兹建设开始，安清道友遍于各阶层中。如将道友普遍团结以正义，对于建设前途当收无形之助。是以管窥所及，草拟章则，将前组织之华北安清道义总会改组中华安青道会，以利社会。

虽然有过辉煌的辛亥革命经历，也提出了很多进步的、民主的思想。但是，所有这些经历和政治背景并没有使他走上革命；尽管他已经参加了抗日活动，但抗战胜利后，他提出的是“将前组织之华北安清道义总会改组中华安青道会，以利社会”之说，这是我们感到无限惋惜的。作为一个旧军人和辛亥革命的元老，他的思想只能如此了。所以他才特别强调了这一组织的“儒家五伦、墨子兼爱为宗，以互助互爱、和平忠厚为旨”的本质特点。

顺便说一句，按照当时青帮的习惯，张璧不可能不收弟子和

^① 见张占一的《回忆张洁珣的证词》，中亭河博客。

义子。根据笔者的调查：张璧也的确收过一些人为弟子和义子。比如，张璧曾将青帮“通”字辈弟子张学清收为义子，还有刘绍臣等弟子也是。由于张璧酷爱京剧，他在京剧艺术界的义子李少春更是尽人皆知的史实。

六 张璧和“天津事件”关系考

所谓“天津事件”^①，是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天津制造的一连串挑衅事件。具体来说，即1931年11月8日晚10点半至28日之间，驻天津日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策动失意军人李际春临时招募了2000多人，组成武装暴动队，先后多次袭击天津市公安局、市政府及省政府，以及一些驻外使馆和租借地。驻天津日本领事以此为借口，下令驻扎在天津海光寺的日军“支那驻屯军”在闸口炮击天津市区。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也特别提出所谓“抗议”，并要求国民政府遵守辛丑条约、将军队撤出天津、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等。这一连串事件总称为“天津事件”。由于参加这次暴动的这些人不穿军装、没有番号，所以习惯上又称他们为“便衣队暴乱”。

根据我所看到的有关“天津事件”前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发给日本外务省的550多封电报来分析，这一事件完全是奉天省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联合当时驻扎天津的日军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策划的一起中国暴民袭击日本驻华使节和侨民的苦肉计，目的是以此为借口，挟持溥仪逃离天津，回到奉

^① 亦称“天津事变”。



天津事件发生现场照片

天，组建所谓满洲国，以瓜分中国、侵占整个华北。这是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1931年12月5日桑岛致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的电报中就已经明确地表明：“8日以来的暴动，天津日侨对土肥原和关东军的不满情绪逐渐抬头。”挑明了事件的知情人（天津日侨）对制造事件的当事人（土肥原贤二和关东军）的不满。^①

最先认为张璧和“天津事件”有关的，是1931年11月9日

^① 引文见日本外务省档案《天津事件來電及來信2》。

旧北平市发行的《晨报》号外。该报认为，日本人伙同张璧等人一起制造类似奉天事件的天津事件。这也是事件发生之后张璧被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暂时通缉的直接原因。但是该报的消息来自于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对被捕的便衣队员的审讯记录，该审讯记录以电报的形式，发给国民政府南京铁道部部长连均，全文如下：

南京铁道部部长连均鉴。

支密。

据报载庚晚十一时许，天津有流氓八百余人携有枪支，突向中日界之海光寺警署轰击，当时之日租界中，突开机枪向中国地施行放。我军警当即拘捕暴徒，供系受张璧、李际春收买。曰庚夜举事，有日人在内指挥。今《晨报》号外，日军指挥华人张璧、李际春用铁甲车、飞机、步兵占津各机关。^①

这封密电告诉我，它的消息来源是1931年11月9日旧北平市发行的《晨报》号外。密电居然来源于街头报刊，可见这密电有多廉价。

而在国内学术界，方兆麟《天津便衣队暴乱》一文中说：“便衣队总部设在蓬莱街太平里6号，李际春任总指挥，张璧任副总指挥”。^②有人认为：“天津警察局特务队向当时的上级报告：土肥原贤二和汉奸张璧、李际春等，在日租界秋山街张璧住宅内

① 引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第474—475页。

② 《文史精华》1997年第1期。



被抓捕的便衣队

秘密商量便衣队暴乱。综合连日来的报道，天津保安队及时做好了抗击侵略的准备。”^① 似乎李际春、张璧任事件的正、副总指挥或正、副队长成了主流观点。台湾著名民国史家郭廷以在《中华民国史事日记》11.8条记载中说：“夜十一时土肥原策动天津汉奸暴徒张璧、李际春等千余分三路自日租界袭攻河北省政府及公安局，日军开炮助之。”^②

我想，大陆和台湾双方学术界的一致点是如下两点：

第一，“天津事件”是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一手制造的。这是没有疑问的。

第二，李际春在伪满洲国成立后的汉奸行为和他在“天津事

^① 《我亲眼看见便衣队暴乱》，《天津青年报》2003年9月15日。

^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84年。

件”中的首要分子之地位，也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等待暴动的便衣队



夜幕下配合暴动的关东军士兵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张璧是否参与了这一事件？

当时张璧在天津干什么呢？根据考证，原来他正谋划着要举行“天津起义”，力求达到将张学良赶出天津的目的。他认为正

是张学良带兵入关参战，才直接导致了蒋介石大获全胜而致冯玉祥军事惨败的尴尬境地。参与谋划“天津起义”的主要人员有陈觉生、潘毓桂、李鸿年、石友三等人，证据可见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张璧档案中对此的记载：

民国二十年纠合同陈觉生、潘毓桂、李鸿年等冬月在天津起义、驱逐张学良之计划。当时因土肥原等之意见相左。

注意：这里的“土肥原等之意见相左”是土肥原密谋策划“天津事件”，而张璧等显然是计划施行“天津起义”。

前一章我们已经谈到了各路反蒋军，由阎锡山为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副总司令，传檄天下，讨伐蒋介石。檄文称：“本总司令将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救党国。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必起而讨伐之，今有挟党部以作威福者，全国人民亦必起而讨伐之。”张学良也曾信誓旦旦宣言反蒋，不想却于大战中突然倒戈拥蒋出兵，使阎、冯大败。而张学良东北军入关控制了京津地区。张璧作为国民革命军东北特别委员会委员，觉得有负冯玉祥之重托，为了重新夺回京、津两地，开始策划“天津起义”。

接下来，我们再考察一下便衣队的由来。

1931年1月1日，李际春开始在京、津两地公开招募便衣队。当时北平市公安局特别发布了密令“字第1264号”，严防便衣队。该密令说：

逆徒李际春在沧州境内以河工名义招有夫民四百余人，每人给安家费八元，现集于天津东南与沧州交界处蜂窝及受

大寺一带。

在宋哲元就任冀察政务委员长期间，也有便衣队在北京市内捣乱。如下记载：

有白坚武者，受日人唆使，组便衣队，并以炮击永定门。^①

便衣队应该属于李际春和土肥原贤二两人密谋策划“天津事件”的前奏，和张璧谋划“天津起义”基本无关。接下来我们需要解决以下几个核心问题，我相信只要彻底搞清这些问题，张璧和“天津事件”的关系问题便豁然冰释。

首先，土肥原贤二来天津的准确时间。

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证明在1931年11月之前土肥原贤二与张璧有过单独接触。

关于土肥原贤二此次来天津的时间，根据1931年11月3日天津《益华报》的报道：1931年11月2日，土肥原贤二从沈阳秘密抵达天津，住在常盘旅馆。而在方兆麟《天津便衣队暴乱》一文中，则变成“1931年10月27日的傍晚”^②。在郎维成《天津事件新探》一文中则变成土肥原“10月29日来天津的”^③。在小林元裕、万鲁建合撰的《天津事件再考——以天津总领事馆、中国驻屯军、日本侨民为视角》一文中，则主张“桑岛29日和

① 见《抗日名将宋哲元家族史料研究》，1992年，第376页，国内印刷本，印刷批准号：津东文图字（92）第00074号

② 《文史精华》1997年第1期。

③ 《外国问题研究》1993年第3期。

来津的土肥原……见面”^①。



天津事件主犯土肥原贤二和香椎浩平

可以说，对于“天津事件”的研究，至今国内学术界还没有彻底搞清楚土肥原贤二此次来天津的准确时间。试想：距离事件爆发只有短短几天，土肥原贤二想和张璧见面并取得张璧的信任，让其答应给他卖命、出卖国家利益，这实在根本谈不上。只有一种可能，土肥原贤二和张璧达成见面和共识，即：张璧想要发动“天津起义”的消息被日军的情报机构获悉，作为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觉得有机可乘，通过自己的秘书何澄事先联系张璧，打着日军支持张璧驱赶张学良的幌子和张璧见面。除此之外，再无任何解释可以说得通。

其次，土肥原贤二和张璧是什么关系？

土肥原贤二和张璧认识的可能条件是：利用青帮的关系。

首先，土肥原贤二来拜访张璧，既不可能直接告诉张璧关东军想策动溥仪到东北建立满洲国以实现分裂中国的梦想，也不可

^① 《城市史研究》2012年9月，第199页。

能向张璧下令为他自己做事——因为土肥原贤二在东北时为了方便开展情报工作，拜师青帮“大”字辈的魏大可，成了青帮“通”字辈的弟子。按照当时的青帮晚辈拜见长辈的习惯，他来看张璧只能以同门师侄的身份，或晚辈弟子的身份。

有些文章臆说张璧成了卖身投靠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的小汉奸和马仔，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杜撰和猜测。张璧从十八九岁开始跟随吴禄贞在延吉工作时，就已经十分了解日本人的野心和特点。而且是张璧最先将土肥原贤二的名字改叫“土匪原牛二”，可以从中看出张璧对土肥原贤二的真实态度。后来，“土匪原牛二”被简化作“土匪原”，成了土肥原贤二在华期间臭名昭著的一个外号。

真正介绍土肥原贤二和张璧认识的人是何澄，他是土肥原贤二的中国青帮“悟”字辈弟子和秘书。这一点也被旧北平特别市公安局内部档案中所如实地记载。

第三，张璧和李际春是什么关系？

李际春生于1877年，卒于1950年。字鹤翔，回族，直隶丰润南关人。他17岁考入开平武备学堂骑兵科，和吴佩孚是同窗好友。因为征讨蒙古叛乱之功，被封为际威将军。1925年开始，他在张宗昌手下任第九军军长。1926年，李率第九军打天津军阀李景林失败后逃走，被张作霖通缉。于是，他亡命天津日租界须磨街新德里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涯。1931年10月，土肥原贤二来到天津后，他接受了土肥原贤二的任命，公开招募当地青帮“悟”字辈弟子袁文会、曹华阳、萧云峰、高鹏九等人，以及一些地痞流氓等2000多人，组织所谓的便衣队。总司令部先后设在万国公寓楼上28号和蓬莱街太平里6号。他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天津事件”。事件发生后，他随同土肥原贤二，挟持溥仪，

逃到了奉天。1932年，土肥原委派在大连的李际春为“救国军”总司令。1933年5月，李际春在秦皇岛成立了“伪冀东政务厅”，自任厅长，并向各县委派县长、公安局长。1935年11月25日，蓟密专员殷汝耕叛变投靠日军，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50年12月，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中，李际春在天津被捕，被以汉奸叛国罪处决。

请注意：李际春根本不是青帮弟子。这是决定了他可以委托袁文会等人组织便衣队、接受土肥原贤二任命成为天津便衣队长的前提条件。同住在天津日租界的张璧，肯定认识李际春。他们的人生遭遇是相似的，即都是失意军人。但是他们的关系不可能亲密无间，因为李际春是吴佩孚的同窗好友，而恰恰吴佩孚是张璧在北京参与首都政变期间的对立面。就这点而言，决定了他和李际春只可能是貌合神离的关系。

第四，张璧是否亲自组织并参与了这一事件？

前面引述的方兆麟等人主张张璧亲自参与了这一事件，任副总指挥、副队长之类的观点等，笔者注意到，在小林元裕、万鲁建合撰的《天津事件再考——以天津总领事馆、中国驻屯军、日本侨民为视角》一文中，根本没有涉及张璧的问题，这值得深思。

如果1931年11月9日旧北平市发行的《晨报》号外的记载是新闻界的猜测的话，那么当时的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天津特别市市长张学铭二人联名给国民政府的密电，就基本上是定论了，电文如下：

查事变发生以前，即迭据密报，失意军人李际春等人受人指使，招集便衣队千余名，在日租界蓬莱街太平里六号设立机关，以李为总指挥，拟于八、九两日在津密谋暴动，

等情。经即与驻津日领交涉，要求将张璧引渡，以遏乱源，业经日领许可。乃我方特务会同日警前往拘捕时，该犯业已事先逃避。^①

这一点极其重要，即：

“天津事件”真正发生前，张璧得知他想发动的“天津起义”已被泄露，张学良下令天津警察前来日租界抓捕他，他在从内线那里得到消息后立刻于11月7日晚，也就是“天津事件”爆发前就先离开了。因此，目前为止，有关“天津事件”的各类著作和论文中所谓的张璧在现场指挥和带领2000多名便衣队发动暴动之说，在铁的证据面前已经失去了事实和证据支撑。

台湾著名近代史学者郭廷以在《中华民国史事日记》11.8条记载中记载：

夜十一时土肥原策动天津汉奸暴徒张璧、李际春等千余分三路自日租界袭攻河北省政府及公安局，日军开炮助之。^②

郭著代表了台湾学术界的基本观点。但从上述几封密电可知，此说是不当的，违背了历史事实。

① 引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第479页。

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84年。

另外，袁文会、曹华阳、萧云峰、高鹏九等人全是青帮“通”字辈白云生的弟子。他们管张璧要叫师爷。辈分的差异，使张璧也不可能接纳他们成为自己的好友。更何况这2000多人又是“悟”字辈弟子袁文会等人招集来的弟子和打手，张璧的青帮老大的地位，绝非是这些和他差了三四代的青帮走卒们想见就可以见到的人物。笔者特别分析这些青帮分子之间相互的辈分和关系，是为了说明张璧不可能成为什么副队长去直接指挥这些人制造的如此事件。

用句江湖话说，他辈分太大，他和孙子辈、重孙子辈的青帮弟子一起这么干，又给他们当副队长，实在丢不起青帮“大”字辈弟子张璧这张脸！我想：至今依然主张“张璧是土肥原贤二任命的天津便衣队副队长”的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里面存在着如此大的辈分和地位差异。这是张璧不可能和土肥原贤二合作的另一原因。

但是，上述电报和文章也证明了一点，即：

“天津事件”发生前，张璧至少是部分参与了土肥原贤二、李际春等人的谋划。从早年军事生涯开始，张璧就擅长当参谋。而当时他正策划以驱赶张学良为目的的“天津起义”，他和土肥原贤二的计划真是“同床异梦”。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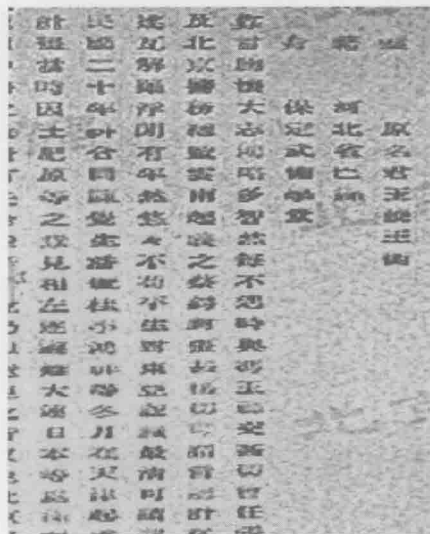
张璧当时谋划和要发动的是“天津起义”，而土肥原贤二想要制造的“天津事件”。这两者有本质的区别。这一本质区别乃在于：张璧想发动“天津起义”，目的是反对东北军侵占天津和北平。而土肥原贤二想制造“天津事件”，目的是将溥仪从天津带到奉天，成立满洲国！显然，张璧误以为土肥原贤二来天津是支持他发动“天津起义”的。因为，从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再到直、奉大战，几乎每一次中国出现的重大政治和军事行动全有

日本军方和政府幕后支持。作为孤家寡人的张璧也不例外的产生了想利用日本人的势力和支持达到将张学良驱出天津的效果。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当时的张璧根本不了解也不可能知道土肥原贤二制造“天津事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因为在“天津事件”真正爆发前，当时只有桑岛总领事和支那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们的计划得到了关东军高层的特别批准，并被视为最高绝密。

我们再看看旧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张璧档案中对此的记载：

民国二十年纠合同陈觉生、潘毓桂、李鸿年等冬月在天津起义、驱逐张学良之计划。当时因土肥原等之意见相左。

该原始档案照片和提示句照片左右并列，上述引文，我们以标示线提示：



所以“因土肥原等之意见相左”，即：

土肥原贤二想制造“天津事件”，目的是将溥仪从天津带到奉天，成立满洲国。张璧想发动“天津起义”，目的是反张，与溥仪之去留毫无关系。既然相左，张璧怎么能听从土肥原贤二的指挥呢？所以“天津起义”和“天津事件”是两个历史事件，不应混为一谈。

这是笔者首先从中日两国之间数百封绝密电报和档案文献中发现的对“天津事件”与“天津起义”区别的最新解释。

到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天津起义”问题上，张璧的确有过错，他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策划了一场反张学良的行动，结果被土肥原贤二所利用。绝非现在有些文章所说的是什么卖身投靠土肥原贤二、甘当汉奸的卖国行为等等不实之指控，而是他无意中被土肥原贤二计划发动的“天津事件”所覆盖，形成了案中案。

第五，事件后，张璧是否逃往沈阳？

事件发生后，立刻震惊了整个国民政府。据说，“国民政府曾下通缉令，通缉他”。目前为止，我没有找到这一通缉令及相关证据。而这里的“乃我方特务会同日警前往拘捕”告诉我们：通缉张璧发生在“天津事件”之前的11月7日中午。通缉令来自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而非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或者说直接来自张学良的特别密令。因为有人向天津特别市警察局密告张璧等人正招聘人马、计划发动“天津起义”这一情报。这一密报被直接通报给了张学良，引起了张学良的愤怒，这才有了通缉张璧的结果。

随着张璧的被通缉和离开天津到大连，张璧幻想中的“天津起义”彻底流产，而土肥原贤二和李际春直接指挥的“天津事

件”在11月8日晚10点半左右正式登场。

事件发生后，张璧并没有“挟持溥仪，随同土肥原贤二一起逃到沈阳”——因为，无论是当时的沈阳还是后来成立的满洲国，均没有他的一席之地。我们从上述的电报“经即与驻津日领交涉，要求将张璧引渡，以遏乱源，业经日领许可”，可以发现：日本驻华领事桑岛同意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抓捕想要发动“天津起义”的张璧，可见他与日方并非合作关系。从这时开始，天津事件的实际指挥官只剩下李际春和土肥原贤二了，与张璧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但是，当时的大连对张璧来说也不是久留之地，故而又躲避到上海，一直住在上海的某个租界中。

因此，郭廷以在《中华民国史事日记》11.8条记载中主张的所谓“暴徒主脑张璧逃赴沈阳”之说是 inaccurate 的。

事件发生后，被通缉的张璧在上海直接或间接地和那里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取得联系，主动说明情况，尤其是他在“天津事件”前已将事变的消息通报给张学铭，这一“主动归顺中央”的行为，取得了国民政府对他的谅解。

1932年，张璧曾偷偷潜回北平家中，看望亲人，然后又迅速返回上海。一直到1933年底，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解除了对张璧的通缉之后，张璧才回到北平安居。

第六，天津事件后张璧和李际春之间形同陌路的关系。

天津事件后，张、李二人没再发生过任何交往。

国内很多文章说“天津事件后，便衣队被打散了，不复存在了”等等，这一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天津事件”中被打死、打伤和被捕的便衣队人员，不到该组织的七分之一，绝大多数人事后跟随李际春逃往东北，成了关东军第八师团下属的“民团游击队”。李际春化名“丁强”，继续担任这支6000多名伪军的总

司令。我们在此引用日本学者古屋哲夫《日中戦争にいたる对中国政策の展開とその構造》一文中的观点，加以佐证如下：

この李際春は、32年春になってもまだ北平・天津方面で暗躍しており、石友三はそれに期待しながら、劉桂堂と連絡し韓復榘の援助を求めているというわけである。しかし32年段階の熱河・華北における政治的謀略が何等の成果をあげ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つたことは、湯玉麟や韓復榘の省主席クラスは動かず、また劉桂堂や李際春は次にみるように関東軍の支配下に移動させてしまったことから明らかであろう。日本側も劉や李は、日本軍の直接的軍事的支援なしには、何事もなしえないとみてとっていたにちがいない。1933年に入ると、関東軍はさきの平和的に湯玉麟を“満州国”に合流させようとする方針をあきらめ、武力によって熱河省を平定し、長城をもって“満州国”の南部国境とする作戦を実施することとした。2月17日に発令された作戦命令によれば、(1)第六師団を主力とし、熱河省東境・内蒙古方面に向う作戦、(2)第八師団を主力とし熱河省南境から河北省方面に向う作戦とが指示されているが、同時に発せられた軍隊区分をみると、第六師団の指導する区処部隊に“満州国軍隊”があり、その一部として“護国遊撃軍長劉桂堂”が加えられている。また第八師団の区処部隊には“救国遊撃隊長丁強”とあるが、この丁強は、ほかならぬ李際春の別名であった。^①

① 《日中戦争史研究》，吉川弘文館，1984年。

这段文字的译文大致是：

这个李际春，1932年春天在天津、北平等地非常活跃。石友三一面寄托着期待，一面又与刘桂堂取得联系，希望能得到韩复榘的援助。但是1932年前后，日本在热河、华北等地的政治谋略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汤玉麟和省主席韩复榘一般人马却纹丝不动，很明显只是刘桂堂、李际春在关东军的支配下行动。日方也明白，如果没有关东军的帮助，刘和李也不可能干任何事的。进入1933年以后，关东军方面的计划是：希望汤玉麟采用和平的手段与满洲国合并，以武力平定热河省，实现以长城作为满洲国南部边境的作战方针。根据2月17日发布的作战命令：（1）关东军第6师团为主力，向热河省东部、内蒙古方向进攻。（2）关东军第八师为主力，从热河省南部向河北省方向进攻。同时，在使用的军队划分上，“满洲国的军队”作为归属于关东军第六师团指导的区处部队，“护国游击军军长刘桂堂”所领导的一部分人马也加入进来。另外作为归属于关东军第八师团指导的区处部队，负责人是“救国游击队长丁强”。这个丁强就是李际春的别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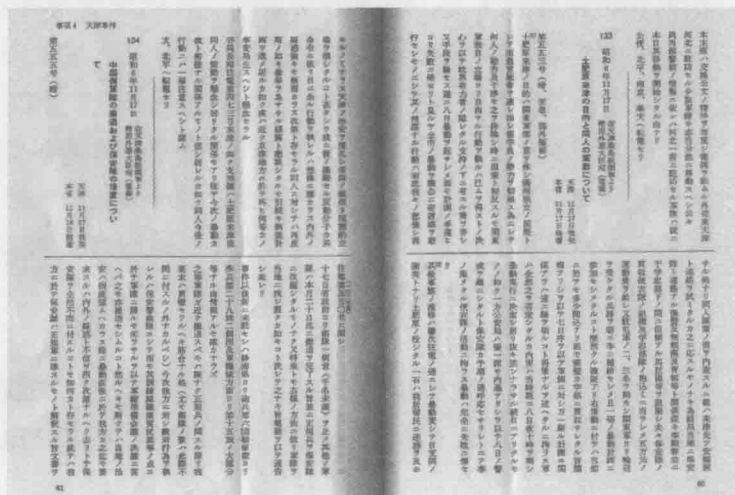
当汉奸殷汝耕在旧北平的通县成立“冀东反共自治政府”时，李际春又带领着这支“民团游击队”来到通县，成了“战区杂军编造委员长”。

试想，如果张璧真的是便衣队的组织者，那么他出任关东军第八师团下属的“民团游击队总司令”或者“战区杂军编造委员

长”，那才是顺理成章的汉奸行为。但是，当张璧明白11月8日当晚所发生的一切时，他再也没有和李际春联系过。就是在旧北平时代，他在宋哲元那里当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顾问、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会的常务委员时，也根本无视紧邻他的“战区杂军编造委员长”李际春的存在。

这里还有一点长期被学术界忽视。即：当时土肥原贤二住在天津日租界石山街三野公馆。而密谋“天津事件”之地也是在这里，而非国内有文章中所说的在张璧日租界的驻地——秋山街岗辰住宅。且李际春实际招聘人马的办公地点是在日租界的蓬莱街太平里6号。

最后，让我们再看看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桑岛总领事发给日本外务省的那封绝密“第553号密电”的内容，分析一下当时的日本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该电报局部照片如下：



最核心的内容是：

而モ張璧カ學銘ニ買收サルタル旨牒報アリシヲ以テ、七日序ヲ以テ、軍側ニ對シ、萬一斯ル計畫ニ關係アラハ速ニ縁ヲ切ルコト、得策ナルヲ迷ヘタルニ拘ラス、軍ハ全然之ヲ否定シタルカ、内實ハ當時既ニ八日夜十時ヲ期シ、暴動實行ニ決定シ居リ拔キ差シナラサル、破目ニアリタルモノノ如ク、一方公安局ハ、張一派モ内通アリシヲ以テ、八日警戒ヲ嚴ニシタルト、保安隊カ預期ノ通呼應セサントニテ、李ノ集メタル便衣隊ノ活動ニ拘ラス、暴動ハ完全ニ失敗ニ歸セリ。

这段日文的中文译文为：

接到了张璧被张学铭收买的谍报。7日开始，万一真的施行此计划的话，便衣队将迅速切断与军队的联系，而军方将断然否认与此相关。实际情况是8日夜10时以后，决定实施暴动。另一方面，张学铭由于有了内线，8日全天一直保持警戒状态。和保安队的预期相互呼应，拘捕了李际春的便衣队员，这次暴动结果完全失败了。

这封绝密的电报透露出这样一点有价值的情报，即：

张璧曾于事件前将土肥原贤二可能要发动“天津事件”的这一消息，偷偷地密报给了张学铭。这才是8日白天张学铭领导下的天津警察局和保安队保持警戒状态的直接原因。

而张璧的这一“出卖”土肥原贤二的正义行为，已经被日本

领事馆在天津地区的间谍所获知，并通报给了桑岛。

到此为止，可以发现：张璧的“天津起义”和土肥原贤二的“天津事件”几乎是并行的两个行动，各自的目的完全不同。

张璧不愧是军事高参的老江湖，他利用了土肥原贤二，又出卖了土肥原贤二。他想驱赶张学良，又利用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他在没有任何职位的情况下，居然通过谋略调兵遣将，以日攻日、以华治华地为自己开脱。

我们不想掩饰张璧在谋划“天津起义”中的过失和错误，但是张璧也不需要承担违背历史事实的罪名，更不需要承担“天津事件”的责任。

七 联日反蒋反张又反伪满洲国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十分微妙而且复杂。从晚清开始的各项政治运动到民国时代的大小战争和革命活动，总可以发现日本的势力纠缠其中。这是历史事实。张璧也是如此，他不得不采取以日治华、以日治日的双重手段，来实现某些政治企图。上章所述张璧谋划的“天津起义”即是如此。

1931年，张璧躲避在大连，由厉大森的介绍，认识了当时的关东军高级参谋、奉天特务机关长、小个子的板垣征四郎。板垣征四郎是日军中著名的中国通，也是日本三大侵华战略激进分子之一。

板垣征四郎，1885年生，本姓清和源氏。他的祖上“板垣伴内”是从属“南部利直”的武士。1871年开始，他的祖上恢复姓板垣氏。

1899年，板垣征四郎考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军校。1904年，他从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毕业后，参加日俄战争。他的同学中就有著名的日本战犯土肥原贤二等人。1913年，他考入陆军大学，1916年毕业。1929年，他出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31年，他和石原莞尔一起策动了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22日，板垣在沈阳参加关东军秘密会议。会议炮制出“满·蒙问题解决方

案”，他首先提出以溥仪为“元首”建立“新政权”的主张。当年的11月初，他的同学土肥原贤二来到天津，开始执行携带溥仪离开天津的“天津事件”计划。

日本学者古屋哲夫在《日中戦争にいたる对中国政策の展開とその構造》一文中说：

関東軍の主導する“満州国建国”政策が、ついに日本の対中国政策の中枢を占拠したことを意味するものであった。翌々13日成立した犬養内閣は17日の閣議で錦州攻撃を承認、内地部隊の増派を得た関東軍は12月24日に作戦を開始し、翌32年1月3日には錦州を占領している。そしてこの錦州作戦と並行して、陸軍中央部の人事異動が実施されていた。内閣交代にともなって陸軍大臣が南次郎から荒木貞夫に代ったのにつづいて、12月23日には参謀総長が金谷範三から閑院宮載仁親王に、翌年1月9日、参謀次長が二宮治重から真崎甚三郎に、さらに2月29日陸軍次官が杉山元から小磯国昭へという大異動であったが、これはまさに“満州国建国”工作の全面的承認への陸軍中央部の転換を意味するものであった。^①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

关东军主导的“满洲国建国”政策，终于占据了日本对华政策的中枢。接下来13日成立的犬养内阁在17日的国务

^① 《日中戦争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年。

会议上确认锦州受到了攻击，批准了关东军的增兵要求。12月24日，关东军展开新的作战行动。1932年1月3日，关东军占领了锦州。和锦州作战同时进行的是对日本陆军省高层人事的调整工作。根据内阁的变动，陆军大臣由南次郎变成了荒木贞夫。12月23日，参谋总长由金谷范三变成了闲院宫载仁亲王。第二年的1月9日，参谋次长由二宫治重变成了真崎甚三郎。2月29日，陆军次官由杉山元变成了小矶国昭。到此为止，意味着日本方面已经出现了向全面认可“满洲国建国”方针的陆军省对华战略的转变。

1932年1月22日，关东军司令部召开“建国幕僚会议”，讨论他提出的建立“新国家”的有关条款和纲领。1月27日，板垣征四郎根据会议决定组织拟制“新国家建设顺序的纲要”。2月16日，他策划和组织了以建立伪满洲国、分裂中国为目的的沈阳会议。然后，板垣带人前往旅顺，逼迫在那里的溥仪就范。

1932年3月1日，溥仪的伪“满洲国”宣告成立。因为这一功劳，板垣征四郎被晋升为陆军少将，先后被任命为满洲国执政顾问、奉天特务机关长、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关东军副参谋长兼驻满洲国武官等职。

正是在大连，板垣征四郎相中了具有北洋陆军中将军衔的张璧。板垣征四郎认为：策动张璧出任溥仪的伪“满洲国”陆军总长是最佳的人选。我们从旧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张璧档案中找到了如下记录：

伪满洲国成立，当时因板垣中将之敦请，有任命陆长



伪“满洲国”成立

之说。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板垣征四郎对张璧异乎寻常地关心，热情款待正被张学良通缉的张璧。他甚至考虑带张璧去东京面见日本的陆军大臣，许诺封张璧为溥仪的伪“满洲国”陆军总长、加封上将军衔。

然而，这个具有中国通称号的日本侵华战略家怎么也想不到，张璧谢绝了这一建议。旧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张璧档案中有如下记录：

（张璧）仍以意见之背（于板垣），又返北京。

这条记载真实地记录了张璧和板垣征四郎之间的“意见之背”。他们二人是如何“意见之背”呢？原始对话是怎么表述的，我们已经不可得知。但是，根据我们对张璧生平的了解和研究，大致推论如下：

张璧的政治理念依然停留在辛亥革命阶段，这使他无法容忍被他亲自逼出皇宫的溥仪再度成为为他所保护的“满洲帝国皇帝”。因为“满洲帝国”是和张璧的辛亥革命理念相矛盾的，因此他不能接受这样的任命和上将军衔。

这大概就是张璧和板垣征四郎“意见之背”的真实所在。我们相信，这一推论并没有拔高张璧。唯其如此，我们才可以理解这条史料中记载的张璧和板垣征四郎之间的“意见之背”这一事实。

虽然张璧对伪满洲国的建立持反对态度，但是因为当时存在的反蒋反张的势力，也使板垣征四郎将张璧归入韩复榘、石友三等一系的阵营中。

关于当时国内反蒋反张的势力及其行动，见古屋哲夫在《日中戦争にいたる对中国政策の展開とその構造》一文中的介绍：

そこでは、前述した天津事件以来、関東軍のほか天津特務機関・支那駐屯軍などの裏面からの傀儡化工作が交錯して続けられていたとみられ、反張学良勢力への働きかけは山東にまで及ぶものであった。例えば片倉衷の《満州事变機密政略日誌》12月20日の項に“韓復榘は一般の形勢を親望し近く蹶起するものの如く石友三亦野心満々たり”と述べられているのは、こうした山東での反張勢力への期待を示すものであった。このうち韓は元来馮玉祥のもの

軍長であったが、1929年馮が反蒋介石の軍を起した際に蒋支持にまわり、その後、山東省主席の地位についている。また石も韓とともに馮玉祥から離れ、一時反蒋挙兵を企てて失敗、韓のもとに身を寄せる有様となっていたものであった。^①

当时，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桑岛总领事给外务省的电报中也汇报说：

石友三ノ野望未夕失セス、劉景堂及馬峰（山東土匪軍頭目）ノ部隊並ニ旧来ノ部下ヲ合セ約一万五千ノ実力ヲ以テ反張学良軍事行動ヲ再起スヘク劃策シ、韓復榘ニ継リ頻リニ其援助ヲ求メタル処、韓ハ武器彈薬ノ補給ハ承諾シ居ルモ軍費ノ支給ニ付難色アリシカ、最近ニ至リ商議纏リ軍費（一箇月三十万元ノ見当）ヲ韓、石兩人ニ於テ夫々半額ヲ負担スルコトニ内定シタル由ニテ、石ハ只管京津地方ニ於テ策動中ノ李際春一派ノ発動ヲ待テ行動ヲ開始セント焦リ居レリ。

这段文字译文大致是：

在此，如上所述天津事件以后，关东军之外，天津特务机构和支那驻屯军等从内部展开的中国政府傀儡化工作的持续和交替进行，对反张学良势力所施加的压力甚至也波及了

① 《日中戦争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年。

山东。例如片仓衷在《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记》12月20日记载“韩复榘，像他那个一直处于观望局势、正在崛起的石友三那样，也是充满野心的”。这也显示出对出现在山东的反张势力的期待。其中，韩复榘本来是冯玉祥手下的一名军长。但在1929年，冯发起反蒋活动后，韩复榘转而支持蒋，此后，他得到了山东省主席的职位。石友三曾和韩复榘一起脱离了冯玉祥，在发动反蒋起兵的计划失败后，石友三只好寄托在韩复榘的府下。

当张璧知道大连已经不是久留之地时，他躲避于上海，住在某一租界内。在解除了通缉令之后，1934年，他的老友商震热情欢迎他返回北平。于是，他离开了上海，回到了北平。

其实，当时的板垣征四郎还在一门心思地劝说着在大连躲避蒋介石的阎锡山。日本学者撰写的《阎锡山と板垣征四郎の“反蒋”提携》一文中介绍了这一事实：

閻と板垣との関係は、閻が陸軍士官学校に留学していたときに、板垣が生徒隊付であったときから始まる。このときに両者は面識を持ったとされている。その後、公に両者が出会ったのが知られているのはおよそ二十年後の1931年（昭和6年）、反蒋戦に破れた閻が大连に逃れたときだ。このとき閻東軍参謀の職にあった板垣は彼を庇護し、山西帰還に尽力したと言われている。そして、両者の間に提携の密約があったとされる。しかし、山西に帰還後、表だつ

て両者の關係を示すような動きは見られない。^①

这段文字译文大致是：

阎锡山和板垣征四郎之间的关系开始于阎锡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的时候。这个时候双方只是相互见过面而已。此后，双方在公开场合的再次会面是二十年后的1931年、反蒋大战失败后阎锡山逃到大连的时候。当时担任过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表态将全力保证他重返山西。然后，两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但是，回到山西后，阎锡山丝毫也没有表现出两人之间的亲密迹象。

由此来看，阎锡山和张璧可能在大连时期就经常见面。尽管如此，张璧并没有成为阎锡山的晋军将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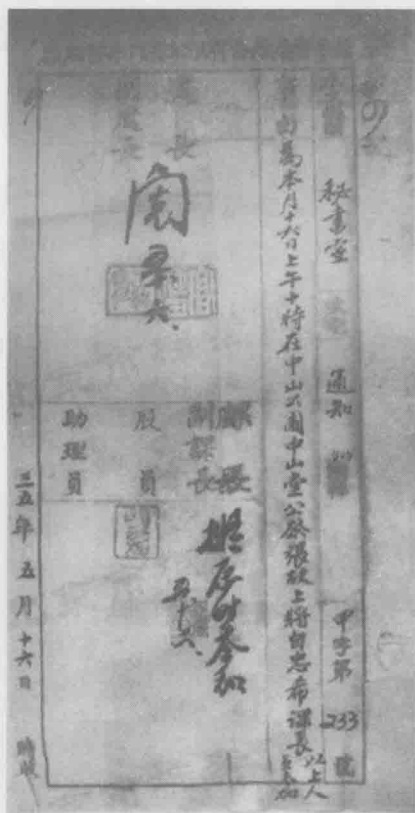
1933年2月，关东军大举进犯热河。板垣征四郎从奉天来到天津，建立了属于他自己的“板垣”机关，负责平、津两地的情报收集工作，企图策动华北“自治”，如法炮制出一个和“满洲国”相似的傀儡政权——“华北国”。

1941年7月7日，板垣征四郎晋升日本陆军大将，调任日本驻朝鲜军总司令，从此离开了中国。1948年12月23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的板垣征四郎，在日本东京都丰岛区池袋巢鸭监狱内被处以绞刑。

1940年5月，因为中了板垣征四郎诈败逃往襄北的奸计，国民党33集团军溃败，军长、张璧的好友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

^① 见《日华事变と山西省》，<http://shanxi.nekoyamada.com/introduction.html>

1945年5月1日，距离张自忠英勇献身整整五年后，北平仍在日伪政权统治下，时任电车公司董事长的张壁出人意料地颁布了《北平电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抗战阵亡将军张自忠等举行公祭活动的通知》（见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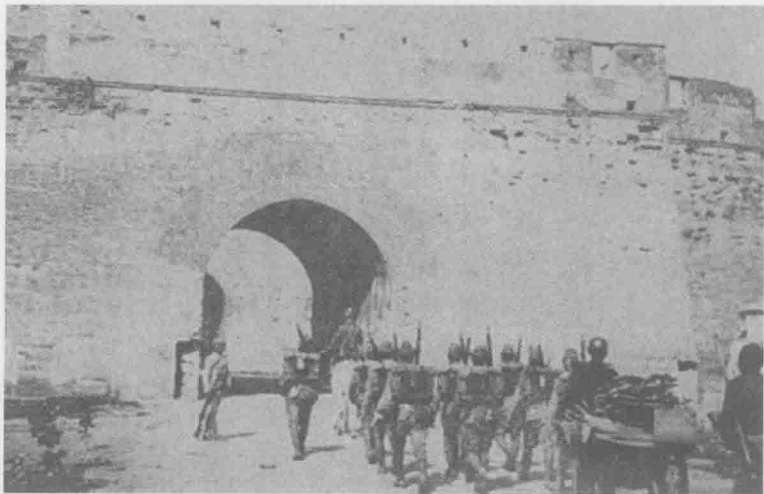


该通知定于1945年5月16日上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办阵亡将军张自忠等的公祭。

这在当时还是日伪政权严酷统治下的北平，这一举动不可谓不大胆！

八 七·七事变后保护古都北平

当举世震惊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这个曾经的辛亥革命元老、京师警察厅总监、北洋时代的陆军中将张璧，此刻他在哪里？他在思考什么？干了些什么？这是我们必须给予回答的。因为这是解读张璧一生政治表现的一个重要关口。接下来的几章，我们将利用原始档案，还原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的张璧的真实表现和历史功过。



演习结束后正通过卢沟桥进入宛平城的日军

1937年7月7日夜10时，驻丰台日军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在卢沟桥以北地区举行军事演习。11时许，日军谎称演习时一士兵失踪，要求进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当即遭到正在那里防守的29军第37师219团团团长吉星文的严词拒绝。于是，理亏辞穷恼羞成怒的日军立刻包围了宛平县城。

凌晨2点，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定，双方共同派员前往卢沟桥现场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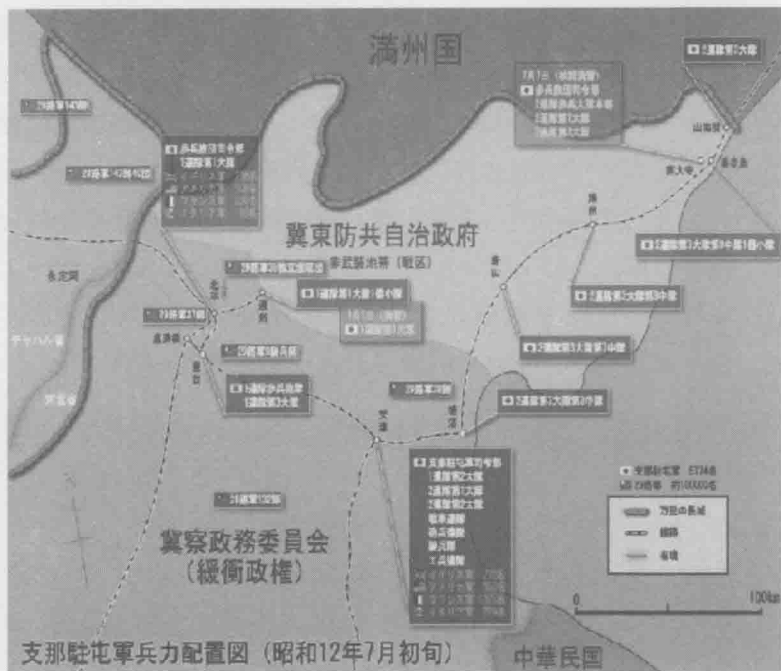


七·七卢沟桥事变时当天日本报纸颠倒黑白的报道

日军却借机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假冒继续寻找失踪的士兵，企图麻痹中国军队，并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早已归队，但是日军却故意隐而不报，继续为发动挑衅制造借口。7月8日晨4时50分左右，日军突然向宛平县城发动炮击，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团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指挥战士奋起抗战。

7月8日，北平当局令驻军坚守卢沟桥。宋哲元致电蒋介石，报告卢沟桥事变真相。同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为卢沟桥事变向日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日军地图

本大使提出口头抗议。同日，日本内阁会议提出所谓“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方针，欺骗世界舆论，麻痹国民党当局，争取时间调集部队。9日，北平当局与日军临时达成三点协议：

- (1) 双方立即停止射击；
- (2) 日军撤退至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撤至右岸；
- (3) 卢沟桥守备由河北保安队石友三部担任。

翌日，中国军队撤退，日军不仅不履行诺言，反而调兵向中国军队进攻。11日，平津当局与日军达成协定：

(1) 29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2) 取缔共产党、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3) 永定河以东不驻中国军队。

10日，各方纷纷报告，日军已由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开到，且有大炮、坦克等向卢沟桥开进，已将大井村五里店等处占领；平卢云路也不通行，战事即将再发。11日起，日军时以大炮轰击宛平城及其附近一带，城内居民伤亡颇多，团长吉星文亦负伤，就将城内居民向城外比较安全地带疏散。战事由此扩大到八宝山、长辛店、廊坊、杨村等处。第29军各部分散于各处应敌。日军出动飞机在各处侦察扫射，战事时断时续。

7月11日，日本政府近卫文麿内阁联合陆军参谋本部通过新闻媒体发布了由武藤章制定的《华北派兵に関する声明》，日本政府决定动用五个师团共40万兵力，企图用武力灭亡中国。蒋介石于1937年7月17日发表了关于解决卢沟桥事变的谈话。

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性战争的序幕。于是，在北京发生的第二场中国军人英勇抗日的广安门事件拉开了序幕。

1937年7月26日晨1时，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下令驻屯军步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驾驶40辆日本军车，装满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由天津出发日夜兼程赶赴北平。大队长广部带兵于凌晨5时30分从天津出发。当天下午2时左右到达丰台。他迅速和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使馆助理武官今井武夫等人商讨进入北平城的方式，决定假冒北平日本大使馆卫队出城演习归来，由广安门或前门开车入城。最后觉得还是从广安门入城比较容易。40辆车队中，扣除物资和弹药之外，实际

列入进城车队的是 26 辆车队的官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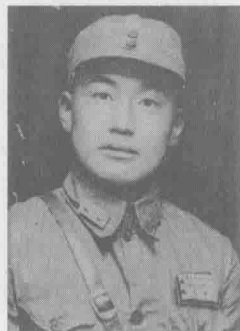
当时，驻守在北平广安门的是赵登禹部 132 师独立 27 旅 679 团团团长刘汝珍及其官兵们。当日军行进到广安门城门下时，刘汝珍首先率团坚决阻止日军进城，并紧急致电宋哲元。宋哲元愤怒地从牙根里蹦出一句话：“敢强入城者，一律给我打！”



秦德纯



刘汝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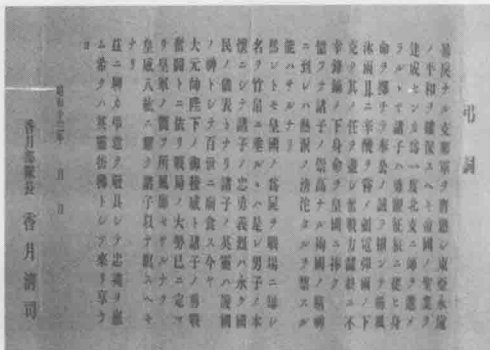


吉星文

接到命令后，聪明的刘汝珍团长决定来个瓮中捉鳖。他先下令开门，诱日军进入。自以为得意的日军第三辆军车刚开进城，刘汝珍立刻下令开火。瞬间机关枪和手榴弹同时发作，将日军分割为城内、城外两部分，日军多人被当场击毙。

我们从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亲自写的一篇《弔辞》中可以看出当时 29 军战士抗日杀敌的英勇，居然引起了残暴的日本陆军中将的哀叹！

在这篇《弔辞》中，狂妄不可一世的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在文章一开始居然使用了“残暴的支那军人”这几个字。由此可见，中国军人一旦真的开始抗日，就彻底改变了以往忍辱负重、被动挨打的懦夫形象。让我们为英勇抗战的 29 军将士们喝彩！



香月清司及其《甲辞》

宋哲元得知消息后，立刻给何应钦发电报，报告了日军由广安门强行进入北平城的消息：

限即到。南京。部长何：三一—二密。今日下午七时，敌用载重车三十余辆，载兵约五百名之谱，由广安门强行入城，经我守兵阻挡，不服制止，以致互相冲突，刻正在对峙中。似此情形，敌有预定计划，大战势所不免。

除飭各部即日准备外，谨闻。

报宋哲元叩。

于是，中日两军在广安门城楼四周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攻城不下又急于解救已经入城被围的日军，日本广部大队长紧急要求调炮兵和飞机增援，力图打开缺口，杀进北平城。一场大战即将在古都展开。北平城也即将成为一片“瓦砾”。

我们在这里公布一下保存的旧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张璧档案中有关北平古城的记载：



日军飞机在北平上空低空飞行侦查

当时情况如非张氏周旋，北京城早成瓦砾矣！

在这关键时刻，张璧看到历史文化名城的古都就要被日军的炮火和战机轰炸所摧毁，明白自己担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那就是保护古都建筑免遭炮火毁灭，于是挺身而出。

7月26日晚，张璧来到广安门城楼前，面见29军的现场指挥官132师独立27旅679团团长刘汝珍，与之相商，避免把日军的炮火引入北平城。同时他又和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等高级将领通了电话，晓以大义。作为中国人当然不忍看到历史文化名

城的古被日军的炮火和战机所摧毁，29军全体官兵立刻明白了保卫古都的意义。



当时的北平广安门城楼

然后，他又将生死置之度外，冒着随时可能被流弹击中的危险，凌晨2点左右出城面见日本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广部大队长、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等人。他郑重向日本人说明北平的文物价值，严厉劝说日军绝对不可以炮击和轰炸北平城。日军要求中方只要能保护已经进入城内的日本军和日本侨民的安全，答应将不再炮轰北平城。于是，张璧再次去和29军商量，最后经协商，双方撤兵事宜如下：

日军的城外军队撤退到规定线以外，已经进入城内的日军广部大队，分乘13辆汽车于27日凌晨2时半退入东交民巷的日军兵营。

中方 29 军 132 师独立 27 旅 679 团全体官兵撤向门头沟待命。

旧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张璧档案中的“当时情况如非张氏周旋，北京城早成瓦砾矣”这一记载，是对张璧肯定和赞美。

一场险些毁掉北平古城的战争，因为张璧的从中斡旋，得以化解。如此重大的一件历史事实，居然没有被中、台两地公开出版的文献资料所记载。

《日本外交文书·広安門事件に就て：河邊兵团司令部》中，记载了中日两军在凌晨 2 点左右从交战到主动撤离的详细过程。该电报没有解释交战双方自动撤离的原因。

另一见证人、日本当时驻华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轻描淡写地写道：

驻屯军为了使古都北平免遭战火的波及，曾由张璧作为使者，代表驻屯军向 29 军交涉，要求他们于当晚 9 时立刻撤出北平城。于是，29 军接受了调解，主动地向门头沟方向撤退。

到处烧杀掠抢、施行三光政策的侵华日军居然也会考虑起“驻屯军为了使古都北平免遭战火的波及”这一天方夜谈的神话来了。既然北平是古都“日本皇军想到了要保护”，那么请问今井武夫，日本皇军为什么不保护同样为古都的南京呢？！

在这里，让我们看看日后的日军侵略者是如何轰炸南京城的：

侵略者说谎总是无法自圆其说。但是，这段文字至少佐证了张璧挺身而出保护古都的这一英勇行为的历史真实性。

当时日军特务机关出版的每日内部情报通报，也详细记载了



日军炮轰后的南京城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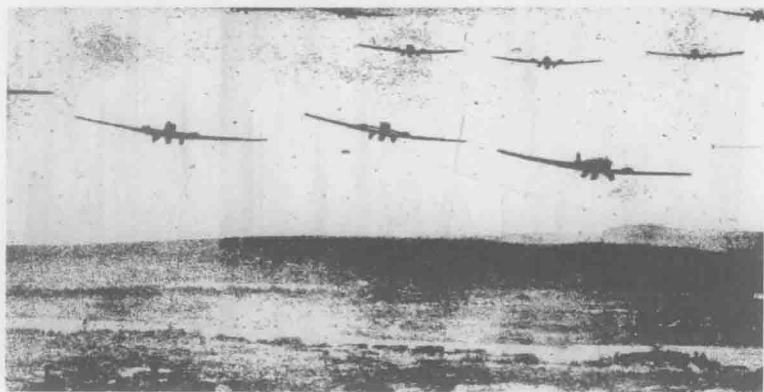


日军炮轰后的南京城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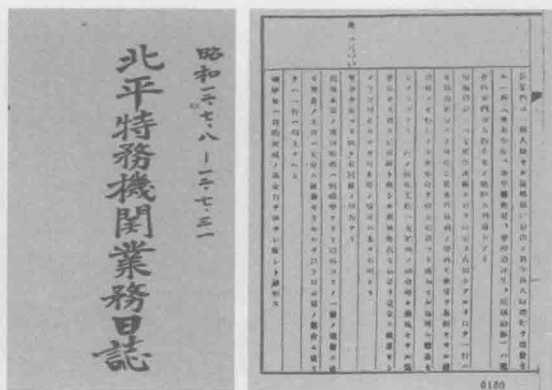
此事，该资料照片见下页。

今井武夫在《支那事变の回想》一书中也记载了这一历史事实，相互印证，可以确认此事的真实性。

中日双方军队各自撤退后，在北京门头沟并没有再交战。但是，29军的抗日之火已经被全面点燃。



正在轰炸的日军飞机



27日，日军首先出动大批飞机悍然轰炸了天津城。天津南开大学惨遭日机的轮番轰炸，学校内的很多设施如图书馆、教室、宿舍全都付之一炬。日军的野蛮轰炸，不仅造成天津城内的房屋被毁，还造成了两千多平民的死伤。

27日，宋哲元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抗战。

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向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作战令。日军香月清司中将正式向宋哲元发出电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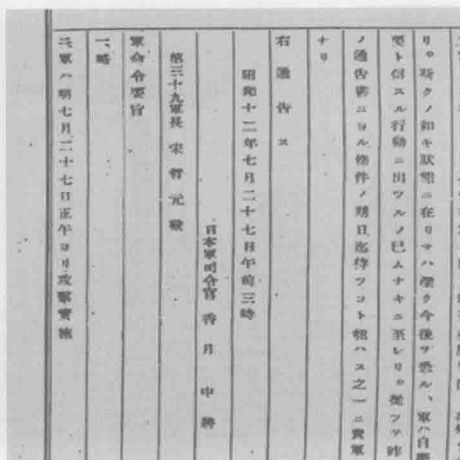
被日军轰炸后的南开大学



被日军轰炸的天津市政府

日军将在 28 日进攻北平。该电报照片见下页。

1937 年 7 月 28 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香月清司指挥着主要由韩国军人组成的第 20 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 1 和第 11 旅团，以及伪军约 1 万人，在 100 余门大炮和装



甲车、数十架飞机的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西郊南苑、北苑、西苑的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29军驻南苑部队将士全线阻击。最后，张璧的友人、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牺牲。

七·七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佟麟阁



赵登禹

九 协助宋哲元策划通州起义

1935年初，土肥原贤二开始积极策划华北地区脱离国民政府和中央分裂的阴谋。

11月15日，在土肥原贤二劝说下，殷汝耕联合冀东各地一批亲日分子，致电宋哲元，攻击中央政府，要求实现“华北自治”。11月24日，殷汝耕在通州召集非军事区各县及宝坻、香河、昌平县县长、各保安队长临时会议，并于当晚发表脱离国民党中央政权宣言。决定“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冀东之和平”。11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殷汝耕自任“委员长”，后改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公开打出“自治”旗号，成为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汉奸傀儡政权。

殷汝耕于1904年考取官费留日。1909年，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再度赴日，入早稻田大学学习。从此时开始，他兼任孙中山所办中华政治学校翻译。1916年毕业后回国，被任为众议院秘书。护法政府成立后，他被委为驻日特派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叛变，枪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殷汝耕任总司令部驻沪办事处主任。蒋介



殷汝耕及其伪政府

石每去东京，他都当随从翻译。1928年，他被委任为外交部驻日特派员。10月归国后，他先后任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交通部航政司长、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上海市政府参事等。1933年11月，他被委任为河北冀东非军事区的蓟（县）密（云）区行政公署督察专员。他公开与日本侵略者勾结，使冀东非军事区成为日军严密控制的势力范围。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殷汝耕立刻遭到了国民政府的通缉。宋哲元也接到了蒋介石和戴笠分别发来的除奸密电。宋哲元对殷汝耕的叛变非常恼火，因为这将彻底打乱国民政府交代给他的与日周旋、虚与委蛇的计划。于是，他决定先采取行动：

五日，冀察政委会再度向冀东政府提出通牒，要求合并，以免国土政权日就破碎。十九日，日本武官今井武夫访问天津市长萧振瀛，并警告不得对冀东自治政府加以压迫。^①

^① 《抗日名将宋哲元家族史料研究》，1992年，第381页，国内印刷本，印刷批准号：津东文图字（92）第00074号。

但是，在日军压力下，宋哲元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是很棘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成立，不但是对国民政府的背叛，同时也是对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背叛。为此事烦恼的宋哲元找来石友三和张璧二人，协商对策。



宋哲元

宋哲元生于1885年，山东乐陵人。抗日名将。北洋陆军武备学堂毕业，服役于冯玉祥部，是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陆军二级上将。曾任热河特别行政区都统、陕西省政府主席、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冀察绥靖主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河北省政府主席。1940年3月因肝病辞职，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4月5日因病逝世。

在宋哲元面前，石友三首先提出：由他带领军队去攻打通县。条件是希望拿下通县后，宋哲元任命他为冀东行政长官和警

备司令。宋哲元没作答复，当晚却在日记中写道：绝不能“以虎易狼”。这也就等于否定了石友三的建议。

张璧的建议则是：分三步走，首先分化瓦解伪军内部组织。其次策反伪军保安队。最后命29军直接去攻打通县。

关于张璧的这一建议，李云汉在《宋哲元与七七抗战》一书中说：

据外交部从天津获得的情况，宋曾令石友三、张璧等新归正将领计划收复冀东。^①

这一记载十分重要。请注意这几个字：“新归正将领。”这是否说明当时张璧已在宋哲元军中任职？

但此事的结果是：

正考虑间，日方已得秘报，加强戒备，攻通计划不果行。^②

由此可见，此时的张璧是具有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抗日锄奸之心的。

只是这一计划被北平日本特务发觉后及时加强了安保措施。宋哲元采纳了张璧的建议，开始私下里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等建立秘密联系。几次私下会见，全由张璧安排，并全程陪同。可以说，张璧是宋哲元

①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传记文学出版社，第180页。

②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传记文学出版社，第180页。

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保安队长秘密联系的主导人。

秘密策反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1937年7月27日夜，日军向驻扎在通州附近的29军发动进攻，并用飞机进行轰炸，结果却误炸“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保安队。此举激起了保安队的不满。7月28日午夜至29日凌晨之间，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在地通县，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等决定起义复仇。于是就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保安队复仇起义事件。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在张庆余、张砚田的率领下，将驻守通县城内的日本侵略军一个中队及部分日本侨民共计400多人全部歼灭，活捉了大汉奸殷汝耕。此事被称作“通州事件”。但是，由于29军没有及时接应，起义军最后面临日军大军压境，遭到了血腥镇压。殷汝耕在被押送北平的途中，被赶来镇压起义的日军劫走。起义军最后撤离通县，经北平向西转移。在不断遭到日军飞机和大炮的攻击下，遭受重大牺牲。最后，张庆余决定化整为零，残余的起义军经门头沟向保定方向成功突围。

通县起义后，蒋介石立即电召逃到保定的张庆余等主要起义将领，到南京接受中央政府的奖励。在南京，张庆余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国防部军政部第六补充训练处长。以后又转任91军副军长、国民党军委会参议等职。

殷汝耕虽然被日本军队救走了，却立刻被日本宪兵关押起来，“享受”了大刑伺候的待遇。他的日本老婆和日本小舅子从日本赶到通县，企图营救他时，也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了一个多月。三个多月后，殷汝耕才被放了出来。原来，这中间发生了狗咬狗的闹剧。“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继任者是大汉奸池宗墨，

他长期和殷汝耕争宠，利用通县起义的爆发，向日本宪兵队举报殷汝耕是通县起义的主谋。

抗战胜利后，殷汝耕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入狱，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1947年11月8日，国民政府南京高等法院作出判决：“殷汝耕连续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外，没收。”同年12月1日，殷汝耕被执行枪决。

通县起义，是在宋哲元领导下，张璧直接参与策划的保安队抗日复仇的起义。是对华北地区的日伪集团的狠狠一击，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

十 四存学会和北平公用总局时代的张璧

1919年，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来到博野北杨村瞻仰颜习斋故居，他被颜、李二人主张的“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的学说深深打动了。他认为这一学说可以富国强民。第二年，在徐世昌倡导下，北京成立了“四存学会”。所谓“四存”，源自颜元的著作《存人编》、《存性编》、《存学编》、《存治编》。徐世昌任总统后，提高了颜元、李塹的地位，使之从祀于孔庙。

《四存学会呈京兆尹警察厅的立案文》中说：

清初博野颜习斋、蠡县李恕谷两先生，师第一堂，躬行孝友，苦心志，劳筋力，复礼、乐、射、御、书、数之旧，兼水、火、金、木、土、谷之全，周礼之大经大法，灿然复明于世。今日列强竞争，遂德与艺能并重，两先生之教，尤属当务之急。

1922年，经徐世昌批准，在北杨村创办了“四存小学”。1929年，又在北京府右街创建了“四存中学”，并将经学作为四存中学的基本教学科目。当时学校的校训定为“尚实学，尚实习，尚实行”。



徐世昌及四存学会出版的《颜李学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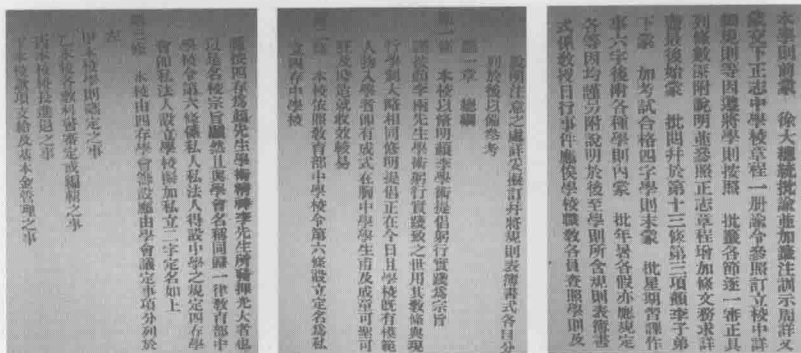
四存学会发行会刊《四存月刊》，倡导颜李学说。该学会由于得到了民国大总统的支持而发展迅速，至1923年，会员发展至800多人。1923年，四存学会组织学者们整理了颜李学派的诸多著作，并由徐世昌署名主编出版了《颜李丛书》。

张璧于1937年夏开始任“四存学会”和“四存中学”及“四存小学”的名誉董事长。四存学校教育内容包含七个方面：公民训练、基础训练、生产训练、合作训练、卫生训练、民族精神训练、教学训练。其中，基础训练主要包括武术、军事两方面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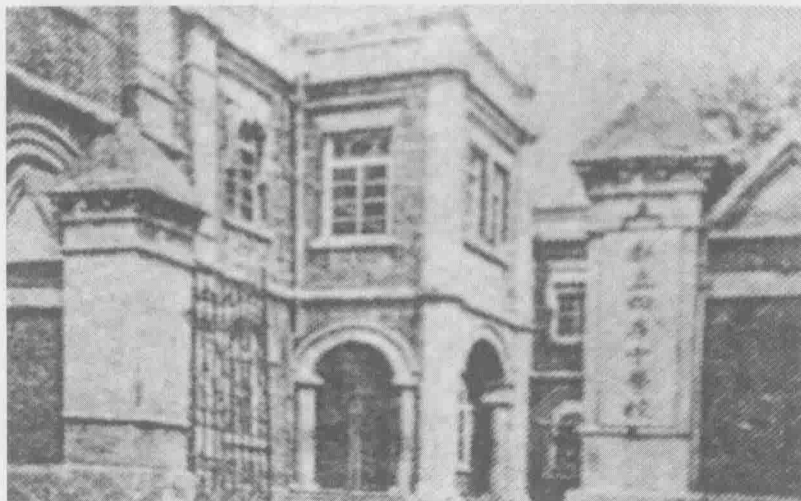
四存中学的毕业生出了不少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和革命干部。如，科学家梁守槃院士、邓稼先院士、林家翘院士等；文学家刘征、刘体仁、黄奋等；革命干部前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等。^①

^① “四存中学”即现今“北京八中”的前身。

四存中学的学则见如下：



四存中学的学则



四存中学旧址

张勃兴在《荏苒春秋》一书中写道：四存中学是当时北平市教学水平最高的中学之一。学校创建于1921年，是由四存学会



张勃兴（后排中）和四存中学同学

创办的。学校的教育水平很高，主要是得益于所聘请的教师都是当时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课程的选择除按教育部门的规定外，每周还增设一定课时教授中国古籍，尤其注重对学生加强道德修养教育。^①

张勃兴是张璧的堂弟张炳经之子，生于1930年，曾就读于四存中学，毕业于华北大学。17岁参加革命。“文革”后，曾任陕西省省长，省委书记等职。是中共十三届和十四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九届委员会常委。

四存中学学生毕业时，张璧都会在毕业典礼上给学生们作讲演。

四存学会崇尚颜李学说，因颜元和李塏二人也喜欢武术，并

^① 张勃兴：《荏苒春秋》，太白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5页、26页。

常年坚持锻炼，这使张璧在四存学会开设武术教学成为可能。武术教学主要由河北省深县的著名武术家王芃斋先生主持。详细内容请见《张璧和大成拳的诞生》一章。

那么，张璧为什么要大力宣传武术、军事这两方面的基础训练呢？

让我们看看当时北平市的生存状态。

1935年初，日寇野心膨胀，阴谋华北地区脱离中央政府独立，于是，华北地区局势异常严峻。5月29日，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展开秘密谈判。6月9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出备忘录，要求国民政府宪兵第三团、军委会政训处等撤出华北，取消河北省各地国民党党部，禁止一切国民党活动；取消河北省所有反日组织及其活动。当天，何应钦致电蒋介石，认为“我方军事经济与外交一切均无准备，万一战事发动，顷刻之间，即将平、津断送，且将牵动京沪及长江一带，国内立致崩溃”^①。

6月13日，何应钦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7月6日，何应钦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接受日方的全部要求。这就是所谓的“何梅协定”。该协定如下：

何应钦阁下：

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

〔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

〔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

〔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论一》，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681页。

〔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

〔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

〔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

〔七〕第51军撤退河北省外；

〔八〕第25师撤退河北省外，第25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

〔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

〔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

〔二〕任命盛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或为不良之人物。

〔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

以上为备忘起见，特以笔记送达。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

昭和十年六月九日

该协定使国民政府为了保全平、津地区而被迫放弃了在华北地区的大部分权力，为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10月26日蒋介石下令撤销北平军分会。

12月18日，北平成立了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本来，日本人是想让齐燮元任委员长一职的，但当张璧

得知国民政府有意让宋哲元任此职后，立刻多方游说国军高层和驻北平、天津的日军政部多位要人，最终使北平政权没有完全落到汉奸齐燮元的手中。在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张璧档案中如实地记载了这一史实：

为宋哲元之存留问题，偕同郑文轩奔走宋与日本军部之间。

此事后经宋哲元和军统北平站站长张世五分别向蒋介石和戴笠作了汇报。

该委员会直属行政院，负责处理河北省、察哈尔省、北平市、天津市一切政务。

下设秘书、政务、财务三处和经济、外交、建设、交通、法制五个委员会。

该委员会成员如下：程克、高凌霄、刘哲、李廷玉、冷家骥、贾德耀、胡毓坤、门致忠、宋哲元、石敬廷、秦德纯、肖振瀛、万富麟、王揖唐、王克敏、张自忠、周作民。

增补委员如下：曹汝霖、邓哲熙、冯志安、戈定远、刘汝明、李思浩、汤尔和、章士钊。

上述委员中，宋哲元、张自忠、冯志安等人是张璧多年的老朋友。张璧此时也被宋哲元聘为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

关于“冀察政务委员会”，实则是在蒋介石直接控制下的一个与日周旋而听命与国民政府的机构。《宋哲元遗集》中就此解释说：

一方面实质上听从中央命令，在冀、察两省尽力推行政



29 军军长宋哲元（中立者）在喜峰口抗日战场与记者和将领们合影

务。前方表面上与日军虚与委蛇，尽力避免冲突，以求拖延时间，加强战备。^①

因此，此时的张璧、宋哲元和张自忠等人的行为，皆不属于汉奸行为。蒋介石曾明确说：“冀察一切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必须保持正常状态，不得越出中央法令范围之外”，并且重申“绝对避免自治名义独立状态”。^②

1935 年 7 月，蒋介石明确地对秦德纯说：

中央已决定由宋明轩将军承担在北方的全部责任。希望务必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如果他在北方一日，就一定要坚

① 《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150 页。

②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4 年，第 557 页。

持做到，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唯一要注意的是只能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原则下，妥为应付，中央一定予以支持。^①

国民党的态度是如此，那么共产党的态度又如何？毛泽东在致宋哲元的信中说：

我们愿意同山东的韩、绥远的傅、山西的阎，三方面共同组织北方联合战线。必要的话，希望先生也有同样的心情。^②

自1937年夏季开始，张璧在四存学会的真实身份是干事、名誉董事长。但是，因为他在军界、警界、政界和青帮的特殊地位，使他成了四存学会的实际掌权人。四存学会在张璧时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当时四存学会所在地是东城区金鱼胡同一号。

对于颜、李学说，张璧曾经说过如下两句话：“学问以行事为本，离事物便无学问。”又主张“学问须有益于人生，必实践服务于社会方不负为人之意义”。强调知识和行为的统一，强调知识服务于社会，充分体现了他对颜、李学说的深刻领悟。综观他的一生，几乎无不处处表现出这一特点和心得。

张璧虽然出身军人，但对文化教育和学问品德极为重视。这或许是他那书香门第的家庭熏陶吧。从他的文字言谈也可略知一二。

① 《秦德纯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5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41页。



四存学会所在地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8月4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代委员长张自忠，改组成立了冀察地方参议会，由齐燮元、李思浩、贾德耀、张允荣、张璧等人任常务委员。

1938年2月20日，颁布了《北平特别市公署第40号令》，该令如下：

委派张璧试署本市公用管理总局局长。此令。

1938年2月25日，张璧正式就任北平特别市公用管理总局局长、北京公交电车公司董事长、华北交通公司董事。这一消息刊登在2月26日、28日的《实报》上。

公用总局的管辖范围只是电车、电灯、自来水等日常生活设施。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个职务！

北平特别市公用局... 招持新闻界... 公用管理总局成立後 昨任張璧為局長

公用管理总局成立後，張璧君任局長，其任事之始，即致力於整理公用事業，並擬定各項規程，以期公用事業之發達。張君之任事，深得各界之贊許，其對於公用事業之貢獻，實為北平公用事業發展之關鍵。

公用管理总局成立後 昨任張璧為局長

張璧君任局長後，即致力於整理公用事業，並擬定各項規程，以期公用事業之發達。張君之任事，深得各界之贊許，其對於公用事業之貢獻，實為北平公用事業發展之關鍵。

张璧任公用总局局长的发言稿和新闻报道

張璧局長簽署的文件

公用局... 局長張璧...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 張璧

此文件為公用局局長張璧簽署之公文，內容涉及公用事業之管理與規程。文件上方有日期「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及局長姓名「張璧」之簽名。文件右側有「公用局」之印章及「局長張璧」之簽名。文件左側有「公用局」之印章及「局長張璧」之簽名。

张璧局长簽署的文件

作为曾经的警察总监、陆军中将，他如果真的想彻底投靠日伪，完全可以出任日伪政权统治下的“北平警察局局长”或者“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总署署长”、“华北绥靖军总司令”。甚至他的老友石友三出任了“国民政府冀北保安司令”、李际春出任了“战区杂军编造委员长”之时，他依然故我，完全无视他们的存在。张璧以“冀察地方参议会常务委员”出任旧北平市公用总局局长，这是值得分析的。或许经过多年的军阀混战和青帮生涯，眼下需要的是平安度过晚年，或许是正等待出场的最佳时机？我们姑且观之。

我的意拳启蒙老师姜正坤几十年前就曾告诉过我：

旧北平沦陷以后的张璧，有几个经常性的行为习惯。第一是非常相信道教，每月至少初一和十五两日，一定争取去白云观上香。第二是喜欢抽大烟，几乎每天烟不离手。第三是酷爱听京剧。大概因为是将军出身的缘故，他虽然和王芑斋关系非常密切，却从不站桩。

在旧北平时代，青帮分子一般多相信道教。而抽大烟却是那个时代的常态。很不幸的是，张璧夫妇全染上了此嗜好。

关于抽大烟的问题，让我们看一看旧北平时有多少这样的烟民及烟馆：

1942年全市区经伪北平禁烟局许可营业之鸦片零售所300家，白面、吗啡房200家，加上私设者在3000家以上。烟民15万，白面及吗啡、海洛因吸者10万，约占全市人口

的七分之一。^①

如此庞大数量的烟民和烟馆，使抽大烟成为当时的一个时尚，许多达官贵人都染上这个嗜好。也难怪一个旧军人和青帮老大的张璧喜欢上了抽大烟。

其实，在那个时代，抽大烟已经是社会常态了。从张学良到众多军政要员都曾迷于此。

而喜欢京剧则是老北京市民文化的一个体现，更何况他的夫人刘鸿英就是京剧科班出身。为此，他特别帮助老乡李桂春的儿子李少春拜师京剧大师余叔岩，并收李少春为义子，捧红了这位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这实在也该是他对京剧艺术的贡献。

不过，有两件事可证明张璧的明智和立场。

第一件是日本在北京举行第二届武道大会。《实报》1941年2月6日报道：“日本纪元节在北京举行第二届武道大会，地点：北京武道殿。比赛分三种：柔道、剑道、弓道。主办方为华北交通公司。”而华北地区交通公司的大股东之一就是张璧，他还兼任北京公交电车公司董事长。作为主办者之一，张璧并没有命令王芎斋率领大成拳和四存学会体育班成员参加。也没有把王芎斋作为武术教官推荐给日方，拉大成拳和王芎斋下水。详细情况请见《张璧和大成拳的诞生》一章。

第二件则是张璧的三弟张旭昇为生活所迫，从农村老家来到旧北平找工作。张璧态度十分鲜明地告诉他：“这里不是理想的生存之地。”当时，他随便一个招呼，就可以在公用局、电车公司等部门找到份美差。张璧宁可自己出钱资助他的生活，也不让

^①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丛》1992年第3辑，第14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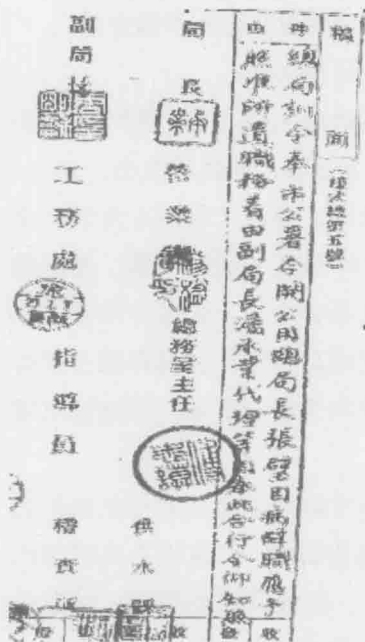
他在日本人手下工作。

1940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下达了《中央关于哥老会及青帮的工作指示》，明确了团结、教育和争取青帮人员走向抗日救国的总方针。正是在这一时期，共产党曾派张璧的侄子和侄女在北平做争取张璧等上层人物的工作。

1940年2月28日，张璧以患病为理由，主动提出辞去北平特别市公用管理总局局长之职，由当时的自来水公司局长潘承业继任。

关于张璧为什么主动辞职的问题，笔者分析原因有如下四点：

第一，北平市公用总局中日伪和汉奸势力的渗透。



张璧辞去北平市公用总局局长的证明文件

张璧是1938年2月29日正式上任的。他上任后就不得不听从伪市长的号召，颁布了必须聘用日本人和伪满职员的指令。见《北京市公用总局为招聘日系职员与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等单位来往日文电报》。

第二，伪北平市政府强行要求北平的公务员员工学习日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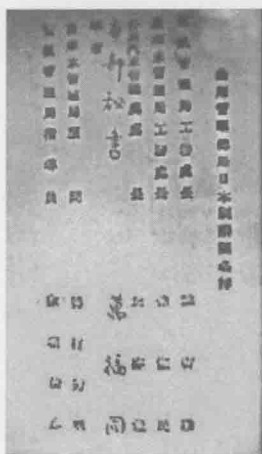
在一切以日本为核心的总原则下，公用总局又颁布了《北京市公用总局关于派遣赴日视察团的呈文、视察团名单和视察报告书》和《北京市公用总局关于成立日语讲习班、日语奖励考试须知、日语津贴支給办法及颁发合

格证书等给自来水局的训令》、《北平自来水管理局关于任用高考及格人员、招考技术人员及推荐员工参加新民学院学习和日语、华语奖励考试等问题的呈以及市政府、公用总局的训令（附考卷）》等行政规定，以及《北京市公用总局转市公署关于汪兆铭就行国民政府主席的训令及北京图书馆周作人兼该馆馆长的公函》，张璧并不喜欢执行这样的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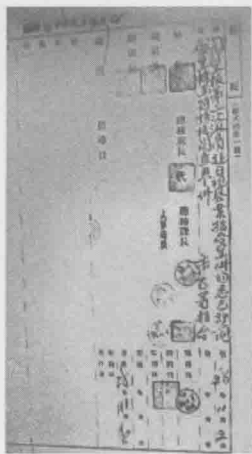
第三，他不愿意配合剿共灭党政策。

当时北平市的伪政府机构必须执行剿共政策，这使张璧不能接受，因他的妹妹和侄子侄女们都是中共党员，虽然他可能完全知晓他们的真实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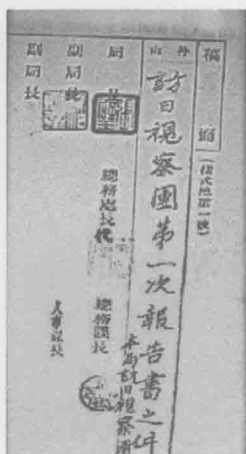
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即张璧没有响应日本政府的访日约请。日方原本以为张璧会亲自出马带领大小机关首长在访日时和日本签署各种各样的合作协议和条约。然而，张璧只是指派了几个从事汽车修理和管理工作的纯技术人员到日本参观（见如下文件）。



访日名单



访日公文



访日报告

这自然不是日本军方所希望的，日军高层对他的不满可想而知。

基于以上四点分析，张璧辞职的原因就清楚了。

张璧主动辞去伪政权的公用总局局长一职，对他本人而言其意义非常重大，即标志着他拒绝了日伪官方对他的继续收买，也标志着他过去一直幻想的凭借日本势力实现反蒋反张目的的彻底破产和终结。

从1940年3月1日开始，张璧开始了新的人生探索。他将自己的工作重点和人生希望全寄托在“四存学会”和“四存学校”的教育事业上，以及青帮组织上。

十一 张璧和他的乡亲父老们

在《张玉衡先生治丧处》纪念册中记载，张璧“为人慷慨，尚侠义，喜交游，周急济贫，毫无吝啬”。

张璧对父老乡亲们是下力保护的，尤其是霸州老家的那些乡亲们。经常有一些生活无着落或是遇到困难的人来找他寻求帮助，他都尽力给予帮助，而且是管吃管住。当时具体负责接待的就是白静明。白氏常接待和安排这些人住在大义社（后来是金鱼胡同一号），并去“翠花楼”张璧徒弟开的餐馆吃饭。月底徒弟到张璧家结饭钱，总是要付一大笔账。

白氏早在30年代的大义社时期，就一直负责张璧的日常接待工作。在笔者采访白静明之子白洪瑛时，他说：那时来找张璧帮忙的人很多，来吃闲饭的人就更多了。当时，张璧家里生活并不很富裕，但他从不吝啬给需要的人们帮助。

如从霸州老家来的陈静斋，每次来京都是张璧负责吃喝居住。张璧常把他安排到鱼胡同一号的四存学会所在地住。

1943年，霸州中亭河南有一地主恶霸为保护自己的地，在河滩南部筑坝，使中亭河道变窄，一旦洪水来时，极可能会造成北岸决口而淹没大量农田。这让沿河村民极为愤慨。共产党地下政权派人到京找张璧。张璧了解情况后即刻给霸县县长翟曜写信说

明事件的严重性，敦促县长翟曜从速解决。翟曜抓捕了恶霸，平毁了土堤。张璧助乡民护河保田的美誉在家乡流传至今。此事在1989年出版的霸县志和2006年出版的霸州市志中均有记载。

早在国民政府刚刚结束北伐之时，张璧就注意到了百姓希望和平、企求生活安定的心态，为此给他的老同学、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商震写了一封治理河流水患和解决房山森林两大问题的建议函。如果不是此信被一直保存下来，除了他的军功之外，我们根本无从谈起张璧关怀民生的功绩和措施。

这封在历史档案馆里被冷遇了长达八十多年的珍贵信函，直到2014年1月22日才意外地被笔者发掘出来，在此，我将重写信人当年的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的建议，他的爱国爱民心态，一览无余。

该信使用“中国饭店旅客用笺”，信封署名为时住中国饭店第42号。该信共四页，内容如下：

起予主席老弟勋鉴：

近日有多事，难得第一谈，恐吾弟事忙，屡欲趋访而未果。兹先函商最要者数项，或较匆匆把晤，转可尽其所怀也。河北水利委员会把持于军阀及南人手中者，十余年。巨款徒靡，水患屡兴。今当革新伊始，水利为吾省千万民命所关，彻底改造，万难再缓。查其所以空耗巨款之由，类以当事者多与河北省毫无关系之人，河务既乏常识，利害更不切肤，欲其热心服务为省民兴利除害，呜呼可得？今当建设开创之时，军阀名流之偶像，无复利用必要。且桑梓父老，千百万生命安危，举系于此，尤非其他空泛政务机关可比，及今不图，将更无彻底革新之日。省民处此青白旗下，恐亦不

容默尔以息，常此置切身利害问题于外人之手也。兄意此事既到无可因循延缓之时。吾弟宜毅然处置，就河北老同志中，物色與情素孚允洽人心之士，完全接收，将军阀余孽及名流外国人之虚风，一扫而空。然后水害可免，款不虚靡，省民生命得一保障处，均吾弟一念革新之所赐也。

外闻王树丞兄有一意见书送呈省府，关于坨清高线路管理局及房山森林变价两问题，亦系地方公益性质。吾弟可注意一阅。

此二事内容详情，系家兄律生与王树丞共同调查之所得，个中原委，颇清析也。兄意房山森林问题，颇可用之为民众团体之经费。近日裁兵风浪已遍全国，河北省民宜当首先号召之衝，组织协会，结合各界，扩大宣传，实行促进，均非有相当经济确定基础不为功。以房山森林供民众裁兵运动之资，化无用为有用，吾弟当不河汉兄言也。有暇甚盼谋一愚晤，专此即颂

勋祺。

兄张璧 谨啓
廿六日夜十二点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张璧的书法十分秀丽美观，具有扎实的楷书和行草书法功底（书信见159页照片）。

根据此信谈到“近日裁兵风浪已遍全国”，可知当写于1929年1月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裁军之时。因此可定此信写于1929年1月29日夜。此信核心是治理河北海河水患和北京房山森林利用这两大关系民生切身利益的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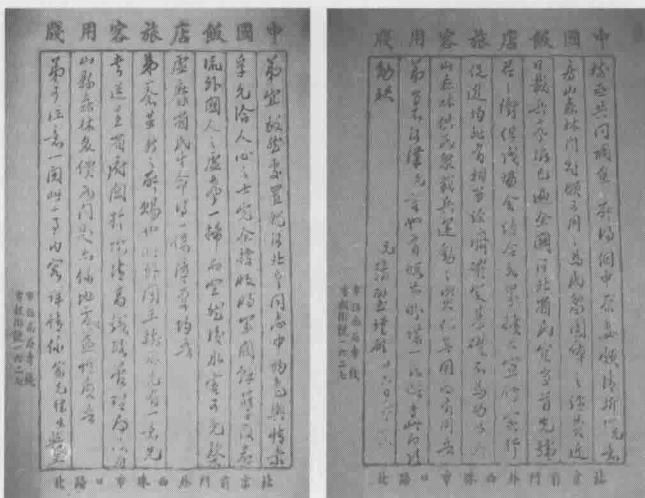
河北水利当然是指海河流域治理问题。张璧明确意识到治理河水泛滥的紧迫：“水利为吾省千万民命所关，彻底改造，万难再缓。”他针对当时“空耗巨款之由，类以当事者多与河北省毫无关系之人，河务既乏常识，利害更不切肤，难其热心服务为省民兴利除害”等陋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军事相争刚结束，他就敏锐地注意到了关系民生疾苦的水患问题。民国政府成立初期，曾经在河南、河北、山东三省分别设立了各自独立管辖本省河水问题的河务局，但相互之间既缺乏协调，又疏于交界地带河道的治理，而堤防又是治理的薄弱环节。张璧提出的根治陈规陋习和贪污腐化的方案是：“就河北老同志中，物色與情素孚允洽人心之士，完全接收，将军阀余孽及名流外国人之虚风，一扫而空。然后水害可免，款不虚靡。”

其实，根据《霸县新志·张毓珊传》的记载，张璧的二爷张毓珊就十分重视治理河水问题：

张毓珊，字樾樵。清增生。世居霸县东高各庄村。性宽和。治家勤俭，事亲以孝闻。好读书。早岁入庠。丙辰岁试，补增广生。因家事繁琐，遂不习举子业。专心理家政。暇则为诸子侄讲经史。……光绪二十年，境内大水，纠合邻村修堤堵口。尝拔夫数千，不分昼夜，亲自督催。竟得秋有收获。……光绪二十九年，在村南中亭河堤修筑永丰闸，环村开沟，旱则引水灌田，涝则泄水注海。

可见，对河水泛滥的治理是张家历代的一个愿望。

该信的全部照片依次如下：



张璧亲笔致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的信

房山森林是指房山县内岳各庄镇境内的上方山森林，是华北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一片原始次生林。早在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

(535)，就有僧人在此开山建寺抚育森林，其中香椿、黄精、拐枣被称为“上方山三宝”，载誉北方，闻名久远。这里的森林峰奇山秀，古树参天，春季山花烂漫，夏季清爽宜人，秋季满山红叶，冬季白雪绿柏，被历代游人称赞为“南有苏杭，北有上方”。其地距京城 65 公里，上方山有九洞十二峰七十二茅庵等景观。张璧建议将此林场作为“颇可用之为民众团体之经费。……以房山森林供民众裁兵运动之资，化无用为有用”。

应该说以上两点建议十分到位，可见张璧的施政能力和眼光。而这些方案又是他大哥“律生与王树丞共同调查之所得”，可见当时张家兄弟二人的忧国忧民之心。张律生对农业和水利的关注，是他以后成为民国时代农业部北平农事试验场场长的背景。

北伐成功，革命胜利，深夜 12 点了，张璧不想醉生梦死，想到的是民生疾苦。他特别注意到了当时治理河患的人，是一些不懂水利、只知贪财、和河北水患没有任何直接利害关系的外省人，民国政府多年的巨资投入几乎全被侵占和浪费，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另一方面，北京房山的森林，成了一些军阀和权贵们侵占的目标。张璧的建议是劝说商震做利国利民的好事，因为他首先注意到裁军风浪当时虽然已遍全国，但是要想实现真正的裁军就必须“有相当经济确定基础不为功”。他首先发现了裁军和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一见解又是超前的。

十二 张璧和大成拳的诞生

张璧在四存学会的身份是干事、名誉董事长，实际上他是四存学会的大总管。他开设体育班时没有找其他的武林高手，而是直接邀请他的直隶老乡、深县的著名武术家王芎斋先生。这一理由他在《大成拳的命名》一文中说得明明白白：

我自十七岁走入社会，……到处注意拳术武工超绝的人物。辛亥以后，从没离开过政治革命工作，也是无时无刻不留心武工人才。虽曾见过不少的派别专家，终觉到非庐山真面，始终也没遇见一种合于人生、适合现代的拳术。

不过，正如他所言：

及与王芎斋相识，感到他的拳术，意味深长，平易近人，习练稍久，就感觉身体的体认与其他的武功迥然不同，并且是具体功夫，非枝节片面的工力，正合乎我生平心理理想的条件。

可见张璧对拳术的甄别还是大有本领的。

那么，王芗斋究竟有怎样的功夫让张璧对他如此折服呢？
首先，让我介绍一下王芗斋的生平。



意拳创始人王芗斋

意拳创始人王芗斋，生于1885年11月24日，卒于1963年7月13日。河北深县魏家林村人。名政和，字宇僧，别字尼宝，号芗斋，晚年自号“矛盾老人”。

王芗斋的曾祖父是清政府养济院医部太医，擅长“宫廷指科导引术”。王芗斋的祖父王名题是晚清名医。王芗斋的父亲王本章，自幼学医。生有二子一女，长子早夭，次子即是王芗斋。王芗斋自8岁开始到马庄的姐夫李豹家，向隐居在徒弟家里的郭云深学形意拳。一起学拳的还有郭云深晚年养子郭园。魏家林村和马庄相距不足三华里，即一千多米。练拳地点就在魏家林村和马庄之间的一片小树林里。到这片小树林里具体指导郭云深和郭园

等人练拳的肯定是李豹了。对于王芑斋，郭云深更是细心教授。他经常让王芑斋在家里练拳，主要是站桩。有一次，在小树林中练习时，几个半大小子一起想撞倒王芑斋，却反被王芑斋把他们几个撞飞出去。这下他们才知道原来王芑斋学了郭云深的真传功法。这应该就是后来意拳中的技击桩法。那个时候，王芑斋还留着小辫子，站桩时时间长了容易低头。这时候郭云深就立刻抬手拉住他的脑后小辫，给他找准头的位置。这一印象十分深刻，王芑斋给李见宇（笔者是他的直系正宗入室弟子）正功架时，经常用手抓他头发或怕打他后脑勺。每当此时王芑斋总要对李见宇说“当年郭老先生给我正桩架子时就这么拉着我的小辫子。”



意拳祖师王芑斋先生和笔者的意拳老师李见宇先生合影

1903年，王芑斋离开家乡到北京等地。在此期间，他先后结

识了八卦掌名家刘凤春、太极拳名家杨少侯、杨澄甫、六合门名家佟忠义，以及同门师兄李存义、张占魁等人。在这一时期他见识到了很多家乡所没有的拳术，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学习和研究内外家拳术。

到了1915年，北京的陆军部部长段祺瑞大力开展在军队中普及传统武术和摔跤、拳击等技能教育。当时把传统武术引入军事教育正成为一种潮流。王芑斋有幸成为陆军部下属的武术教官。摔跤名家马丘清等人也在此执教。王芑斋早期的学生诸子炎（过去一直被误传成周子炎）和齐执度二人也是在此时从他学形意拳的。在此期间，他经常和马丘清等人在一起切磋技术。马丘清曾经摔死过蒙古摔跤高手，但是和王芑斋比试，刚抓住芑斋手腕就立刻被弹出，多次较技都输了。于是，马丘清私下里开始向芑斋学习形意拳法。从本年开始连续三年，他每年和诸子炎比武一次，连胜三次。后来，诸正式拜在王芑斋门下。几年后，随着北京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复杂，王芑斋不想卷入越来越深的北方军队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斗争，南方各省的革命活动和政治空气吸引了他。1918年，他南下河南、湖北、湖南、安徽、福建等省，进行游学。

1918年的深秋，王芑斋到著名的嵩山少林寺。接待他的是监院（副住持）恒林和尚。一开始，恒林和尚见王芑斋身材瘦小，不以为意。谁知一接触，就被王芑斋瞬间所爆发的惊人力量震惊了，二位高人当下都有相见恨晚之感。恒林和尚挽留王芑斋在寺中住了将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相互交流形意拳和心意拳的心法和武学理论。恒林和尚是王芑斋南下所遇见的第一个真正的武林高手。1923年，王芑斋到福建少林寺，遇见了福建纵鹤拳大师方恰庄和方绍峰二人。方恰庄，原名方永苍。福建福清人，

著名纵鹤拳家方世培之侄。方绍峰为方恰庄之师侄和族侄。王芑斋先与方绍峰比武而大胜，方绍峰遂引见其师叔方恰庄。二人比武十场，王芑斋胜四场输六场。（方绍峰常被误传为金绍峰。）双方是英雄爱英雄，正赶上福州周荫人部军队中需要武术教官。于是，王芑斋借此机会留在福建，一边教武术，一边向方恰庄学习纵鹤拳法。在王芑斋的弟子中，只有李见宇精通纵鹤拳法。1926年新春过后，王芑斋回到北京，开始正式倡导他所创始的意拳。

同年夏，天津太古公司和青年会经张占魁的推荐，来京邀请王芑斋前去传授意拳。在天津期间，著名的弟子有所谓“津门十一杰”之称，即：卜恩富、马其昌、苗春雨、赵恩庆（道新）、郑志松、张宗慧、张恩桐、赵作尧、赵逢尧、裘稚和、顾小痴。其他弟子如章殿卿也是这时开始学拳的。本年秋，王芑斋应邀去上海短期教拳，这次他携带夫人和女儿王玉贞同行。

1928年，王芑斋应李景林、张之江二先生邀请，带义子赵道新赴杭州参加第一届全国国术大会。国术大会后应钱砚堂之邀，再次赴上海教拳。以后，在钱的热情帮助下，王芑斋在到达上海的第二年（1929年），在牛庄路成立了“意拳社”，主要成员有：卜恩富、宁大椿、王叔和、尤彭熙、马建超、高振东、朱国禄、朱国祯、张长义、张长信、韩星樵、韩星垣、赵道新等人。在上海教学期间，他开始写作《意拳正轨》一书。1929年，《意拳正轨》一书正式出版。很快，王芑斋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上海，也惊动了当时来华访问的匈牙利籍世界轻量级（59KG级）拳击冠军英格。1931年的夏天，他在翻译的带领下直接来到牛庄路“意拳社”，点名道姓地说：“找王芑斋先生，想见识中国武术的威力。”于是，王芑斋把他引到院内，请他先动手，说“可以使出

全力打我身上任何地方”。英格看着眼前这个小个子中国人，不忍心出黑手，就很一般地使了一记左钩拳打过来。王芑斋先生不慌不忙地用右手臂软软地接住后，瞬间发力，右臂如电击般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英格知道不好之时，身子就已经横着向左飞了出去。他站起来，笑看着眼前这个小个子中国人，仿佛是说“刚才我没注意，没真想打你”。王芑斋看着他也笑了笑，伸手示意他再来。这下子英格如同被激怒的狮子，突然跳着步子，使着组合拳猛扑了过来。王芑斋先生略一低头，一记漂亮的神龟出水把英格向右后方打翻出去，英格倒地后又滚了几下才停住。这下他晕了，半天才站起来。他很诚恳地请求芑斋先生给他讲讲中国拳术的特点。王芑斋向他介绍了他首创的意拳。英格在翻译的帮助下，边听边学，似懂非懂。但是他已经对意拳和王芑斋产生了浓厚地兴趣。最后，他提出请芑斋先生到欧洲各国去教拳和比拳。英格的建议启发了王芑斋的思路。对！我要组建一支到世界各国去比武的意拳队伍。一年后的1932年夏，王芑斋带卜恩富、张恩桐、韩星樵及张长信等弟子返河北深县，开始了为出国比武而展开的集中训练。几年的集中训练，王芑斋系统地完善了拳理和独特的训练方法。

1937年，王芑斋的老朋友张璧来信，约请他们师徒到北京教拳和发展。于是，春节过后，王芑斋全家人一道到北京定居，临时住在西单辟才胡同东边路北的涵静园。接待他的是老朋友张璧。王芑斋在北京打天下，显然离不开张璧的支持。

从1938年正月开始，张璧每月去白云观上香两次，和负责接待的道士姜正坤成了好友。后来，在张璧的安排下，王芑斋陪同进香在白云观休息之时，指导姜正坤等几位道士练意拳。

在北京开始教拳活动的第一站是在东城区金鱼胡同一号四存

学会所在地。

从一开始，王芑斋就阐明了养生为主、技击为辅的拳学宗旨。最早的一批学生是一直参加四存学会讲座的会员。张璧提议在四存学会下设专业的体育班。因为有了名流张璧的支持，王芑斋和意拳的名字开始成为北京武林中的热门话题。

1940年4月2日，张璧在四存学会开会时，提议把意拳更名为大成拳，并在《实报》上发表了《大成拳的命名》一文。王芑斋为此多次辞谢，他深深顾虑此名似有傲世之嫌，可能会在武林界产生不必要的误会。正如王芑斋所说的那样：“以‘大成’二字名吾拳，欲却之而无从也，随听之而已。”于是，张璧又刊发了《大成拳的解说》一文，部分否定了他此前的观点，总算为王芑斋减轻了一些顾虑。由上可证，王芑斋的本意是以“意拳”作为拳名的，而“大成拳”只是随俗和推名之举。这就是“意拳”又名“大成拳”的历史来由。

热爱武术的张璧一生中先后两次给大成拳命名。大成拳（意拳）界同仁只知道张璧对大成拳的第一次命名解说。张璧第二次的命名文章是新发现的大成拳史重要的文献，对于搞清大成拳与意拳的拳名之争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试分别说明如下。

张璧对大成拳命名的第一次解说。

1940年4月2日星期二，农历二月二十五日，《实报》发表了张璧的题为《大成拳的命名：四存学会演述》一文，刊在第四版上，文首还有他的照片一张。



原文说：“及与王芎斋相识，感到他的拳术，意味深长，平易近人，习练稍久，就感觉身体的体认与其他的武功迥然不同，并且是具体功夫，非枝节片面的工力，正合乎我生平心理所想的条件。王芎斋先生的拳术武工，师法形意专家郭云深，郭云深的工力技击，在清季末叶，算是黄河流域的第一流人物，这是多数拳术家所称道的。王君从师虽幼，因质才兼优，故能得到真传，壮年又奔走四方，更虚心于良师益友，兼旁采董海川门下武工真髓，及河南‘心意把’、‘六合步’的工夫，由经验及悟会，溶于一炉，更以形意之‘意’而引伸之为‘神经训练’，合乎卫生条件，合乎技击原理，四存学会体育班，曾由医学家何绍文先生发表专论，留意体育消息的，想都已看过了。我就我的体认及何君的证明，王芎斋的拳术武工可谓得武工的精神，合于卫生，合于技击，更合于科学及现代，以精神统一，训练神经系统，使身体各部官能作平衡的发展，神经健全，各器官的官能增加，不但可

使身体健康，人格亦可随之而完善，作事能力，亦必增强，西谚有云：‘有健全的身体方有健全的事业’，故吾不揣冒昧，以‘大成拳’三字名之。”

张璧对大成拳命名的第二次解说和第一次有了一些差异：

1940年11月21日和22日，《实报》分上下两次在第四版连载了张璧的《大成拳的解说》一文。

这次他主张：

大成拳之名为余所首创，前在四存学会讲述，各报多有发表，对于大成拳之解释，社会上有所误会，故为解说如次：大成拳的解释就是，“合乎运动”，不妨害人体生理，合乎卫生条件者均可列入大成拳。王芴斋先生的拳术，余曾命名称为大成，非以其拳术即大成拳，乃其拳术合乎大成拳之条件，可列入大成拳之内也，大成拳之意义甚广，包括东方体育固有精神，比如儒家之道，并非一经一传，而一经一传均不离乎其道，大成拳之包容尚广，王芴斋先生拳术，不过大成拳之一经，亦可达于大成拳境地也。

在文章最后，张璧再次重申：

大成拳之名乃顾名思义之作，使习此者一举一动，即能引起尊孔重儒之心理并能激发其东方文化固有精神。

可以发现，张璧以“泛大成拳化”来为王芴斋和自己的“顾名思义之作”开脱，也为那篇《大成拳的命名》一文作开脱。换句话说，张璧已经退回了以“意拳”来称呼“大成拳”，基本上

否定了把王芎斋拳术命名为大成拳的主张。

那么，当时张璧对在京日本人武术活动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日本人一向自认为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民族。在每一个占领区，都毫不例外地要举行比武大会。日本军队中的武术高手在和缅甸与泰国拳师的血腥比武中多次失败，催使日本军界高层开始在各占领区插手当地武术界，培养为其所用的武林高手。这大概是某些人把大成拳称为汉奸拳的起因吧。然而，在整个日伪占据北京的三四年级，日本特务机关并没有人把持或渗透到大成拳的教学和比武活动中。王芎斋也没有在张璧有能力的关照下成立意拳研究会。

我仅举出几个有力的证据就可以证明王芎斋和张璧并非是什么汉奸。

第一个证据，日本特务机关在北京最先插手的拳种是通背拳，而不是大成拳。《实报》1938年2月28日报道：“本市拳术名家郝振芳、许禹生、白乐民等为提倡通背拳法，锻炼体格起见，特发起组织中国通背拳术专门研究社，并聘日本通背拳名家武田熙顾问，指导一切。”这个武田熙并非仅仅只是个一般名义上的顾问，居然是可以“指导一切”的顾问！他在北京的真正身份是日本兴亚院华北地区文化调查官、北平地方维持会第五组（文化组）日本顾问，曾因盗运“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佛像”和修改北京中小学教材而臭名昭著。在他成为中国通背拳术的全国总教头之后，和他来往最多的是著名太极拳家吴图南先生。吴图南还亲自为武田熙出版的《通背拳术》一书作序。这个时候，无论是王芎斋还是张璧，都没有利用此机会成立意拳研究会，成立的是“中国通背拳术专门研究社”。

那时刚刚当上北平公用总局局长的张璧，并没有迎合武田熙

的旨意，拉大成拳和王芑斋下水。

第二个证据，日本在北京举行的武术竞赛，见《实报》1941年2月6日报道：“日本纪元节在北京举行第二届武道大会，地点：北京武道殿。比赛分三种：柔道、剑道、弓道。主办方为华北交通公司。”作为主办方之一的张璧并没有让王芑斋率领大成拳和四存学会体育班成员参加，也没有把王芑斋作为武术教官推荐给日方。

第三个证据，不要说是张璧，即便是齐燮元，也并非是日本人的忠实奴才。如日本军方要人来北京接见齐燮元时，齐燮元居然在衣服上挂着有满清五色旗标志的徽章，他的想恢复大清朝的梦想引起了日方极大的不满。大汉奸汪精卫更是对他破口大骂，很快，齐燮元就被伪政府撤消了军权。战后他被蒋介石定为汉奸判处死刑，但是这与张璧和王芑斋是无关系的。齐燮元成为汉奸，和他早期与蒋介石争权结下宿怨有很大的关系。早在1925年，在蒋介石鼓动和策划下，查抄了他的全部家产，见《内务部关于前江苏督军齐燮元褫夺官缉拿讯办其所有私产概行设作赈抚经费请绥办处理的函》。^① 蒋介石的宿敌有的投身了革命，有的则走向了灭亡。有的因为与蒋介石私交甚深而得以逃脱死罪，如周佛海和靳云鹏。

真正由日伪把持的“中国通背拳术专门研究社”及其所属武术家们没有被骂为汉奸拳，而没有任何日伪背景、没有成立什么研究会、只是隶属于四存学会下的体育班练习的一种新兴拳法，却被人骂为汉奸拳。

“汉奸”一般是“卖国贼”同义语。一个武林中人，只要他

^① 见北京市档案馆卷宗号 J181-018-18339。

没有充当日伪打手和帮凶，哪怕他教了几个日本兵的弟子，和汉奸卖国贼也是不搭界的。因为他所能出卖的只是一身武艺而已，教拳只是一种谋生手段。

李康在《真正大成拳》一书中曾主张：“1949年，日本东京举办东亚武术竞赛大会，邀中国参加，并通过伪新民学会顾问邀王芑斋出席。伪政权组织了以马良为首的代表团参加。王芑斋说：这是儿皇帝的代表团。’以病为由坚辞。”石师芑在《名扬中外的意拳宗师王芑斋》一文中说：“1940年，日本在东京举行大东亚武术竞赛大会，请先生出席，他以腿疾，行走不便而婉辞。不久，复有日人指使张某赠银万元以遂先生远征世界之志，实则阴谋收买，先生亦拒不接纳。”

李康的书中明确写的是“1949年”，可能是排版失误的原因把“1940年”排成了“1949年”。我们再来分析李和石二人所主张此说的真假。

首先，“大东亚武术竞赛大会”的准确名称是“东亚武道大会”。举办时间为1940年5月18日至20日三天。汪伪政权组织的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如下：

团长：马良。

副团长：宫元利直。

总务：米仓俊太郎。

事物：治部贞雄。

选手监督：郭建章。

助理：马璞。

随从：法纯、靳源。

武术选手十八名：唐凤亭、唐凤台、关云培、吴斌楼、方枝林、郭宪亚、张思赞、励勤、马祖仁、任希昉、李广远、龚永

福、王保英、王荣标、王侠英、王侠林、宝善林、陈德禄。

全部名单经日本兴亚院华北地区文化调查官武田熙的审查和圈定。他是通背拳社的大总管，这次一下子就派出3名还是父女关系的通背选手，可以理解。另外15名选手中，在1940年的中国武术界的知名度都远在王芎斋之上，更不用说当时第二代弟子们了。换句话说，王芎斋那时刚刚在北京站稳脚跟。看看当时《新民报》上对王荣标的介绍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王荣标亦为此行选手之一，现年六十五岁。原籍安次县，早年以保镖为业，为冀、鲁、晋、陕、豫、甘一带有名之镖师，不独武功精奥，且于各门各派之工夫学说熟知博记，为现在武术界硕果独存之饱学人物，现在国内知名之武士多出于王氏门下。”

遍查当时所有资料，根本没有“通过伪新民学会顾问邀王芎斋出席”、“复有日人指使张某赠银万元以遂先生远征世界之志”之类的相关记载——而且，“张某”是谁？假如是张壁为何不敢明说？当时的“银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大概石师芎还很模糊吧？他大概根本不知道张壁当时全部家当也没有达到“银万元”这样一个数目！所谓“复有日人指使张某”的日本人是谁？还是不敢明说。

以下是笔者在清明节去万安公墓祭祀祖师王芎斋先生时的留影，以及笔者在台湾和大陆同时出版的研究王芎斋拳法及其历史的著作《意拳正轨》书影。

另外，在网络上发表文章说“况且像王芎斋这样的普通百姓解放后政治运动不断，人人都要三番五次地填表，写材料，过政审关。王芎斋也不例外，不然他的工作也不会发生多次变动。不知在他的个人档案里是否有组织上所作的调查和结论。如果有，



那应该是最准确的答案”^①的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既然不知道“他的个人档案里是否有组织上所作的调查和结论”，又何必出来幸灾乐祸地发言？法医学告诉我们，尸体可以说话，对尸体的解剖可以还原被害者死亡的原因和大致过程。而历史学告诉我们，文字可以说话，对档案文献和史料的利用和解读可以还原真实的历史事件。在历史研究上，我们是相信真实的史料还是相信“略知一点历史的老人们”的闲言碎语？

40年代初期，王芗斋在北平的生活有些拮据。于是张璧介绍他去青岛经营矿产。张璧热情地把他在青岛的关系介绍给王芗斋，给王在青岛的生活和经营提供了极大便利。当时，青岛的商会看在张璧的面子上，还增补王芗斋为副会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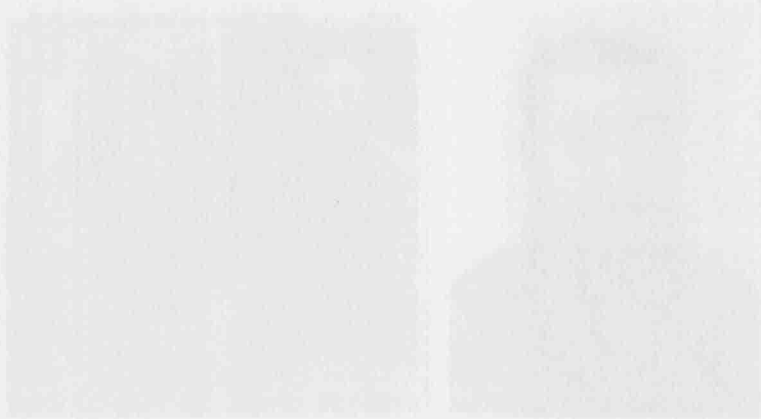
王芗斋也积极地为张璧的堂弟张炳雯之女、一直陪伴在刘氏身边的张婉儒牵线搭桥，将自己北大工科学院毕业的干儿子王炳南介绍给张婉儒，促成了一桩美满婚姻。1945年，在张婉儒出嫁时，张璧以自己女儿出嫁的名义发帖，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这桩美满婚姻，让张璧和王芗斋的深厚友谊延续到下一代。

^① 见 <http://www.xixingcun.com/Wenshizazhi/wszz2008/wszz20080524.html>。



王炳南和张婉儒夫妇



十三 抗战时张璧保护过的共产党人

陈志钧《张璧先生二三事》一文记载：

1919年至1920年之间，张璧开始接触新思想，与李大钊相识并曾多次与李大钊有过会晤。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在晋察冀边区的一次谈话里提到：“在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期间，各方实施营救中，张璧曾奔走出力。”得知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后，张璧与其全军将士一起为李大钊带孝。



李大钊及遇难当天报纸报道

此事为首次披露，可惜至今尚缺乏相关史料证据加以考证和支持。但是，我们从张璧的妹妹曾经师从李大钊和张璧反对张作霖对北平的控制一事来推断，出现此事自在情理之中。



李大钊和张秀岩等部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师生的合影

上述记载是对张璧早期保护共产党人的经历的一个说明。张洁珣在《中央人民政府检查委员张秀岩》一文中还记载：

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我党时期，白区中共党的工作也深受其害。她（张秀岩）尽管身处逆境，还尽一切努力，利用张璧和其他一些上层关系营救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被捕入狱的同志们，帮助已经被敌人注意的同志转移到安全地区。^①这段记载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张秀岩在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时

^① 见《霸州历史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名人卷》，河北霸州市政府出版物，2013年，第106页。

得到过张璧的帮助。

接下来，笔者将讲述张璧在抗战时期是如何保护共产党人的。

樊文稷在《民国名人张璧》一文中记载：

1937年6月，张璧的妹妹，中共天津市委妇女部长张秀岩接到延安密电，她的丈夫李铁夫（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在赴延安参加白区工作会议后在延安病重，让其速去延安。张秀岩心急如焚，立即找到二哥张璧说要去西北，需要路费。张璧知道小妹要去延安，就说我可派人送你到西安，然后你再想办法。随后即派张秀岩的表哥刘梦久陪同他到达西安，见到林伯渠同志，刘梦久才回北京。^①

张璧的侄子张文松回忆：

1936年秋天，我才17岁，还是中国大学的旁听生，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有一天，姑姑张秀岩把我找到天津去，当面交代任务，要我掩护刚刚出狱的彭真。姑姑是20年代经李大钊批准入党的老党员，告诉我利用我叔叔张璧在“大义社”的房子做掩护。彭真一开始住在前门外东打磨厂的一个小旅社里。我的任务是和彭真接头，通知他到新的居住地点，我陪他住在“大义社”的一座宅子，那里四周全是树木，大门朝东，里面有三间房。我第一次见到彭真，他戴

^① 见《霸州历史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名人卷》，河北霸州市政府出版物，2013年，第246页。

着礼帽，穿着夹袍子，个子高高的，脸部十分消瘦，面色青黄十分难看，鼻子显得特别突出，用手绢擤鼻子时还有血。我觉得他像个病人。后来才知道他在敌人监狱里待了6年，刚出狱不久。我称他“魏先生”。当时距一二·九运动爆发不到一年，如何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把学生抗日爱国运动进行下去，通过什么方式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很多工作需要像彭真那样有丰富经验的干部来领导。彭真当时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他不顾恶劣的斗争环境和病弱的身体，很快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主要是开会、与人接头。平津地区不少一二·九运动负责人常去找他，我就给他们准备些茶水、放放哨。有时针对青年学生存在的思想问题，彭真也常找他们谈话。比如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北平有些人士和青年对释放蒋介石不理解，彭真就向许德珩等人详细讲解党的方针政策，指出放蒋有利于逼蒋抗日，建立统一战线等。彭真常到清华大学去工作，有时半夜才回来，到了住处他就敲后墙，越墙进院后我再打开房门让他进来。在我们的住处，存放着许多他带回来的文件，如季米特洛夫的报告、英文的密勒氏报等。彭真告诉我，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他当时也看到了。彭真在这里一直住到1937年春，然后就随刘少奇去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去了。^①

另一营救共产党人的记载是：1942年9月，时任中共冀南区

^① 《文汇报》2013年6月14日，张文松口述，韩勤英整理：《我与彭真的君子之交》。

冀县县委书记的贾庭修到下面的乡村开展工作，途径冯村时被捕，她被关押在冀县看守所。贾庭修坚持说自己只是小学教员，并没有暴露党员的身份。

樊文稷《民国名人张璧》一文中说：

冀南区党委即指派当时在冀南南宫县任宣传部长的张洁珣和张洁珣的二嫂共产党干部黄甘英及江景玉三人，去北京找张洁珣和黄甘英二叔张璧帮助救人。张璧知道自己的侄女、侄媳妇都是共产党员，要救的人肯定也是共产党要人，还是给羁押贾庭修的县长写了信，说贾庭修是自己好友的女儿，没有问题，请与释放，并应诺重谢云云。这个县的县长是张璧的故交，卖给张璧一个人情，把贾庭修取保释放了。^①

贾庭修别名杜光。生于1912年1月12日，山东青州人。1925年考入济南第一中学，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纺织系学习。1933年大学毕业后去太原西北毛织厂工作。1937年，她经彭真和李雪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调入冀南。当年6月接任冀县县委书记，成为中共冀县县委第一位女书记，也是冀南区第一位女县委书记。7月，她和冀南区党委书记李菁玉在南宫结婚。1945年11月16日，贾庭修因心脏病不幸在河南濮阳逝世。

樊文稷的文章提供了真实的史实，可惜没有提供张璧写信营救的时间和具体的县名。

^① 见《霸州历史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名人卷》，河北霸州市政府出版物，2013年，第236页。



革命夫妇贾庭修、李菁玉

张璧写信营救的时间应为1942年12月中旬，这个县就是贾庭修工作的冀县。1942年12月中，张璧给自己的老朋友、时任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的孙良诚写信，要求保释贾庭修。鉴于张璧与孙良诚都曾是冯玉祥的部下，私交甚好，孙良诚在接到张璧的信后，立刻通电冀县看守所放人。于是，贾庭修得以保释出狱。

按照当时日伪政府的规定：签发出狱许可证必须由省、市级别的机关首脑亲自签署才可以。比如，1936年9月，宋哲元就亲自签发了释放共产党人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等人的出狱许可证。因此，营救贾庭修必须要由时任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的孙良诚亲自签发。当时孙良诚的副官张维玺也是张璧在军中的故交。

孙良诚生于1893年，字良臣，天津静海人。1912年加入冯玉祥的军队，1921年成为第11师21旅41团团长。1926年春，任国民军第1军2师师长。1927年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

军第1方面军总指挥兼第3军军长。1928年5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1930年，参加反蒋的中原大战后，和张璧一起被解除职务和军籍。他和张璧都是冯玉祥军中参加反蒋而被整肃的军人，相同的遭遇使他们二人保持着友谊。

又见樊文稷《民国名人张璧》一文中的记载：

鉴于张璧的表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曾邀请其参加参政会议。张璧派自己的秘书、大侄女婿梁以俤参加了会议。^①

梁以俤生于1906年，卒于2000年。广东南海县人。著名画家、中共地下党员。毕业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早年与鲁迅有过书信往来。民国时期曾出版《梁以俤画集》。1932年，他发起创建了“北平左翼美术家联盟”。解放前曾任北平市立女一中校长。

1943年1月初，一直参加革命活动的梁以俤等人曾在保定地下党交通站的秘密安排下，突破封锁线，来到晋察冀边区，参加了1月15日中共在河北省阜平县温塘村召开的晋察冀边区首届参议会，并且以“平、津敌占区代表”的身份，当选为参议员。

张璧的妹妹张秀岩、妹夫李铁夫、侄子张文松和张骐、侄女张洁清、张洁珣等当时都在京、津地区从事中共党的地下活动，也曾多次在北平家里召开各种形式的秘密会议，甚至利用张璧的“大义社”掩护过著名的“魏先生”（彭真）。这种情况，张璧是否知晓已经无关紧要，但是他从未加以干涉。正是由于张璧的

^① 见《霸州历史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名人卷》，河北霸州市政府出版物，2013年，第237页。



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新选出的行政领导人集体合影

名望和他与社会各界名流、政界及国军将领、青帮组织、日本军政高层等多方面的关系，才起到保护他的共产党妹妹、侄子、侄女们等人长期在平、津地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作用，这是客观事实。

十四 张璧和他的红色家庭

张璧家族中有许多革命者，本章主要介绍张璧的妹妹、早期中共党员张秀岩，和张璧大哥张律生的子女，即张璧的红色侄子、侄女们。

首先，要从张璧妹妹张秀岩开始说起。张秀岩在《我的回忆》中曾说：“毛主席在七大期间曾对我说：‘你改造了一个家庭。’这是我引以为很大的光荣。”

张秀岩生于1895年，原名张崢漪。参考张洁珣在《中央人民政府检查委员张秀岩》一文的介绍^①，大略如下：

1919年初，她考入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校就读期间，积极参与了“五四”运动，并担任京、津两地学生联合会的联络员。在和北洋军阀反动军警的冲突中，许多学生被捕，张秀岩日夜奔走在京津之间，奋不顾身地参加营救被捕学生的斗争。1922年，她毕业后来到了厦门女子师范学校当教师。1925年，任香山慈幼院教师。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得到李大钊的热情接待。他对张秀岩说：“我早就听隆真同志谈到你的情况，你

^① 见《霸州历史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名人卷》，河北霸州市政府出版物，2013年，101页。

的为人和献身革命的精神我们是了解的，党组织对你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后，现在决定吸收你入党。郭隆真同志介绍你入党，我很高兴，在女高师我的学生中加入共产党的你还是第一个，希望你入党后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党组织决定你担任香山慈幼院党支部书记。”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张秀岩在慈幼院的男女师范中发展了许多党、团员，建起了党、团支部，在教育阵地上播下了一批革命火种。张秀岩非常善于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虽然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但表面却像个守规矩的大家闺秀，获得学校创办人熊希龄的好感。在一次警方搜捕之前，张秀岩从熊希龄那里得到了消息，赶快通知党团员转移和销毁了文件，让所有不安全的同志都躲到香山的密林深处。结果，军警什么也没有查出来。

九·一八事变以后，张秀岩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的党团书记。后来北平的左翼文化运动进一步发展，北平“左联”、“社联”、“剧联”、“语联”、“教联”、“乐联”、“美联”等团体相继成立。1932年5月召开北平左翼文化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北平文化总联盟”。张秀岩担任该组织负责人。她为了扩大革命力量，开展左翼文艺、出版、绘画、戏剧等活动，组织了青年读书会，团结喜好文学和美术的青年作家、艺术家，出版进步文学刊物《地球》。在她的支持和影响下，办起了“星云堂”进步书店，传播进步书籍。这些活动对教育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从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壮大了党的力量。

这个时期，她不但教育社会上的青年，还教育自己的家属，她经常抽空给侄儿女们讲革命道理。最早追随张秀岩参加革命工作的是二姐张洁清，从1930年起她就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左翼

作家联盟”、“新兴剧社”、“师大生活社”等团体，从事抗日救亡的革命活动，演出进步话剧，组织读书会等。二哥杜文敏、三哥张文松和二姐张洁清一起夜里出去散发和寄送宣传抗日救国的传单、宣传品，贴标语或写标语，还经常帮助姑母用米汤抄写秘密文件。当时我只有10岁左右，也曾跟着哥哥姐姐们出去散发传单，他们写标语时，我给他们在胡同口放哨。当时我的主要作用是当姑母在白色恐怖下同地下党的同志们接头联系时，带着我作掩护，有时到别人家里去，有时到某某会馆、公园或图书馆里，带着小孩就不容易引起敌人注意。就连比姑母大20岁的我的母亲，也时常帮助照顾来到家里的同志，并且为秘密接头的同志们望风放哨。在大搜捕的日子里，我们大家一起悄悄地在夜里挖开后院的土地，帮助她埋藏文件和书刊。

1934年，张秀岩被组织上调到天津工作，担任天津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党团书记。同年，他和李铁夫结婚。

李铁夫原名韩伟健，又名金元镐，是朝鲜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来到中国参加革命后，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和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是中共早期白区领导人之一。1937年赴延安开会时不幸染上伤寒去世。

1936年春，刘少奇到天津任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任命李铁夫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张秀岩为天津市委委员兼妇女运动工作部部长。

1937年底，党中央派张秀岩到西安，任陕西省常委兼妇女部长、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在陕西，张秀岩根据自己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成立了陕西省妇女慰劳会，利用该会组织了姊妹团、慰问团、宣传队、救护队、夜校、妇女识字班，创办了刊物



革命夫妇张秀岩和李铁夫

《西安妇女》。还在西安等地开展募捐支援前线，举办了三期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妇女干部，派往陕西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9年，她去延安向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汇报工作时，被留在中央组织部工作。

1946年，周恩来回到延安，组建了中央城市工作部并亲自兼任部长，张秀岩被任命为第四室主任，主管平、津、保各城市的工作。

北平解放前夕，张秀岩兼任中央派驻晋察冀城工部的代表，她与城工部部长刘仁并肩作战，不辞辛苦地指导平、津等大城市地下党的工作，为解放平津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8年末，党中央任命她为中共北平市委常委兼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书记。她出席了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1949年9月，她作为全国妇联的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



张秀岩（前排中）和邓颖超、蔡畅、帅孟奇等
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妇女界代表们

新中国成立后，张秀岩担任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委员、监察部部长助理、全国妇联常委、党组成员，是中共七大代表，第一、二届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文革”浩劫初期，张秀岩被投入了秦城监狱。1968年12月25日被迫害含冤惨死在狱中。1979年11月25日，党中央为张秀岩召开了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对她光荣革命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在张秀岩追悼会上，姚依林副总理致追悼词（前排左）。

（右起）宋任穷、彭真、邓颖超、康克清、薄一波

张洁琪，张璧的大侄女。^①

青年时代接受革命思想影响，追求光明、追求进步，在姑母张秀岩影响下，参加秘密革命活动。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做收听、复写、散发新华社广播，掩护地下党、转接地下交通员等工作。1946年经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党派她到北京司法部街小学、北京顺城街小学任校长兼支部书记。1960年，她在北京市人委筹办少年儿童读物编委会。

张洁琪的丈夫梁以侬也是中共地下党员，长期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曾发起创建了“北平左翼美术家联盟”，是当时北平地区

^① 见《纪念张秀岩李铁夫同志》，非正式出版物，2008年，第17页。

卓有成效的著名青年画家，1943年他参加了中共晋察冀边区首届参议会，当选为参议员。



张洁琪

张洁清，张璧的二侄女。参考樊文稷、牛占敏在《女革命家张洁清》一文中的介绍^①，大略如下：

1920年，张洁清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小读书，后在北师大附中上中学。1930年考取了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在姑母张秀岩的影响下，张洁清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1930年，张秀岩指导张洁清在北师大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读书会”和“新兴剧社”，宣传党的主张，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1年，张洁清开始做党的秘密交通工作，为姑姑张秀岩联络各

^① 见《霸州历史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名人卷》，河北霸州市政府出版物，2013年，第120页。

大学的地下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传送党的指示。1932年，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京分盟。

1934年的一天，张洁清正组织北师大生活社的同学开会，宪兵三团突然闯进屋内把张洁清逮捕了。当时，张洁清并未加入党组织，但国民党特务并不知谁是共产党，只是凭张洁清在北师大的活动判断，张洁清不但是共产党，而且是北师大党的负责人，因此把她作为“共党要犯”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关押审讯。与张洁清关押在一起的有帅孟奇、夏之栩、何宝珍等老资格的共产党妇女领袖。由于张洁清年龄最小，被这些女革命家称为“幺妹”。在南京宪兵监狱经几次审讯，张洁清始终说自己就是普通学生，组织读书会、生活社是学生的正常活动，没有暴露一点与党组织的联系，也没有交代任何一个她联系过的共产党员。经过其家属通过关系积极营救，一个多月后被释放出狱。

1935年，张洁清在北师大英语专业毕业，在天津培才小学、天津扶轮小学教英语。时常往来于天津、北京之间，传送党的秘密刊物《火线》及党的指示、文件，掩护、接送往来于天津、北京之间的共产党领导干部。

1936年，张洁清在张秀岩、李铁夫、姚依林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2月，张洁清根据党的指示，转移到平西抗日革命根据地。1939年5月，张洁清被调到中共晋察冀分局即中共北方分局党校学习。1939年11月24日张洁清和彭真在根据地结婚，并出任彭真的秘书。1943年8月，张洁清调到延安，任彭真同志的机要秘书。1946年调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任彭真同志的秘书。

新中国成立后，张洁清任彭真的政治秘书。1956年，任彭真办公室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开始，彭真同志最先受到冲击，张洁清也被剥夺了自由，受到无数次“批斗”。夫妇二人分别被非法关秦城监狱达八年之久。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9年，张洁清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顾问，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洁清的丈夫彭真，“文革”前任北京市委书记，“文革”后曾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的革命事迹，已经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张洁清

张骐，张璧的二侄子，又名杜文敏。参考陈志钧张冀霞在《杜文敏革命生涯》一文中的介绍^①，大略如下：

^① 见《霸州历史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名人卷》，河北霸州市政府出版物，2013年，第134页。

1931年，小学毕业后考进了北京师大附中。1934年底，在附中加入了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1936年2月1日，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二九”运动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杜文敏把共青团员社联成员和爱国学生组织起来，在滴水成冰的深夜写标语、刻蜡版印刷传单。12月9日上午他带领同学们巧妙地躲过军警的阻拦，汇集到新华门前请愿，要求国民政府一致抗日。“一二九”游行之后，杜文敏被同学们推举为师大附中学生自治会主席。

193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8月上旬，他身藏党组织介绍信绕道济南，顺陇海路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又从西安出发，徒步走到延安宝塔山下。10月，他在延安陕北公学任陕公民先党团书记。

1938年2月，他跟随彭真同志奔赴抗日第一线，创建晋察冀抗日敌后根据地。当年任晋察冀机关所在地阜平县委书记，二分区地委组织部长，那时杜文敏才18岁。

1940年日本调集110师团五万余人，步骑、炮队、空军和机械化部队配合，分兵二十五路向我边区根据地大举进攻。杜文敏协助刘仁保护根据地领导机关及家属转移躲避日军的追击。日军穷追不舍，一条大河挡住了退路。那时是秋冬交接之季，水凉、水深流急。数百人被日军压缩在一个狭小地带，掩护部队几乎和日军接上火。当时，晋察冀领导人的夫人、孩子都在其中。为了保护这些人，刘仁、杜文敏亲自背他们过河，等日军赶到河边时，我方全部人员都爬上了山，翻过了山梁安全逃出了包围圈。

1945年8月15日，受聂荣臻指示，晋察冀中央局代理书记程子华命令张骐到北平办理接管日军受降事。而后，他作为共产党代表参加了北平军调部工作。

1946年赴东北，先后任长春市市委常委、民运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之后，调鞍钢任鞍山钢铁公司秘书长。原子弹项目上马时，调入二机部工作。文化大革命受迫害，被非法关押秦城监狱八年。“文革”结束后，他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当选为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骐（杜文敏）

张骐，张璧的三侄子。又名张文松，曾用名张骐、李析哲。参考张岱霞在《教育部原副部长张文松》一文中的介绍^①，大略如下：

1935年，他在北平师大附中读书，加入左翼作家联盟组织。

^① 见《霸州历史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名人卷》，河北霸州市政府出版物，2013年，第144页。

作为左翼文学青年，担任交通、从事油印和分送文件、传单等工作，也写文章在左翼报刊发表。同年，他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在北平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唤起民众团结抗日。1938年，经姚依林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文松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奔赴抗日根据地。他先后担任冀南区党委宣传部干事、垂阳县委书记、冀南区四地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在严酷的对敌斗争中，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动员广大群众参军参战，率领群众英勇地与日伪反动派展开反扫荡斗争。

1939年初，在随冀南区党委南下行动过程中，张文松等几位同志被派回冀南中心区视察，途经曲周县桃园村时，被土匪绑架，土匪挖好了坑要活埋他们，土都埋到了胸口，情况万分危急，幸得当地部队及时营救和百姓全力相助，方得脱险。

1940年，张文松与一起从北平去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同学黄甘英结婚。他们的头生儿子出生在行军路上的一个小村庄，正赶上日寇扫荡，村子里火光冲天，处境危急，孩子一生下来就立即抱给当地老乡家，没有多久，这个孩子就夭折了。

1943年，中共北方局党组织派遣张文松和黄甘英回北平做党的秘密工作，主要任务是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张文松同志担任中共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北平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在白色恐怖的艰苦环境中，他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牺牲的危险，参与组织领导学生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北京市委政研室副主任、主任，市委

教育局局长、市委常委。文化大革命时受迫害，与夫人黄甘英分别被非法关押秦城监狱八年。1979年4月，他任中科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1981年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张骁（张文松）

张洁珣，张璧的三侄女。参考郝平在《全国妇联原书记处书记张洁珣》一文中介绍^①，大略如下：

1934年9月，张洁珣以师大附小第三名的成绩，被保送上北京师大附中。和她同班的同学有黄甘英、王光美、叶群、李菊苹等人。1935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爆发了北平学生抗日救国的“一二·九”运动。张洁珣当时还不

^① 见《霸州历史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名人卷》，河北霸州市政府出版物，2013年，第151页。

到14岁，她的哥哥张骐（杜文敏）、张骁（张文松）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大游行。1936年2月张洁珣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师大附中抗日救国联合会。张洁珣帮助印刷、散发抗日传单，到街头教唱救亡歌曲并讲演。1938年7月，经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同志批准，16岁的张洁珣成为中共党员。1939年2月张洁珣和黄甘英等一批干部被党组织派往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晋冀豫区党委党校学习。1939年8月回到冀南，在南宫县妇女救国会二区分会工作。由于完成任务出色，张洁珣很快被调到县委工作，任县妇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时年18岁。她领导区委对敌斗争，曾组织戚家庄支部的党员、民兵，配合八路军正规军，伪装修炮楼的工人，一举消灭8个日本鬼子和一部分伪军，摧毁了炮楼。南宫县的工作环境非常艰险，随时可能遇到不幸，与张洁珣同时在县委工作的组织部长与敌人遭遇牺牲了；县委敌工部长被捕了；县政府公安局长、县游击大队长也在战斗中被俘了。被捕、牺牲是家常便饭。

1942年9月，冀南区党委宣传部长贾庭修不幸被捕。冀南区党委决定派张洁珣和黄甘英回北京，找她的二叔张璧，设法营救贾庭修。在张璧帮助下，当地党组织设法营救，终于使贾庭修被取保释放。当时张洁珣住在家里，父亲（张律生）和二叔（张璧）及三叔明明知道她是代表共产党回来的，但当她完成任务要回冀南抗日根据地时，他们没有阻拦，还给予资助，充分表明了他们的政治态度。

1943年底，党组织决定让她和张文松（三哥）、黄甘英（三嫂）回北京做地下工作，为抗战胜利到来作准备。张洁珣在地下做过上层统战工作，也做过领导大、中学生党支部的工作，曾任北京地下学委分区委员会委员。她做地下工作经历了很多风险，



张洁珣



黄甘英和张洁珣

但都被她巧妙勇敢地躲过了。

1949年北平解放后，张洁珣被分配到北京市妇委，筹备成立北京市妇联。曾任组织联络部副部长等职。1961年5月，她调到全国妇联国际部任副部长。文化大革命时受迫害，被非法关押在机关牛棚达八年之久。“文革”后恢复工作，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等职。是第二至第八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洁珣的丈夫郝贻谋，也是一名党的地下工作者，抗战时期曾任燕京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

张洁璇，张璧的四侄女，又名杜璇。

抗战期间，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时就和妹妹张洁琳一起参加革命文艺宣传工作，创办北平中学的“沙龙剧社”，参演了许多进步话剧，如《北京人》、《沉渊》、《日出》、《雷

雨》、《家》、《茶花女》等。^① 并参与主编了学校的革命刊物《海燕》。她在学生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在北大医学院二年级时奔赴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先后在华北联大政治班、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学习。1948年参加晋察冀边区中央局土改工作组。1948年10月在行军途中腿部严重烧伤致残。

全国解放后，她先后任重工部办公厅和二机部办公厅干部、技术处工程师、北京化工局科研处处长。“文革”中受迫害被关在机关牛棚。1978年任北京市化工研究院院长，1982年任北京粘接学会理事长。

张洁璇的丈夫陈厚钧（冷林），也是北平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是刘仁领导下的北平城工部成员，学生革命刊物《海燕》的主要创建人。



张洁璇（杜璇）和张洁琳

^① 见张潜生的《沙龙剧社琐记》，《笑忆青春》，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第90页。

张洁琳，张璧的六侄女。

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期间，与四姐张洁璇都是“沙龙剧社”的主要成员，积极参演进步话剧。尤其在《雷雨》中饰繁漪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在1945年3月，演出《沉渊》时受寒住院，查出患肺结核，于同年5月不幸去世，年仅18岁。北平学生办的《沙龙半月刊》特别印出纪念张洁琳的专刊。^①在纪念专刊上，有蓝天野同学精心制作的木刻版画张洁琳遗像，也有苏民等同学深情哀悼的诗文：

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你，没有一个人不期待你，然而……

你有清洁的诞生，你
又清洁地死去。值得骄傲
呢！你不曾染上一点混世
的污浊和尘垢。

……

张騷，张璧的四侄子，又名杜汶淦。^②

毕业于北京“四存中学”。
1945年15岁时就参加了中共北平城工部的革命工作。后赴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大政治学院、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学习，



张騷（杜汶淦）

① 见张潜生的《沙龙剧社琐记》，《笑忆青春》，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第97页。

② 见《纪念张秀岩李铁夫同志》，非正式出版物，2008年，第19页。



张洁琳（中）在《雷雨》话剧中饰繁漪

并在华北解放区兵工局研究所工作。1949年任太原市军管会接管员，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后，先后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学员、系党总支副书记和军工科研部负责人、国防科委第七研究院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第15研究所情报室主任。“文革”中受迫害，之后调清华大学任机械系市委常委、清华大学财务处处长等职。

张洁玲，张璧的七侄女，又名杜玲。^①

1945年，仅14岁的她奔赴晋察冀解放区参加革命。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她被派去苏联基辅工学院学习。后在清华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先后编著《激光全息照相》、《光学精密测量》等教材，发表多篇科学论文。她的科研成果“双波长全息术研究”、“陈列透镜全息术”获机械部科技进步三等奖、机械部教育司科技进步一等奖。

^① 见《纪念张秀岩李铁夫同志》，非正式出版物，2008年，第20页。



张洁玲（中）和苏联基辅工学院的中国同学们

张洁珉，张璧的八侄女。

少年时期即帮助中共地下党的兄弟们做秘密联络工作。1949年加入共青团，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参军在总参谋部某部工作，在部队期间曾多次立功受奖。“文革”中复员转业。“文革”后调北京科技情报所任国外情报室主任，并参加建立“大城市数据库”工作，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之后曾任中国儿童发展中心副主任，领导和实施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的项目。1994年被评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研究员。

张洁瑜，张璧的九侄女。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北京师大女附中。196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之后留校任年级主任。1965年借调到中央党校工作，任青训班辅导员。“文革”中被下放农场。1971年9月后在清华大学从事科研工作，之后从事党的干部组织工作。是中

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另外，张家还有一侄子武烈，又名张军。

他是张璧大嫂的妹妹之遗腹子，出生在霸州大高各庄张家。从小受姑母张秀岩革命思想影响，16岁就去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而后于延安抗大毕业，随即奔赴冀中的抗日前线。1940年担任八路军团队指挥员，身先士卒，英勇抗敌，在与日寇的激战中英勇牺牲，时年20岁。他的抗日英雄事迹记载在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中。他的母亲一直不知道唯一的儿子牺牲的事情。全国解放后，张家子侄们陆续回到家中，而这位坚强的母亲没有问她的儿子为什么没回来。从此，张家的子侄们负起了照顾这位烈士母亲的责任。

十五 罩在张璧头上查无实证的“汉奸嫌疑”

最早的《惩治汉奸条例》产生于1937年8月23日。而后在1938年8月25日公布了第一次修正案，增加了没收财产的规定。因此，惩治汉奸一直以军事间谍类的汉奸为主。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到北京，成立了“北平肃奸委员会”，开始督查北平惩治汉奸工作的进展。10月11日，按照国民政府惩治汉奸条例的要求，戴笠亲自主持将伪政权的首要分子和军事间谍100余名，当作大汉奸全部逮捕。

这当中，没有张璧。

11月23日，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处理汉奸案件条例》，共十一款。此次惩治汉奸的范围从军事间谍扩大化到在伪政权工作的公务员和机关首长。一时间，抓汉奸运动的扩大化浪潮波及全国。只要是曾经在日伪政权下工作过的人，不论是出于谋生还是被迫，一律定为汉奸。

12月3日，何应钦亲来到北京后，监督执行《处理汉奸案件条例》的执行问题。这时候，原属于张学良部下的某人，因为30年代在天津时和张璧发生过多次矛盾，结怨很深，于是越级向刚到北京国民政府的何应钦举报了张璧，举报信中说：张璧是伪北

平公用总局的局长，属于新发布的《处理汉奸案件条例》中任职伪机关首脑一款，应该立即抓捕。何应钦批准了这一举报。

12月5日，张璧被捕。

因此，当时公布的汉奸名单中就出现了“张璧”的名字和他早就辞职不干的“伪公用局长”一职。见如下：

鲍监清	伪北大校长	一月二十五日	三月七日起诉	1940
王文琳	伪武清县 ⁴ 长	一月二十九日	四月三十日起诉	
钱仲仁	伪固安县长	一月二十九日	四月十日起诉	
关震华	伪蒙政事务处长	一月二十九日	二月八日起诉	
张璧	伪公用局长	二月五日	二月二十日起诉	
孙世庆	伪教育局长	二月九日	四月十一日起诉	
刘承让	伪航政局长	二月十九日	四月十六日不起诉	
赵少候	伪新民会事务部长	二月二十日	三月十五日起诉	
于德五	伪济南统税局长	三月十八日	九月十二日起诉	
刘静山	伪宝坻县 ⁴ 长	三月十八日	十月三日起诉	

我们无意指责当时出现的大量夹杂个人恩怨的那些“汉奸举报”。借机诬告陷害的例子非常多，不但北平市，甚至连宋哲元的老家也出现了，见如下：

有一次肖司令的除奸组决定除掉一个被人诬告为汉奸的乐陵县知名人士。春元了解这个人，他在暗中多次帮助抗日爱国力量，……过去曾因商业利益问题，得罪过人，肖司令向春元通报这一决定，春元十分着急，火速派遣高庆海亲见肖司令，报告真实情况，肖司令果断的派人追回已经出发的

执行队伍。^①

张璧也是如此，他被仇家举报了。当天，和他一同被捕的还有在日伪政府内任现职的公务员七十余人。张璧是唯一一个不任现职、早已主动辞职的前伪机关首长。

从该汉奸名单中我们得知：河北高等法院、检察院 1946 年 2 月 5 日受理张璧案件，2 月 20 日起诉。该卷宗保存在河北省档案馆，卷宗编号是 634-72-128。^②

为此，我们需要详细地介绍一下当时的汉奸审判问题的由来。

国民政府的《惩治汉奸条例》修正案直到 1946 年 3 月 13 日才正式发布施行。该修正案的条例是对 1938、1945 两年条例的补充和修正。该条例规定了本法适用范围如下：

1. 通谋敌国，而有本法所列行为之一者，判死刑或无期徒刑；
2. 曾在伪组织机关团体服务，为有利于敌伪或不利于本国或人民之行为于一定年限内，不得为公职候选人或任用为公务员，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3. 明知为汉奸而藏匿不报或包庇纵容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① 见《抗日名将宋哲元家族史料研究》，1992 年，第 480 页，国内印刷本，印刷批准号：津东文图字（92）第 00074 号。

^② 我曾委托河北师范大学的张大军、谢宁师查找这一原始起诉书和判决书。但是，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相关审判证据。如此重大事件，为何没有起诉书和判决书保存？我不放心，不得不亲赴位于石家庄市的河北省档案馆。结果也是没有找到起诉书和判决书，只有上面那张汉奸名单。我又去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也是无果而归。

4. 犯前条之罪者没收其全部财产，但应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
5. 查封动产，但应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
6. 查封动产，得委托该管地方行政机关执行之；
7. 明知为汉奸将受没收或查封之财产而隐匿、收买、寄藏或冒名顶替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罚金。

请注意这里的第二款：

曾在伪组织机关团体服务，为有利于敌伪或不利于本国或人民之行为于一定年限内，不得为公职候选人或任用为公务员，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张璧虽然在1946年2月5日被河北省高等法院受理、2月20日被起诉，但是，再无下文。

为什么要在如此违反当时国民政府政策法规的情况下拘押张璧呢？原因如下：

按照1946年3月13日的《惩治汉奸条例》修正案，张璧曾经任过二年的“北平市公用总局局长”一职，顶多属于“曾在伪组织机关团体服务”，但是他不但没有“为有利于敌伪或不利于本国或人民之行为于一定年限内”，相反却干了很多保护抗日的国军将领和共产党人的事，顶多是“一定年限内，不得为公职候选人或任用为公务员，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已。关键是这一条并不是何应钦所希望出现的结果。何应钦抓张璧的目的是要一箭双雕：第一雕就是张秀岩所分析的那样，可能是因参加“北京军调部”的共产党代表中有其侄子，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愤

恨。因此，抓了张璧最好再治其重罪，就可以实现打击参加“北京军调部”的共产党代表的效果。第二雕就是替蒋介石除掉了一个曾经的反蒋积极分子，达到教训冯玉祥所属各部的目的。

拘捕了张璧后却找不到他的汉奸罪行，这就是为什么河北省高等法院接到何应钦抓捕张璧的指令后一直无法定罪和判决的原因。

关于国民党抓捕军调会代表及其家属的问题，还可以参见下面这条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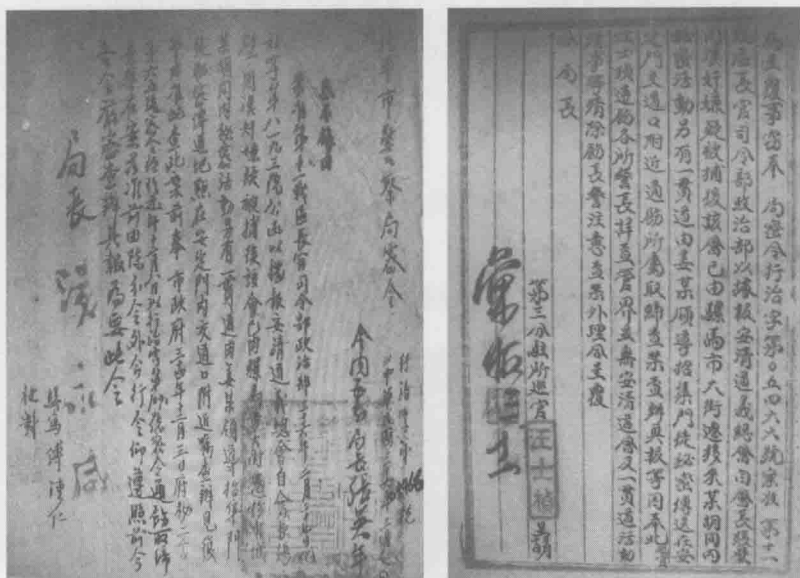
戴笠即紧急指示，1946年元旦北平军调处执行部要成立，要在该部未成立前秘密逮捕一批中共人员及革命人士，同时特别指示逮捕后送入监狱时，一律称为“重要汉奸”，以掩人耳目。^①

国民党当局为了制造轰动效果，1946年7月2日，何应钦特地指令将张璧和著名的大汉奸金璧辉同时由北京转移到保定的河北第一监狱等待审判，将两“璧”同车押送保定，意图达到以大汉奸金璧辉的罪行来衬托张璧的新闻效果。新闻效果虽然达到了，但是却无法按照给大汉奸金璧辉定罪的模式来给张璧定罪。因为张璧除了任过两年北平市公用管理总局局长之外，并无《惩治汉奸条例》修正案的“通谋敌国，而有本法所列行为之一者，判死刑或无期徒刑”之罪。

就连解放后被人反复提起的“天津事件”，也没有再被当时的法官或者新闻记者们提起。难道是国民政府和新闻界当时就已经知道张璧和“天津事件”无关？

^① 《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28页。

1947年1月1日，决定张璧的新罪名才正式出现，见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第05466号密令》原始档案，该档案照片如下：



密令全文如下：

北平市警察局密令
行治字第 05466 号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七日

案准第十一战区区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化社字第 8193 号公函以据报：安清道义总会自会长张璧因汉奸嫌疑被捕后，该会已由骡马市大街迁移东城某胡同内秘密活动。

嘱查办见复等由，准此查。此案前奉市政府三十四年十

二月三日府秘二字第 65 号密令，经于是年十二月八日以行治字第 1090 号密令通飭取缔查禁在案。兹准前由。除分令外合行令仰遵照前令各令，严密查办其报为要。此令。

局长 汤永咸

这次的罪名仍是“张璧因汉奸嫌疑被捕”，但是，此公函不再提“伪公用总局局长”了，改为“安清道义总会会长张璧”，这次的罪名看来似乎是无法逃脱的了。

华北安清道义总会北京特别市分会登记册				
职别姓名	年龄	籍贯	职务	籍贯
会长 张璧	六〇	河北霸县	会长	王秀峰
副会长 王秀峰	五六	河北通县	副会长	张逸塵
理事 张逸塵	五一	河北宛平	理事	劉沛然
副理事 劉沛然	四〇	河北天津	副理事	

华北安清道义总会北京分会登记册

1943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电令张璧为华北军事特派员。两天后，即11月11日，冀察战区总司令蒋鼎文又下达“字第6444号令”，委任张璧为平汉路北段军事特派员。张璧的两个国民政府委任的秘密职务，一切工作将以策反日伪汉奸、支持国民政府和中国军队为核心。两次委任指令传达人均均为军统北平站站长张世五。为此，1944年1月1日，年已60岁的张璧决定接手“华北安清道义总会”的管理权，进行策反的抗日工作。于是，由于他的辈分和名望被推举为“华北安清道义总会北京分会会长”。此事请见第五章《随冯玉祥反蒋失败后的青帮老大》中张璧向国民政府书写的呈文。

让我们看看另一位任过“华北安青道义会”总会长的魏大可。他于1938任此职后，成为“青帮”在华北的领袖，收日本军官14人为徒，收日特务机关要员首野为义子。1941年，他为日军筹办“华北铁路保卫部”，被委任为总办（部长）。这样一个人并没有被国民党认定为汉奸。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去上海与黄金荣、杜月笙、马汉三等筹建了“新中国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任会长，国民党要员戴笠还招待了他。1949年全国解放后，他因为辱骂领袖罪（而非汉奸罪），被河北人民法院判刑5年，1956年上半年保释出狱，1959年春天病故。

既然如此，以张璧参与筹建了“华北安清道义总会北京分会”、出任该分会会长的理由，显然是无法对其定罪的。而且，国民政府军委会电令张璧为华北军事特派员，冀察战区总司令蒋鼎文下达“字第6444号令”，委任张璧为平汉路北段军事特派员的事实，证明了所谓的“安清道义总会会长张璧因汉奸嫌疑被捕”的宣传效果和法律结果之间的完全不一致。

因此，“安清道义总会会长张璧因汉奸嫌疑被捕”之说，仅

仅是“嫌疑”而已，却无法完成审判和定罪的法律程序，因为国民政府无法否认和解释委任张璧为军事特派员、进行策反日伪工作的事实，反而证明了国民党的过河拆桥。如果不是张璧接受了国民政府给他的这两个秘密委任，以他在青帮的资历、资格、知名度和能力，晚年的张璧为何要出任一个“北京分会”的会长这么个“小头头”来自辱？换句话说，罩在张璧头上的“汉奸嫌疑”至死无法确定。

十六 张璧之死及盛大的治丧活动

1948年2月29日，阴历正月二十傍晚，张璧猝死在北平的第一监狱。张秀岩在《我的回忆》中说：“由于在民族灾难中，中国社会各阶级关系的错综复杂，后来我们曾在党的指示下，几次做张璧的工作并且得到他的掩护。抗战胜利后他死在蒋介石的监狱中。”由此可见，猝死在监狱是定说。

阴历正月二十二日，张璧的亲属、各界朋友及北京社会名流两千多人前去吊唁。^①

当时，还是19岁的学生白洪瑛代父亲白静明去送挽联。他在“我的记忆”中写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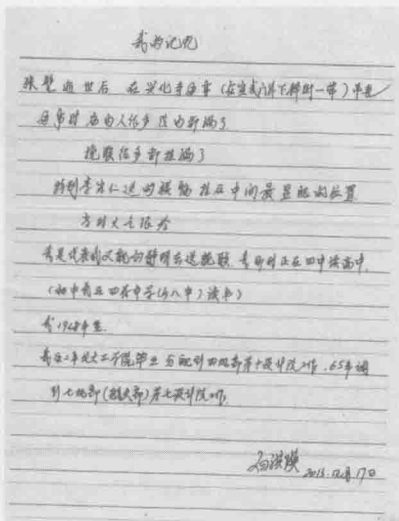
张璧逝世后，在宣武门外下斜街的一寺庙吊丧。办事时，庙内人很多，院内都满了。

挽联很多，也都挂满了。特别是李宗仁送的横幅挂在中间最显眼的位置。当时天气很冷。

我是代表我父亲白静明去送挽联，我那时正在北京四中读高中……

^① 这或许就是后来网络传说张璧死于1月22日的误传原因。

白洪瑛学生时的相片和证词，见下：



当我采访白洪瑛老人时，他说：“当时李宗仁亲自书写了四个字的挽联，由于年代久远，至今已经忘记了这四个字的具体内容。但对李宗仁送挽联的事情记忆深刻，因那时李宗仁在国民党政府中名声很大。”

我没有找到档案相关的记载，但至少，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在此提出来。也请亲身出席了那次吊唁的人，一起回忆和复原历史的真实。

吊唁连续了三天。然后，张璧的灵柩厝放在寺庙中（当时讲究这种做法），直至5月份出殡下葬。

档案记载在5月23日举行了送葬仪式和追悼会。当时由四存学会理事、四存中学校长张荫梧任主任，专门设立了治丧处。并发布公告如下：

兹订于五月二十三日下午新三时，假北平宣外老墙根广惠寺举行追悼会，敬希惠临，如赐唁，请迳交宣外骡马市大街一三七号治丧处可也。

当时特别印制了一个专门纪念册《张玉衡先生治丧处》，收录了治丧处公告、治丧处成员名单、悼词等。由于该纪念册没有当天追悼活动的任何报道，由此证明了这一纪念册发行在前、追悼会举行在后这一事实。

该治丧处至少曾举办过一次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并且专门发了会议通知：

敬启者

兹定于五月十六日（即星期日程表下午三时在骡马市大街一三七号开全体筹备委员会议，并有主席团代表张荫梧先生共商丧务事宜。务祈准时出席，以便讨论一切重要事项。再关于发帖事，作请将台端之至友以及同道之通讯地点，就便拟单交来，以资照发。此次会议关系重要至希拨见与会为盼。

此致 先生

张玉衡先生治丧处五月

该治丧处全体委员共 120 人，全部名单见原始档案照片：

張執中	李英奇	李肅侯	姜殿若	顧凌嵐	張遜之	王慕沂	向海潛	馮秋圃	靳雲鵬	張樹聲	魏大可	張蔭梧	上官雲相	宮梅峰	馬耀三	陳仙洲	王鳳崗	魏春圃	晏維周
王金標	郝濯	閻筱亭	魏子文	沈公俠	章夔一	李子材	張伯陶	宋華卿	張世五	羅流持	楊賓樓	杜茂森	白怡亭	韓潔遠	張長清	尙縉珊	錢愚如	魯欽承	李子普
郭稼軒	劉昂華	王占魁	韓恩興	劉鳳歧	李兆坤	劉翰文	王敬文	李水利	郝卓然	趙守勛	程瀛洲	王蓮才	董漢三	趙世欽	張紹曾	吳清源	李苑臣	薛蔭棠	祁文明
于伯濤	武英釐	王子強	宋光烈	王虎臣	白瑾	郭治堂	譚子岩	孫鴻亮	于少蘭	中芝塘	王振亭	尤靜軒	許耀宗	畢峻峯	白文光	金子周	張席珍	李品一	郭存今
董操斌	王秀峰	張鴻慶	魏紀林	劉紹臣	馬誠良	姚宗勳	牛海祥	王鈞華	王曉周	耿仙洲	楊慶堂	金符衡	馮純齋	張蒼恬	李有光	金仁甫	劉春江	傅席民	王宇澄

仔细分析这些人员构成和他们各自的背景，可以加深我们对张璧的了解。上述 120 人，大致由以下几类人员构成：

第一类是张璧在军中和警署的老友。如靳云鹏、张席珍、宫梅峰、上官云相、张荫梧、董汉三、王虎臣、程瀛洲、宋光烈、沈公侠。其中，王虎臣和张璧同为冯玉祥的部下。张席珍是张璧在陆军学堂时代洋文班的同学，曾获陆军中将军衔。宫梅峰曾是张宗昌的部下，任 64 师师长。上官云相是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张荫梧曾在二三十年代任北平市长，曾提出所谓的曲线救国论。后来出任四存学会理事、四存中学校长。

第二类是张璧在青帮和洪帮的老友。如魏大可、宋华卿、魏子文、王慕沂、向海潜、章夔一。其中，魏大可和他同为青帮“大”字辈弟子。宋华卿早在 1933 年就被北平市警察局通缉。

辛亥革命的元老和抗日英雄向海潜，当时为洪帮的大佬。章夔一则是北平市洪帮的大佬。龚春圃也是洪帮大佬，曾任陆军少将。

第三类是张璧在武术界的老友。如李尧臣、姚宗勋、诸子炎、马骥良。其中，李尧臣当时是北平武术界泰斗，他曾经当过慈禧太后的保镖。而姚、诸、马三人皆王芃斋的弟子，当时王芃斋正在青岛赶不回来，特地电话指派自己的三名弟子到场。“诸子炎”的名字，一直被武术界错传成“周子炎”。

第四类是张璧的家属。如侄女婿梁以俅、义子刘绍臣等人。纪念册中误将“梁以俅”的名字印成“梁以侃”。

第五类是张璧在北平、天津的好友和文化界人士。如王宇澄、郭存今、尚绶珊、韩洁远、金符衡、赵守勋、申芝堂、李英奇、阎筱亭。其中，王宇澄就是当时著名的《实报》记者，多次报道大成拳，笔名为“羨鱼”。韩洁远为京城名票、单弦大师。赵守勋、申芝堂为京城名医。李英奇是陆军中将和新疆警察厅厅长。阎筱亭则是平、津著名的建筑师。

第六类是张璧的一些熟人。如王凤岗、马耀三、耿仙洲、杨宾楼。其中王凤岗是河北省新城县人，当地的土豪，参加过八路军，后投日，1948年又任傅作义部第二清剿区司令。马耀三曾当过新城县长和北平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耿仙洲是著名的抗日将领吕正操部队中的游击战术专家。杨宾楼本是张荫梧手下干将，曾组织过“华北民众自救会”。

第七类是张璧在国民党军统人员中的特殊熟人。如陈仙洲、张世五。陈仙洲曾是国民党军统局天津站站长，张世五则是国民党军统局北平站站长。他们二人和张璧交往密切，显然是张璧帮助他们开展过获取日伪情报的工作。

其实，张璧还经常和国民党高级将领保持着密切来往。据国

国民党军统中将文强《文强口述历史》一书的陈述：

我未见孙殿英之前，戴笠就向我说起过孙殿英。戴笠在执行蒋介石“搞垮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的密令时，同刘健群一道去天津租界与孙殿英见面，发现孙殿英所关心的事，不是抗日不抗日，而是找靠山。回到北平后，戴笠撇开刘健群，另作去天津见孙的准备。戴笠说：他找张学良将军写了一封亲笔介绍信，又找到孙殿英的好朋友，北方著名的政客张璧（张玉衡）和洪帮头子张树声，陪同他一起到天津。戴笠在英租界利顺德饭店住下，摆出很大的派头，请孙殿英在饭店见面。孙殿英知道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一见面倒头便拜，连连说：“上次相见，有眼不识泰山，实在罪过，我们同在江湖上闯荡，只要蒋委员长用得着我，我愿一辈子做马前卒，要我割下头来，保证不割下耳朵，今日难得见面，送两颗红宝石作纪念吧，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珠。”戴笠当时收下，回南京后交给了蒋介石。^①

文强称张璧为“北方著名的政客”，显示出国民党上层人员对张璧的看法，虽然这里没有说明是哪一年的事情。但是笔者根据1938年夏孙殿英在武汉经戴笠引荐见到了蒋介石，则可以推定此事下限当在1938年夏。而上限则是宋哲元邀请孙殿英到北平任察北保安司令的1936年2月。此外，这一阶段正是张璧在北京居住和活动时期。

由上文中可以发现，张璧和孙殿英、戴笠二人的交往，以及

^① 《文强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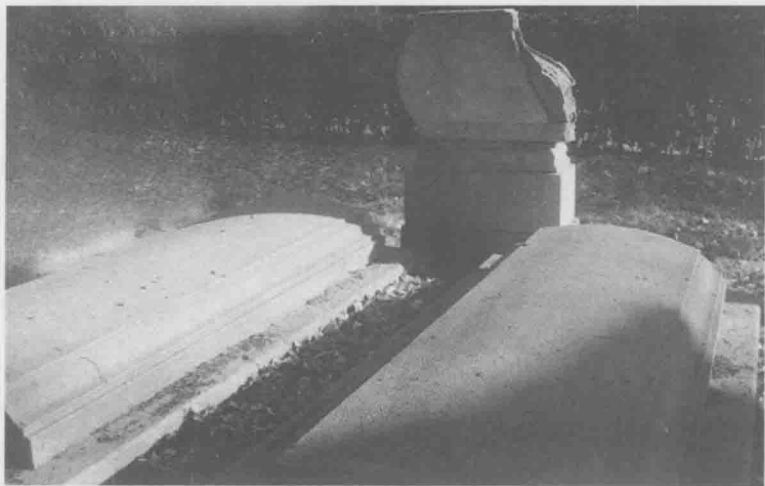
当时张璧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国民政府多名在职军政高官和军统局京、津两大工作站站长陈仙洲和张世五同时出席张璧的治丧处委员，既是肯定了张璧协助军统从事策反和从事抗日工作及就任军事特派员这一经历的真实存在，也是对“汉奸嫌疑”的否定和平反。

治丧处会议通知中的“讨论一切重要事项”，应该是讨论追悼会悼词和碑文二者。按当时的习惯，社会名人基本上全安葬在万安公墓。

张璧的墓地保存在北京万安公墓“火区癸组”，距离他的好友王芑斋（1963年故）的墓地“水区称组”不过百米。张璧的墓室保存完整，但是墓碑被砸断成两段，现在仅存上半段，并且被横着放置。





残景如此，长歌当哭！写到这里，笔者禁不住当场写下了抒情短诗《访张璧墓地有感》：

静静地
你躺在那里
默默无闻地
一直是那么的
不声
不响

你带走了昨日的辉煌
任世人对着你的坟墓
痛贬
骂娘

今天我来了
带着史海的沧桑
拂走罩在你头上的
尘土和寒霜
复原历史上你那真实的功过是非模样

静静地
你躺在那里
那残缺的墓碑仿佛正述说着
你曾遭受的冰冷和凄凉
是真实的历史
怎会惧怕
正午的阳光

原谅我惊扰了你那
已经沉睡了六十六年的
梦乡

据笔者2014年1月18日一整天的实地考察，张璧墓地尺寸数据如下：

根据阳面“顯妣劉氏夫人孝女”一行从碑文上部到“女”字的总长度为64厘米来推算，则该碑文总长度应该为92-100厘米之间。再根据碑文面宽度为46厘米，按照刻碑习惯，则该碑文长度当为92厘米。即长度和宽度是二比一的碑铭标准比例。估算该碑共12行，每行39字。全部碑文当在400字左右。第七行开头字为“亥”，后言其“無疾而逝”，则“亥”字前显然当系

张璧死亡日期的阴历，故可补写为“民国戊子正月乙”，并加前后方括号以表示根据内容补加。

关于他的卒年，目前有三说并存：网络上多有人主张死于1946年1月22日。而在大成拳界，一直还流传着1949年1月他在国民党监狱中因闻听蒋介石败北而大笑引起心肌梗塞猝死的传闻。如杨鸿晨在《并非装聋作哑——再次〈问疑大成拳〉之试答》一文中说：“张璧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1949年1月因大笑引起心梗猝死于北平（现健在的浙江杭州窦以鸾为证）。”^① 根据《玉衡张璧先生之墓》碑文记载，他卒于“民国戊子二月廿九日”，这个时间肯定是阳历，即1948年2月29日，阴历为一月二十日。

生于晚清而死于民国的人，经常在墓碑上以阴历记载出生而以阳历记载死亡日期。

该碑总体尺寸是：

额高12厘米，天头高46厘米，碑铭高92厘米，基座高分上下两层，底层高30厘米，上层高16厘米。则该墓碑总高度为196厘米。地上墓盖总长度216厘米，宽度90厘米。边池宽度118厘米，长度245厘米。

孝男、孝女的名字已经残缺。其“孝女”，根据该基地的档案文献，立墓人为“张静琇”。张静琇应该就是刘鸿英弟弟的女儿刘静琇，过继给张璧夫妇，改名张静琇。而这里的“孝男”，由于碑文下面已经残缺，《张氏家谱》中并无任何记载——该谱

^① 杨鸿尘文章首先在网络上发表，至今不详发表于何刊。

1930—1948 年间并未修订，因此不可能准确反映实际情况。根据万安公墓的保存规定，墓碑一旦批准树立，公墓管理处的档案室将保存全部碑文内容和该墓地所有权归属人。我们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得到万安公墓档案室的支持，恢复张璧墓碑全部内容。



墓碑阳面上“显”和“孝男女”文字

张璧墓碑阳面铭文为：

中華民國 [卅七年□月□日立]

顯 考張府 [君璧] [之墓]
妣劉氏夫人

孝 男 [張 xx]
女 [張靜琇]



霸县张先生，讳璧，字玉衡。为人慷慨，尚侠义，喜交游，周急济贫，毫无吝嗇。尝有友人病卒，无以为殓，先生独力承任一切棺葬费用，不募他人分文。又为友人排解纷事，委屈陈说，泪随声下，双方感动，意见冰释。生平类此事迹，不胜枚举。居，恒座上客常满，解衣推食，欢如骨肉。盖皆慕先生之道义。向乐与接近者也。

先生最服膺颜、李实践之学，以为“学问以行事为本，离事物便无学问”。又以为“学问须有意于人生，必实践服务社会，方不负为人之意义”。故时常督励同人等，以全力用于民众。现在同人正努力于此，必期有所成就，以纪念先生。且以表现吾人之初志。

今兹日月犹新，云霄遽邈，同人等欲行无路、欲照无灯，不惟生死私交之痛。为此整集朋侪，坚定意志，一面继续完成先生生前未竟之业。俾无遗憾之。留一面更徵求同人所记忆先生生前之一事一言，看作专刊之集，聊述梗概敬祈。

鉴察嗣后，源源归纳，使先生之人格，千古不磨；先生之志，愿克尝全量同人等，实与有荣焉。

十七 张璧研究启示录

2014年新年前后，当我和学术界朋友们一起聚会、辞旧迎新之时，朋友们关切地询问我“眼下正在写什么大著”？我说：“正夜以继日地研究和撰写《民国名人张璧评传》。”他们听完后吃惊地说我“一定是疯了”。在他们的印象中，“张璧就是个汉奸，除此之外，对他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更多”。我一笑而已，不作任何解释。因为打破成见、纠正错误的观点，需要的不是再三再四的解释和说明，而是基于扎实可靠的史料考证和准确无误的档案解读，然后提出不为利益大小和舆论褒贬所左右的新说。

作为历史学家，本来我的研究领域一直局限在以西周青铜器铭文为中心的商周史研究。在这个领域我可以自豪地告诉大家，我已经出版了十几部学术专著、发表了150多篇学术研究论文。

商周史研究之外，就是众所周知的我的海外汉学史研究。我曾出版了四部汉学史研究著作，那只是我多年留学海外的一个附属产品而已。虽然略得同道赞许，但我并不认为我已经是汉学家了。最近以来一直忙于修订五卷本《汉学通史》的定稿，以此作为我的“海外汉学史研究票友生涯”的终结。说实话，最初我没有计划撰写此书。

——并非我不喜欢民国史的研究。

至少目前为止，我已经出版了《闲话陈寅恪》和《陈寅恪史事索隐》两部还算满意的民国学术史和人物传记的研究著作，但我以为我的“民国史研究的票友生涯”该到此为止了。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我认识了张璧的一位后人。于是，我们就张璧和大成拳的关系，展开了认真的谈话。这次意外的聚会激发了我撰写张璧研究传记的强烈想法。

我因为不足月出生，所以少年时代患软骨病、抽疯和长期腹泻，致使体弱多病的我3岁以前因为随时处于死亡的边缘，连个照片也没有。小学体育课几乎是免修的。从上小学四年级开始，我拜访多位名师，学习意拳（又名“大成拳”）和陈氏太极拳。每天锻炼，坚持不懈。长期的锻炼，使我体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从高中毕业后的1981年至今，三十多年来，我没有生过病、住过院，连感冒发烧也很少出现。意拳和陈氏太极拳的练习，培养了我坚韧的意志和强壮的体魄。

而意拳正是在张璧的发掘和支持下成长壮大起来的！我在《武魂》上的长篇连载论文《意拳史上若干重大疑难史事考》中，明确阐述了张璧对意拳的巨大贡献。张璧后人曾通读了这篇论文。那里面对张璧和意拳（又名“大成拳”）关系的研究，以及张璧在日伪政权下政治表现的客观研究，打破了国内学术界的一些定论。我实在没有想到我的那篇论文居然会引起张璧后人的如此关注。于是，我觉得撰写国内外第一部研究张璧的传记，责无旁贷。这便是此书产生的缘由。

但是，张璧的资料实在太少又太难找了，君不见著名的多卷本《民国人物传》一书，收录了上千名民国名人的传记，比他地位、影响、贡献等差很多的人全被收入其中，但是张璧传记却无人承担。因为长期以来，学术界只知道他两点，即赶溥仪出宫和

天津事件而已。我在撰写本书过程中，甚至觉得有关他的资料居然比几千年前的商周天子和大臣们的史料还要少！我不得不翻遍各种民国史料、档案和电报，沙里寻金、海里捞针苦苦求索。

史料既然如此之少，国内学术界对于张璧的认识出现误解也就在所难免了。让我们以百度为例，加以分析说明。

我在百度搜索“张璧”，得到的结果是：

张璧这厮文武双全，早年就读保定士官学校，蒋百里的弟子。后来张璧追随孙中山，参加了辛亥革命及其后的讨袁护国战争，官拜“北方招讨使”。招讨使这个官衔，始设于唐，是一级军事主官。宋将岳飞曾就任过河南招讨使。现在看来，招讨使相当于“先遣军司令”一职。由此可见，此张璧先生，早年在同盟会就不是一具小人物。基督将军冯玉祥入京后，张璧曾任北京警察总监，曾协同冯部鹿钟麟将军驱逐溥仪出宫。当汉奸的历史也早，早在一九三一年，他就在天津为日本人效力，是天津势力最大的汉奸。光复以后，张璧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死在国民党政府的大牢中。

在百度上搜索“天津事件”，得到的结果是：

天津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天津制造的一连串挑衅事件。1931年11月8日，驻天津日军袭击市公安局、市政府及省政府，策动汉奸李际春、张璧组织游民千余人发动武装暴乱。天津市当局宣布戒严，拘捕61人。9日，驻天津日本领事借口1名日军排长被中国士兵打死，下令日军在闸口炮击市区。同日张学良通电南京向蒋中正报告

日军策划天津暴乱的经过。26日，日军又一次袭击省，市政府电话局等单位，提出中国军队撤出天津，绝对取缔抗日活动等无理要求。此一连串事件总称为“天津事变”。

再看看一些描写张璧在天津活动的网络文章：

1932年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将于学忠（1890~1964）所任的平津卫戍司令职务与王树常所任的河北省政府主席职务对调。在这个明令发表之前，天津地方的局势十分紧张。日本侵略者利用汉奸张璧、郝朋纠集地痞流氓四百余人，组织起便衣队。这伙民族败类借日租界为掩护，每天窜到街面上鸣枪恐吓、骚扰百姓。当时王树常为避免与日军引起冲突，不敢使用正式军队弹压；而当地警察和保安队力量微薄，不足以对抗这帮汉奸，更不能进入日本租界捕人，只能采取戒严的办法，消极防御。这又使得当地百姓谋生维艰，小商、小贩及三轮车夫行动受阻，严重影响生计。天津地方人士因此对王树常颇多指责。王树常对日外交软硬难施，应付困难，也很想卸职离去。于学忠上任后，马上撤消戒严令，准许市民自由行动，并将东北军113师李振唐所部唐晋尧、周福成两团，改穿保安队服装调进天津市内，加强警戒。他断定：日军兵力有限，并不敢与中方正面冲突；他们唆使捣乱的汉奸便衣队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中方只要下定决心，就可以把这伙社会渣滓彻底消灭。果然，日本人欺软怕硬。他们指使的汉奸便衣队探知中方的决心后，即销

声匿迹。^①

历史事实真的如此吗？我决定直接查找中日文原始档案文献，以验证真伪。

压在张璧头上的致命指控是两条：

第一条指控他是“天津事件”的主犯。

第二条是指控他“汉奸嫌疑”被抓。

两大罪状都直接指向了张璧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于是，我决定选择张璧和“天津事件”之间的关系作为我研究的突破点。

凭借着我在十几年在日留学所积累下来的学术素养和人脉关系，我拿到“天津事件”发生前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桑岛致日本外务省的全部电报这些珍贵的属于当时最高绝密级别的原始档案资料，从普通电报到最高规格的加密三级电报，多达 550 多封。接下来，在我每天十几个小时研读这些日文机密电报资料时，经常是累得我眼花缭乱、腰酸背疼几乎要呕吐了，但是“天津事件”的真相却逐渐在我脑海里成型了。我相信中、日、台三地的民国史学者们，为了一个张璧和“天津事件”，没有人这样下过如此大的原始资料审读和考证功夫。于是，就出现了本书的《张璧和“天津事件”关系考》这一章。

最核心的证据是：

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天津特别市市长张学铭二人联名给国民政府的密电。如下：

查事变发生以前，即迭据密报，失意军人李际春等人受

^① 见 <http://www.xiexingcun.com/Wenshizazhi/wszz2008/wszz20080524.html>

日人指使，招集便衣队千余名，在日租界蓬莱街太平里六号设立机关，以李为总指挥，拟于八、九两日在津密谋暴动，等情。经即与驻津日领交涉，要求将张璧引渡，以遏乱源，业经日领许可。乃我方特务会同日警前往拘捕时，该犯业已事先逃避。^①

这一点极其重要！即：

“天津事件”发生前，张璧得知他策划的“天津起义”已被泄露，张学良下令警察前来日租界抓捕他，在得到消息后已于事发前就离开了天津。

让我们再看看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桑岛总领事发给日本外务省的那封绝密文件“第553号密电”：

而モ張璧カ學銘ニ買收サルタル旨牒報アリシヲ以テ、七日序ヲ以テ、軍側ニ對シ、萬一斯ル計畫ニ關係アラハ速ニ緣ヲ切ルコト、得策ナルヲ述ヘタルニ拘ラス、軍ハ全然之ヲ否定シタルカ、内實ハ當時既ニ八日夜十時ヲ期シ、暴動實行ニ決定シ居リ拔キ差シナラサル、破目ニアリタルモノノ如ク、一方公安局ハ、張一派モ内通アリシヲ以テ、八日警戒ヲ嚴ニシタルト、保安隊カ預期ノ通呼應セサシトニテ、李ノ集メタル便衣隊ノ活動ニ拘ラス、暴動ハ完全ニ失敗ニ歸セリ。

这段日文的中文译文为：

^① 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第479页。

因为持有张璧已经被张学铭收买的密报，7日开始，对于日本天津驻屯军一方来说，万一发现他们和这一计划有关的话，就需要迅速地切断与此相关的一切联系。正如这一计划实现后所陈述的那样，军方断然否认与此相关。实际情况是当时8日夜10时为准，土肥原决定实施暴动。另一方面，张学铭一方由于在便衣队中有了内线，因此，8日全天天津使馆区警察的警戒状态是非常严格的。他们和保安队预定的防御计划相互呼应，限制了李际春召集的便衣队员们的暴动活动，致使这次暴动计划完全地归于失败了。

这封绝密的电报透露出这样最有价值的情报：

张璧在事件发生前私下里和张学铭取得联系，将土肥原贤二可能要发动“天津事件”这一消息，偷偷地密报给了张学铭。这才是8日白天天津警察局和保安队保持警戒状态的直接原因。

因此，目前为止有关“天津事件”的各类著作和论文中所谓张璧在现场指挥和带领2000多名便衣队发动暴动之说，在铁的证据面前已经失去了证据支撑。

网络如此，公开的出版物又如何呢？

如台湾著名近代史学者郭廷以在《中华民国史事日记》11.8条记载中说：

夜十一时土肥原策动天津汉奸暴徒张璧、李际春等千余人分三路自日租界袭攻河北省政府及公安局，日军开炮助之。^①

^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84年。

郭著代表了台湾学术界的基本观点。但我们由上述的密电可知，此说是不当的，违背了历史事实。因此，所谓张璧亲自参与了这一事件的观点，完全系主观的猜测。

写完这一章，我感到轻松了很多，我可以负责地说：张璧和11月8日晚上10点半以后实际发生的“天津事件”是无关的，因为从11月8日到28日“天津事件”发生期间，张璧不在现场。真正的“天津事件”主犯和指挥者是土肥原贤二和李际春。而张璧当时所策划的却是将张学良驱赶出天津的“天津起义”。

区分“天津起义”和“天津事件”的本质不同，是本书首倡的学术观点之一。

再看看上面那篇描写张璧在天津活动的文章，连基本史实都不对：成立便衣队是由土肥原贤二和李际春临时出资招集而来，成立不到七天就爆发了“天津事件”。28日以后便衣队或被抓或被杀，事变结束后，便衣队在天津被彻底取缔。何谈“日本侵略者利用汉奸张璧、郝朋纠集地痞流氓四百余人，组织起便衣队。这伙民族败类借日租界为掩护，每天窜到街面上鸣枪恐吓、骚扰百姓”？又何谈“果然，日本人欺软怕硬。他们指使的汉奸便衣队探知中方的决心后，即销声匿迹”？名人回忆历史，可以出现一些时间上和细节上的差错，但是必须严谨而且需要大致符合史实，绝对不可以戏说，更不可以附带个人恩怨地胡说。

1931年以前天津的两次便衣队骚乱，更与张璧无任何关系。不能因为他被国民政府定为“汉奸嫌疑”，就把一切都推到他的身上。

从上述的两封中、日密电中，均已证明张璧未曾参加11月8日晚爆发的“天津事件”，所以应该说张璧并不是“天津事件”

的当事人。

接下来，我开始查找国民政府的汉奸审判档案。从北京档案馆到天津档案馆，再到河北省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很遗憾的是，这些查找活动基本上是徒劳的。因为根本就没有找到审判张璧的民国政府高等法院判决书。不过保存在旧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档案中对此留下了“定罪未决”这一记载。

根据我对张璧生平经历的研究，我未发现他有过卖身投靠日伪当汉奸的行为。这也就是为什么国民政府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仍然无法给他判刑定罪的原因吧。

1948年张璧猝死在国民党狱中。他的死其实也是一个未解之谜。

了解了“天津事件”和“汉奸嫌疑”的两大罪状的由来，我的张璧研究才真正开始。

首先我要感谢张璧研究的先驱者樊文稷先生。他主持编写的《霸州历史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名人卷》一书和他撰写的《民国名人张璧》一文，给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和参考价值。虽然经过我的研究和史料考证，我得出了有些与他的观点不同的结论。而且，我现在很自信地说，对于资料的占有和对于张璧史实的了解上，我已经远远地走在了他的前面。但是，我必须承认：在本书撰写和出版之前，他主编的《霸州历史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名人卷》一书是了解张璧及其家族历史的最好的资料。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张璧最打动我的是他在以下两次重大活动中的精彩发言和一次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的行为。

第一次是驱逐溥仪出宫。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如下陈述：

车到北府门口，我下车的时候，鹿钟麟走了过来，这时我才和他见了面。鹿和我握了手，问我：

“溥仪先生，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

“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

“好！”

鹿钟麟笑了，说：“那么我就保护你。”

又说：

“现在既是中华民国，同时又有个皇帝称号是不合理的，今后应该以公民的身分好好为国效力。”

张璧还说：

“既是个公民，就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来也可能被选做大总统呢！”

本书作者觉得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既是个公民，就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来也可能被选做大总统呢！”在刚刚打倒了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之时，张璧居然最先意识到革命成功后，作为普通公民的末代皇帝也具有竞选总统的资格，他的公民意识如此超前。

第二次是当冯玉祥困于和段祺瑞的内斗而无法自拔时。

12月14日下午两点多，重新回到西北军司令部的张璧来见冯玉祥。冯玉祥就目前的局势问题，请张璧谈谈看法。张璧却对冯玉祥说：“若论私，不应请检阅使下野。若论公，非检阅使下野不能平和大局。”这是张璧出面劝说冯玉祥主动下野，功成身退，不然则天下继续大乱。张璧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是超前的，也是书生气的。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消灭了晚清王朝以后，出现的却

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局面，而非他理想中的符合孙中山建国理念的三民主义政府。他将首都政变后的冯玉祥看成了一个有着民主理念和国家利益理念的军事领导人，面对军阀混乱的局面，建议老上司革命已经成功，应该交出北京政权。张璧再次表现出了他的超前意识。

从他第一个明确表示给末代皇帝溥仪以竞选总统的权力，到劝说正在权力风口浪尖上得意的冯玉祥主动下野，我真的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铸造了他的这一超前的国民意识和平等人格思想？这是本书作者努力研究并希望能够给予回答的。

谁能告诉我：军阀混乱和派系倾轧，毁掉了多少个像张璧一样拥有辛亥革命理想的职业军人和高级将领？！

尤其在1937年7月26日，那次危机关头挺身而出的他，冒着生命危险，成功地说服了日军和29军同时后撤，保护了古都北平免遭日寇的炮火和飞机炸弹的摧毁。他的这一勇敢的行为，怎么称赞也不过分吧。

我相信只要不是因为民国时代父辈的恩怨和派系的倾轧而对张璧持有偏见，当知道了真实的张璧之后，一定会叹赏张璧的超前思想的。他的国民意识和超前思想并非对他的那些革命子侄们没有产生过任何影响。无论是共产党人的张秀岩、张洁清、杜文敏、张文松、张洁珣等，还是民国名人、陆军中将、警察总监的张璧，张家人骨子里都具有这一国民意识和超前思想，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了一生。

在学术研究面前，人人平等。张璧不是完人，他是个有血有肉、有错误也有贡献、有功也有过的民国名人。

笔者诚恳地劝说某些影视界和文学界的作家们，以及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们，让我们在严谨的学术探讨中，努力还原张璧真

实的历史本来面目，认识他的“功”，也不否定他的“过”。要知道，历史学是科学，历史学家最基本的素养就是秉笔直书、拒绝戏说。

实际上，本书作者也饱受过一些网络上的人身攻击和莫须有的非议。

从2002年开始至今十几年间，新语丝上发表了对笔者进行人身攻击和造谣诽谤的帖子，将近百篇。我若真有学术不端的行为，以新语丝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一篇足可以置我于死地，何劳百篇而我至今依然不倒?!感谢党和政府、我所在单位的各级领导部门和学术委员会（从武汉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再到华东师范大学）对我的履历和学术论著进行的严格的学术、政治和品行的审查和结论，这就是无权无势、长于草根、乞食多门的一名普通学者至今依然不倒的根本原因！因为学术打假不是打击报复，更不是网络黑社会整肃异己。因此，当我看到现当代的报刊和网络上充斥着对张璧的辱骂、非议和误解等“标题党”的文章时，掌握了张璧大量生平史实和原始档案资料的我，立刻对饱受他人攻击、谩骂和误解的张璧产生了同情。功不掩过，过也不应蔽功。我是幸运的，党和政府及时地审查了我、保护了我，法院也对造谣者作出了法律的正义判决。但是对于张璧的功和过，在将近七十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谁又真正关心过他的真实的一生？谁又真正理解过他的行为并读懂过他的思想？

庸庸讳言，张璧最后猝死在了国民党监狱中。

笔者认为：他的悲剧人生说明了军阀混战和派系倾轧，制约并摧残了一个有着民国意识和超前思想的军事天才的正常发展。最初，他寄希望于联合日本的势力达到反蒋反张紧紧追随冯玉祥的心愿；当日寇压境时，他没有投身抗日前线，而安居于京、津

两地青帮的保护之下，暗中资助支持他的子侄辈们走向抗日，同时又和国军高级将领及军统上层人士保持着密切交往。他以自己在青帮的威望，周旋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在那复杂的时代是一位极其复杂的人物。张璧从一个辛亥革命积极进步的青年陆军中将，最后背负着“失意军人”和“汉奸嫌疑”的名声离开了世界——虽然嫌疑绝对不等于定罪，但也足以说明这真的是那个时代发生的一场无可避免的人生悲剧。

2014年清明时节，张璧的侄女张洁璇、张洁珉和侄子张騷等人，携其亲属在霸州大高客庄张家祖坟所在地为他们的先叔张璧立了一块新碑，并由张洁璇的小女儿重重撰写了新碑文。该碑文言简意赅地叙述了张璧的生平。



碑文全文如下：

先公名璧字玉衡，霸州张氏望族之后。尚侠义，笃孝友，为人慷慨，周急济贫。早年从学北洋陆军将弁学堂，为同盟会早期会员，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蔡锷护国军，功卓授封北方招讨使。后协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任首都警察总监，逐废帝，护故宫文物。先公崇尚李耳

之学，晚年主持四存学会及四存学校，创办武术班，并助乡民护河保田。铭曰：昆山之玉 霸水之灵 文通三才 武建殊功
推学问致知四存 倡武术健体大成 璧怀历史千秋事 衡量世
态百年情

璇之女 重重 敬撰

在此还需说明：笔者治史多年，感觉最难处理的就是口述历史和家族传承历史的真伪性问题。作为京都考证学派出身的本书作者，遵照学术惯例，首先对口述历史和家族传承历史进行档案史学和文献史学的验证，然后才可以放心使用这些内容。一旦无法验证或者验证有异，则笔者一贯的态度是“宁可漏用三千，决不错用一个”。因此，治近现代史，辨析口述历史和家族传承历史的真伪，是从事近现代人物传记研究的先决条件。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接触和采访过张璧的亲属和友人。但是，本书中使用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几条这样的资料，全是经过档案史学和文献史学的验证无误的准确资料。

另外，我还想说说在撰写本书、查找档案文献时发生的一件真实的经历：为了查找起诉张璧的原始档案，我曾前往位于石家庄市的河北省档案馆。我乘飞机赶到了那里，才知道因为受馆舍太小的限制，所有民国时代的高等法院档案一直临时保存在远离石家庄市 200 多公里的一个小山村中的库房里。在没有公交车和火车可以直达的情况下，我将不得不自费打车 200 多公里，前往那个小山村去查看原始档案。热心的河北省档案馆领导考虑到我的实际困难，当即打电话责成在那个小山村看守库房的工作人员，立刻代为查档，如果发现起诉书和判决书，立刻传真到石家庄市来。我真的非常感激河北省档案馆领导们的大力支持和他们

如此敬业的职业道德。

最后，感谢日本学者铃木教授、田中教授在查找日本外交文献和原始档案等资料上给予我提供的极大便利和支持！还要特别感谢韩宗喆先生的帮助和支持！

特别感谢以下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日本茨城大学图书馆、日本大阪市图书馆。

特别感谢以下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日本外务省外交公文史料馆、北京市公安局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尤其要感谢在档案馆工作的老同学和朋友，以及档案馆利用处的几位年轻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感谢晋保平先生、韩宗喆先生为本书顺利出版所给予的帮助和支持！

——让我再说一句：谢谢你们！

2014 年新春于上海

跋

近现代以来，为古今名人作传已成为研究历史之一支脉，其出版数量之多诚可观也。盖因名人尝泛历史之扁舟，踏时代之波澜，催风逐浪于历史长河之中。言其一生经历，必须回溯历史之潮流，击空明之流光，使今人明往事之跌宕，悟古人之捭阖，揭示过往之经验与教训，此乃为史者之大旨也。然为名人立传，大都集中于光辉四射者，若本书著者择一有历史争议人物张璧，而为之传，确属罕而见之。

本书著者刘正教授，与某并无谋面之交，因其知余对张氏有所研究，且与张氏有同乡之谊，遂寄来电子手稿，赐某一瞻。余本东篱菊叟，幸得南山之望。挑灯夜读，不禁拍案，深感就张璧生平而言，刘正教授收集史料之丰沛，发掘史证之浩繁，敢言为国内之先，实为学者中之勤奋者。而研判史实之恭谨，评述例证之严肃，更为学者中之庄重者也。全书分章阐述，层次鲜快、词语生动。其高潮叠起、引人入胜之事态文路，实可大快朵颐，读后则余音绕梁、发人深思而熟虑之。

张璧，河北霸州人。余尝受霸州市政府之托，编撰《霸州历史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名人卷》，收集研究张璧生平事迹。而通览刘正教授此著，顿觉若荧光与烛炬之差。读刘正教授之书，得

知张璧青年时即参加孙中山、黄兴之同盟会，曾参加延吉护土抗日。辛亥年，响应武昌起义，参加吴禄贞之“中央革命”。组织关外光复军，驰援山东的“芝罘独立”。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参加蔡锷的讨袁护国军，参加冯玉祥的“首都革命”，驱逐末代皇帝出宫，策动反蒋的中原大战，任冯部驻东北军特别委员会委员。在此之前，张璧的历史无疑是灿烂而辉煌的，所谓洋洋乎其大者，不过如此而已。而后，其屡遭诟病的天津便衣队事件，经刘正教授遍查中日原始文献，勾沉致远，发掘是时日驻津总领事致日外务大臣之密电得知：张璧于事变前将此事密告于天津市长张学铭。时任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天津市长张学铭给国民政府的报告亦明张璧不是天津便衣队的组织者，且事发时张璧已不在天津，此均可证张璧并不是该事件发生时的当事人。

抗日战争时期，张璧曾任北京公用局长两年，但张璧秘密受国民政府委任为华北军事特派员，受冀察战区总司令委任为平汉路北段军事特派员，成为国军地下工作人员。资料证明这期间张璧做抗日策反伪军工作，且向国民党提供情报，亦帮助解救过共产党人。

抗战胜利后，张璧虽被何应钦挟私以汉奸嫌疑为名拘捕，但经两年多审办，均未查出他有任何罪状。张璧逝后，国民政府诸多在职军政高官参加了他的治丧委员会。如国府认为张璧是汉奸，现职高官绝不会如此。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站长、北京站长亦是治丧委员会成员。依军统家法，如其不得上峰准肯，绝不敢如此。诸如此状，足可证实国府与保密局均不认为张璧是汉奸。至于为何要拘捕张璧，或正如其妹所言：因北京军调处共产党代表中有其亲侄而查知张璧亲属几乎都是共产党而引起蒋之愤怒，因之拘捕了这个长期反蒋的张璧。

《民国名人张璧评传》一书如百钧重石投入荷塘，必将在学界和社会激起无数涟漪。愿世之贤君不吝暇时，展卷一品。或可激起一怒，或可博得一笑，或引起一缕遐思，乃至于一声慨叹、一啸长鸣。人不同、历不同、反馈亦应会不同。张璧一生经历复杂，对于他的评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属自然。

张璧是民国年间颇具知名度的历史风云人物。在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历史时期，他曾多次处于历史大潮的风口浪尖，参与过多次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研究他的历史，可使我们审知民国何以战乱不断，何以转瞬间消亡，感知国家积贫积弱之苦难，珍视现今国势太平昌隆之幸福，更可见今朝振兴中华大业之伟大辉煌。

张璧亦一常人，从他一生起伏跌宕的历程中，可感知人生酸甜苦辣之多味，悲欢离合之别情，焕发今人正视困难、奋然进取之激情。抚今追昔，何慨然哉。是为跋。

河北霸州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樊文稷

二〇一四年四月